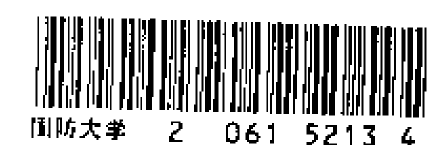
◯ 世界史精览 ◯

追寻古罗马

——巨人辈出的文艺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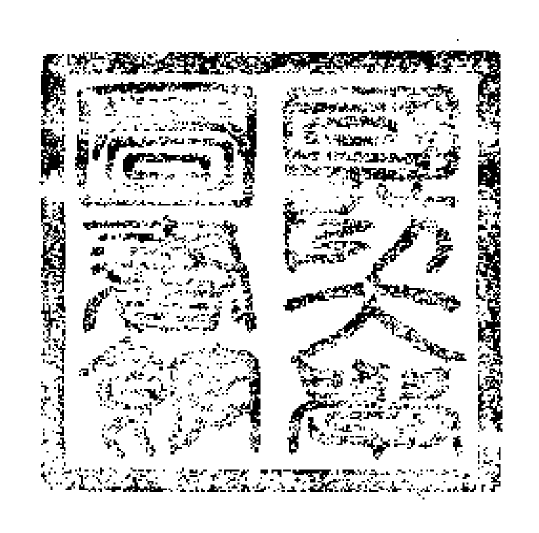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609.1

追寻古罗马

——巨人辈出的文艺复兴

白秀兰 李渤 李健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追寻古罗马
白秀兰　李澍　李健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9.2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30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0.50元　（全32册）35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人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正本清源

14～17世纪中叶，是欧洲动荡和转变的伟大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第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狂飙——文艺复兴。中世纪神学的桎梏被打破，预示着资产阶级时代的即将到来。

新的思想运动是在旧的胚胎中孕育出来，而前者一旦成熟就成为摧毁后者的坚强力量，虽然它尚带有母体的遗传痕迹。

神话传说的民族

地中海中的靴形半岛。

和暖的海风吹拂着这块小而神奇的土地。海涛的咆哮不时撼动着人们的心灵。

这是令人向往的，富有浪漫情调的世界，是诗人常用“妩媚”一词来形容的地方。一条小河，傍依着两岸的鲜花，在和风细浪中畅怀欢笑——这就是意大利。

走进今日的罗马城，不乏大都市的诱人的魔力，但留在人们永恒记忆里的还是那众神之庙，以及容纳5万人的、卓越的圆形大剧场。引起人们无限暇想的是罗马的古城遗迹。在当代记载中，那些热诚的圣地朝拜者或寻求珍宝奇迹者的幻想已经为爱国者和历史学家的兴趣所代替。“罗马城墙的石头值得我们尊敬，而建成这个古城的土地比人们所说的更有价值。”

登临狄奥克莱齐安大浴室的高大穹窿，在澄彻的碧空里，无边的寂静中，眺望罗马周围的全景。这时，人们所谈的不是日常事务或政治事件，而是在他们足下的古城遗迹使他们联想起来的历史。古典的文化，基督教的文明，古代罗马的异常光辉强烈地吸引着他们。看着这些曾经无数次在人们的心中唤起沉思、回顾的遗迹，仿佛一位衣衫褴褛、可尊敬的主妇，对他们诉说了她过去的光荣历史，并对他们详尽描述了古代的凯旋式，指着罗马城自豪地说：“你可以想见到我曾经是如何地美丽。”

神话塑造了罗马城。走进罗马城的一所博物馆，你可看到陈列着的一尊母狼的青铜像。它已快2500岁了。在远古时代，它立在古罗马的

广场上，使每个罗马人想起跟他的城市起源有关的那个神话。

一只来自古特洛耶的逃亡者的船只在大海上漂泊着，寻找着他们的落生之地。最后，海风将他们吹到了复活的岸边。上得岸来，逃亡的人们看到一条宽阔的河流奔入大海，两岸是葱绿的森林、丛林、艳丽的鲜花。太阳照耀着肥沃的平原，蔚蓝色的晴天映在河里和一些不大的湖泊水中。

过了数十年，逃亡者的后代继续徜徉在这片妩媚的土地上。可是阴险残暴的弟弟仇视自己的哥哥，最后他终于取代了兄长。他留下了老朽无能的兄长的性命。为了使自己免遭同样的危险，残暴的他杀死了自己的侄子，强迫侄女西里维亚去做灶神费斯塔女神的祭司。

多情的战神马尔，为西里维亚的美貌倾倒，俩人很快陷入爱河之中，生了一对孪生的儿子。叔父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怒起，惊恐深腑。他惧怕这对小生命的诞生，更害怕他们长大成人，卡住他命运的喉咙。他下令处死西里维亚，她的孩子抛到台伯河里，上涨的洪水掩没了孩子的哀鸣。

泛滥的河水并没有把装孩子的篮子冲走。神灵佑护着他们，篮子给长在河边的树枝挂住了。洪水退去，河水平静下来。孪生子从厄运的空中落到坚实的大地之上。饿婴的哭喊，引起了河边饮水的母狼的注意。造物主施给她的灵光引导她走到了孩子们的身边，她以动物所有的母爱之情，慈爱地舐干了他们，用自己的奶喂饱了他们。人世间必定要留给他们生存的空间，牧人发现了他们，将他们带回人世间，施以人间的温暖，给两人分别起了罗慕洛、勒莫的名字。

成年后的兄弟俩成为英俊、强壮的战士。在跟侬米多尔牧人的冲突中，勒莫被俘。他对侬米多尔人说："从前，我们两个孪生兄弟认为我们是牧人的儿子，但是现在，在决定我们生死的问题时，我可以告诉您我们非常神秘的出身。这是非常难以置信的关于我们的教养和童年的传说。我们被扔给鸟兽，充填它们的饥腹，可鸟兽却养活了我们——当我们躺在大河边上的时候，母狼拿自己的奶来喂我们，啄木鸟也给我们送来甘美的食物。"

养育兄弟俩的牧人听说勒莫成了俘虏，将出身的秘密告诉了罗慕洛。复仇之剑终于挥下，

他们的外公终于重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众民雀跃。兄弟俩与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许多人一起决定建立一座新城，在那块留下他们生命的地方——巴拉津山岗。

利益膨胀着人们的私欲。不久，兄弟之间就发生了争吵。争论着用谁的名子命名新城，从哪里开始建设城市，谁应成为它的统治者。他们各自坐在一方，等候飞来的鸟占卜诸神的旨意。勒莫先看到了6只鹞鹰飞过。但顷刻之间，只见闪电耀空，雷声轰鸣，在这撼魄慑魂的神景中，有12只鹞鹰从罗慕洛身边飞过。无法终定，争吵再起。勒莫断言，既然神鸟先向他显现，当然是他赢了。罗慕洛说，国王应该是他，因为，他看到的鸟的数目要比勒莫的多一倍。

纷争加剧。罗慕洛挖了一条环绕未来城市的堑壕，勒莫嘲笑着跳过了壕沟和土堤。激愤的罗慕洛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并站在尸体上叫道："谁敢越过我的城墙，就是这样的下场！"这是一种野性的再现。

公牛和母牛套在犁上，罗慕洛赶着它们，耕起了一道深深的犁沟，城墙就在这里建立起来。在预定开城门的地方，罗慕洛就把犁抬一抬。这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之后，整个城墙就被认为是神圣的了。城市以他的奠基者命名，而罗慕洛就成为城市的统治者——勒克斯……

世界国家的辉煌

神话的传说在于说明一个民族天生的神性，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夸耀，古罗马人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

经过几世纪的扩张，罗马城壮大了。紧接着它的领土又急剧膨胀，走出了狭窄的意大利靴子，进到了小亚细亚，横渡地中海，挺进到北非的尼罗河谷地上。西自西班牙东到叙利亚建起了个庞大的，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广阔的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帝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繁荣，而与帝国的统治一道来到的是和平和昌盛。罗马人活跃在古典世界的舞台上。远至印度、中国的特产，埃及的粮食都源源不断地涌进罗马。强悍的罗马人与希腊人接触并拜倒在他们较高的文化魅力脚下，罗马人创造性地吸收了希腊的成就，以一种高雅而善辨的风格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情感，将其

文化生活推拥至鼎盛期。

帝国希望有一部文学的史诗来赞美，诗人维吉尔也以强烈的爱国之心把带给世界和平与文明生活的神圣使命归于罗马，写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历史学家对于罗马人性格的描写更有助于罗马的伟大。山间的小溪，明朗的天空给人以自然质朴的美，美酒带来的欢乐，道德的价值，友谊的美好，鼓励人们去寻求愉快的经历，但更使诗人去提醒人们："哪一块平原没有用罗马人的鲜血浇灌?！死者的墓穴作为我们邪恶战争的证明。……哪一泓水塘或小溪没有饱尝过战争的惨烈！哪一片海洋没有被意大利人的大屠杀污染！哪一段海岸不知道我们的鲜血！"象海洋一样，有暴烈，但也不乏温柔、浪漫和幽默，古罗马人也知道"在情人面前充分表示自我"，"恋爱中眼泪也是强大而奏效的武器。"

庞大的疆域，众多的民族文化融合成古罗马特有的文化特色，在继承中加以改变和提高创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飘散的头发，隆起的鼻子，面孔上的纹路和皱纹，透出软弱或刚毅的下巴，雕塑家们抓住了个人的性格和表情。雕塑也

表现了帝国的理想。奥古斯都的雕像表现了高贵、权威；凯旋门、纪念柱上纪念胜利的浮雕颂扬了罗马的强大。运用高超的技能，丰富的想象力，建造出恢宏的圆形大剧场，明朗宏伟、惊人的万神庙，实用、巨大的高架引水桥，体现出罗马世界国家的气势和威风。任何靠近它们的人与之相比都会显得渺小，感到气馁，但更能使罗马人感到自身是高大建筑物和建筑物所代表的巨大帝国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

作为当时的世界统治者，罗马人的足迹遍及文明世界的西部。他们建立过殖民地，建造过许多城市，城中建筑包括剧场、竞技场和神庙。他们创造的东西，能在欧洲各地看到，也能在北非和西亚的许多地方看到。

罗马的和平是世界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是一个幸福时代。“幸福时代”也不会永恒，帝国统治的疆域之内，并非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年代都欢迎罗马和平的光临。一种新的社会正在成形，时间、历史的过程必定要将帝国扔在以往。世纪大门正向中世纪敞开。而新的时代却是以战争，汪达尔主义——一种故意破坏文化、艺术的行为开始的。这是一个文化上的黑暗岁月。

伟大的建筑开始塌坏，雕像遭到抢劫，大理石饰面被人从墙上盗走，屋顶被掀翻。新的一种世界观基督教神学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封建的、脱离尘世的禁欲主义，虚幻的“来世”生涯，荒漠的文化束缚了人智的发展。世界陷入深沉的孤独中难以自拔。这是一个惧怕死亡，疯狂寻找上帝的福音，而又确已死亡了的世界。基督教是它文明的核心，教皇深居的罗马是它的精神首府，拉丁语是知识生活的语言，日耳曼的习俗则对社会和法律关系产生了影响。

黑暗神秘的时代

这是一个使人感到窒息的年代，单调枯燥的世界。日耳曼人是一个强健、勇敢，生活在乡村的勇武民族，他们不准备在文化方面扮演救星的角色。他们本身的文化中也没有什么书面文学，与罗马世界的文学、哲学、艺术成就相比显得无限的粗蛮、原始。到了7世纪末，在罗马帝国的西部大地上，中央政权、城市生活、商业和学术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衰退。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就已经衰退的文化继续走向末落。旧

罗马的上层阶级丢弃了他们的传统，而将日耳曼民族的习俗吸收进来；罗马的学校关闭了，一直作为艺术家主题的人的形象被简单的几何图形所取代。绘画、雕塑也只是向皈依基督教的人传达神的信息。建筑显示出神秘，使人感到恐惧。黑暗、少饰的回廊重压着人们的精神。精致的建筑与装饰是神徒所不能容忍的！

在那些在此读书的会友眼神中，这些可笑的怪物，连同那种奇异的和畸形的美丽，以及那美丽的畸形，究竟有什么益处？那些猥亵的猿，粗野的人，那些凶猛的狮子、可怕的半人半马的怪物，那些不伦不类的人，布满斑纹的老虎，那些搏斗的骑士和那些正在吹号的猎人，如此等等，究竟为了什么目的？许多躯体看上去在人的头下，而另一方面，许多头又长在一个躯体上。还有带有蛇尾的四脚兽，带有野兽头的鱼。这里是马的头部拖曳着一个山羊的后半身，那儿又是一头咆哮的野兽长着两条马的后脚。一句话，种种形形色色的形象是如此之多，又如此之怪，以致我们被他们引诱去看大理石，而不是去看书，并且在对这些东西的疑惑中消磨掉整天的时间，而不是深思上帝的戒律。为了上帝的缘

故，假如人们不为这些愚蠢而又无益的事感到惭愧，至少他们应当痛心于这种花费吧！这种意识就象今天有的人谴责社会中的腐败现象一样，但事实上，这不过是神士们对他们反对的那种东西的可怕吸引力的敏感。但他们却允许期待永恒的神庄严显圣在他们中间的强烈精神的暗示。

除了教士，几乎没有人能读能写拉丁文。只有一个文盲的世界才能维持神位的至尊。光是上帝的象征。光本身是不可见的，但光却使人能够看见东西。上帝不可见，但他的存在使时间和空间构成的世界成为可能。不是个人而是造物主决定美好生活的因素，没有神灵启示的光照不是错误的，便是不完整的。美好的生活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在于与上帝联系着的一个更高的世界。中世纪的人们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阶梯，上帝高居顶端，地球只是在地狱之上。宇宙有三重天宇。最外层，即最高天是上帝及其选民的住所。通过下一层，即最初的发动者，上帝把动力传给了行星领域。在这一层的下边是最低的一层，即是我们能看见的，透明的天宇。地球上最低层的东西是没有灵魂的石块；比石块

高一筹的是植物，植物有最低级的灵魂，使他们能生长繁衍。更高级的是动物，它们有活动和感觉的能力；动物中最高的就是人类，他们不同于其它动物，能掌握宇宙真理的一部分。远远超过上述这些种类的是天使，他们能毫无困难地体会上帝的真谛。在这个逐级上升的宇宙的顶端就是上帝，他是最圣洁的存在，是无限的，是一切存在的源泉。人类中的贵族从上帝那里获得了知识和自由，但如果个人不服从上帝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人们胆敢以人类的意志向上帝的意志挑战，就会构成骄傲、蔑视上帝和破坏神圣秩序的罪状。

这种神秘的哲学是教会在那个时代里万流归宗地位的必然结果。圣经的权威远远超过了人们的头脑，人们只能忠实地听从上帝的启示。

神学统治意大利，把全西欧文学变成为神学的奴仆。诗歌不过是圣经词句的影子。神士们说，“在基督之后，我们不需要任何求知”。天文学是为了观星象，验证圣经传说和圣言指示。数学、几何学是为修造教堂；艺术是为了描写圣父、圣子、圣灵以及天堂的伟大存在和神的无上威力。重要的问题是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

一个针尖可以站几个天使，鼹鼠有没有眼睛。这些凭着圣灵的启示就可以通晓一切秘密的僧侣们，不过是以天堂来做买卖，抢劫那些轻信妄听的人们。

死亡意味着新生，中世纪文明的衰退也正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另一阶段的先声。东方文明的介入，预示了冲破黑暗的曙光的出现。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进入文明时代起了重大作用。"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12世纪以前，欧洲人还不会造纸，文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他们的文字都写在羊皮纸或骨器、木板上。印刷术传入欧洲以后，把文化和教育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自此以后，欧洲的文化中心由教堂和修道院转移出来，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火药一开始就是……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贵族城堡的石墙再也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指南针的传入，指导欧洲人——达·迦马、哥伦布和麦哲伦渡过茫茫海洋，完成了证明地球是圆形的设想。世俗观

念的进步，人们知识的变化，震撼着中世纪的知识之王——神学。几个世纪的疯狂之后，中世纪也走向了必然。终于在意大利上空炸响了昭示黑暗年代终结的撼天雷。

冲破黑暗的动力

14 世纪教皇地位如日落西山，促进了意大利北部发展起来的城市国家的发展。早在 11 世纪末和 12 世纪里，这些城市国家已经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金融中心，垄断着东西方商业往来的地中海地区的全部贸易。地中海再次成为欧洲世界的中心。繁忙的意大利人的商船队，满载着地中海东部的货物西入大西洋，北达波罗的海。它们商人的足迹遍布西欧诸国，巨额的财富壮大了它们的实力。北部各城市的商行曾在西欧诸国享有征税专利权和采矿的专利权。一些银行高利贷者成为富有的西欧帝王债权人，他们设有很多金融交易所，榨取巨额的货币源源流入母国。于是这些富商、高利贷者、银行家逐渐形成为资产阶级。

威尼斯号称为“亚得里海各国的首都”，是一个拥有 20 万人口的城市，工商业很发达，商

业和金融业居于首位，它很早就是东西贸易的中介点，从中获取暴利。它拥有的船队包括3000艘商船和17000名船员，它的商船和舰队纵横在地中海和黑海的海面上，日夜转运东西方商品。毛织业、丝织业、玻璃制造业、武器制造业驰名全欧。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促使手工工场的扩大、增多，工场主成为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作为封建主阶级对立面出现的资产阶级凭借蓬勃发展的经济实力，充实着政治实力，起而和当地的封建主斗争，终于完全剥夺了当地封建主的政治权力。新的社会关系日益瓦解着旧的封建等级制度。

资产阶级有意识地提出重要的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自由和自由政府的合法性，反抗着教皇、封建的帝国两个外部敌人。他们认为，对封建皇权所尽传统义务必须大幅度地调整，以适应他们实际上已有自治政府这个变化了的事实；基督已否认包括教皇在内的神职人员具有一切政治管辖权。

随着新性质的商业和工业的扩大，腰缠万贯的资产阶级富商在城市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无论在宫廷、帐房还是在艺

术家的工作室里，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出身高贵、骑士的英勇精神、固定的主仆地位等等，都已腐朽。随之兴起的是对个人抱负、理想和成就的追求。并非是古老的封建骑士观念或法规在这时已被彻底摧毁，而应该说它是转变了，为新的目的服务了。

这种新的社会风尚规范与中世纪所实行的内容相去甚远。高贵的出身不再被定为价值的基础，勤奋、才能和创造的天才受到人们的赞美。荣誉不再被狭隘地局限在以战功为主的范围内，而是扩大到可敬的宫廷官员及公民们所做的有利于公众的事情和优良的品行上。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当发达之后，为了进一步稳定自己的统治和扩大经济实力，极需改良生产技术、改革生产工具，通晓经济理论和实验科学、开辟市场、改进运输。他们对现实社会提出许多疑问，对自然科学提出更现实的课题。他们需要运用经理工业、商业、银行企业的熟练人材为他们服务。

文化复兴的浪潮在这种现实的力量推动下即将迸发。意大利这块为海洋温湿了的土地成为这场人类脱离黑暗运动的首发地。历史发展

的线条已告诉我们了意大利的过去辉煌历史。个人的毅力与主动的精神，追求预定目标时的英勇与顽强，在意大利找到了十分肥沃的土壤。具有辉煌历史的民族是不会甘心黑暗永久掩盖民族智慧之光的。

古罗马的光荣和骄傲永恒地对人们想象力是最富于吸引力的东西。完整的光环不复存在了，但它瑰丽无力的余辉使人们为之神往。众多的遗迹仍在叙述着过去的荣华。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保存下来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遗产中，如饥似渴地搜罗、吸收，从这些丰富的思想文化宝库中积聚文化养料。那些令人感激的血缘创造者似乎经常能说出许多家族是从罗马最古老和最有名的血统传下来的。在公众的各种情感之下产生了一种传闻，说是在1485年4月15日，发现了一具古典时代罗马少女的尸体——艳丽惊人并保存完好。据说，几个伦巴底石匠在塞西利亚美泰拉墓那边的阿庇安公路旁边，圣马丽亚诺维拉修道院的土地上掘开一个古墓，发现了一个大理石的棺材，上边刻着“朱丽亚·克劳狄乌斯的女儿”的字样。尸体曾涂过防腐的油质，像一个刚死不久的15岁少女那样绵软如

生，仍保持着活人的面色，半张着嘴和眼睛。她被移置到加比多尔山上“陈列馆”的宫殿里，然后人们开始对她的参拜。在成群的人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来画像的：“因为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她的美丽，即使能形容出来，那些没看见的人也不会相信。”由于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命令，在一个房间她被秘密地埋葬在平面门外；那个空的石棺却被留在陈列馆的院子里。

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坚定相信当时人们认为得以亲眼见到的那个古代的人体，必定比现在的任何东西都美丽得多。

古文化中的文学遗产，比建筑方面的遗迹更为重要。它们在最绝对的意义上被认为是一切知识的价值。虽然古代作家对于14世纪和以前的意大利精神的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与其说是由于很多东西的发现，不如说是由于早就为人所知的那些东西的广泛传播。每个时代都有人从事着对上一时代文化继承、保留的工作。即使在封建的中世纪，在那个文化贫困时期，黑暗的神学不准有学识的人去从事崭新思想的创造，但对他们抢救古典文明残余，使之留存下来

的工作还是有些许宽容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这些人在对基督教怀有献身精神的同时，依然保持着对希腊和罗马遗产的尊重。实际上，直至12世纪，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才从翻译著作和评论中知道亚里斯多德。这在政治权能退化，经济生活萧条，学术文化衰微的环境中，也是一种新的文明正在崛起的迹象。

到14世纪以后，古希腊、罗马以及拜占庭的文化典籍在阿拉伯人西侵和十字军东征以后，重新陆续传播到西欧各地。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奔走于各地僧院，搜集古代作品、手稿和抄本、残破的艺术雕刻和绘画，或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挖掘古代文化遗产。

西欧各国保留的大量古代国家图书馆、教堂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室也为复活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创造反封建、反神学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古希腊保留了3个最大的图书馆。一是亚里斯多德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古抄本、自然科学书籍和艺术珍品，到公元1世纪，被索特拉斯当做战利品，全部运回罗马，使罗马藏书一跃而成为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之

一；二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这是公元前5世纪托勒米一世创立的，他自己及其继承人搜集全欧的古籍和全欧著名的学者，编写书目，留给后世；最后一个是柏加曼图书馆，仅次于亚历山大的规模。

许多图书馆内藏有大量的著作，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色诺芬的《希腊史》都会在那里找到。哲学著作有唯物主义者阿拉克西罗德、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等人的著述，还有唯心主义者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著述。自然科学有数学家欧几里德、希帕卡斯，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医学家希波革拉底，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和埃拉托斯特尼等人的伟大成就。戏剧作者像爱斯奇里斯、索福克里斯、欧里庇底斯等三个著名悲剧家以及阿里斯托芬喜剧作家的作品。在雕刻艺术和建筑方面有我们熟知的梅龙的《掷铁饼者》，菲狄亚斯的《雅典娜女神》，波利克拉特斯的《持矛者像》等古代世界艺术品。尤其是在建筑上有多利亚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等雄伟壮丽的建筑术。

不仅如此，古罗马文化的宝贵遗迹在意大利到处可见。古罗马的大道，纪念碑，及文化手稿等使得意大利人同古罗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让死去的东西复活”。古典文化成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借鉴，是流而不是源，因为新文化的产生本是以资本主义的产生为前提。文艺复兴是“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象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这种文化在那个时代骨子里都渗透着反封建的精神。为新兴资产阶级充当先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思想力，热情和特性、按照多才和博学”去冲破封建主义的桎梏和教会的囚笼，同封建势力及其精神支柱——基督教神权统治开展了斗争。

辉煌世纪的到来

许多城市上流社会的人士都成为艺术的保护和赞助人，并且为有前途的艺术家和作家提

供资金。这些通过商业和金融而非土地致富的城市贵族由于他们的权力既不是依靠世袭所得，又不能依赖传统的臣仆式的效忠，他们只好求助于文化来支撑其权力的门面，来证明他们所掌权力的正当性。

对于这些新的巨富们来说，艺术只能起到为政治服务的作用。艺术以其感人的、庄严宏伟的气魄，显示了权威的力量，它仿佛施展了魔法，使人们对它着了迷。艺术还能起到使公民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焦点作用。这在一个没有世袭君主，过多追求现世目标而使教会和教士们不再受到以往那样尊重的国家里，显得特别重要。缺乏安全感的统治者竞相争取和笼络艺术家来自我炫耀，正如他们在战场上逐鹿争雄一样。艺术成为理想的政治投资，特别是在15世纪经济上的投资不再像一两个世纪以前那样能获得极大的收益。

教皇们也在艺术上进行投资。由于在欧洲丧失了世俗的统治权，教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巩固和扩大教皇国，以此来加强对意大利的直接控制。作为这个政策的附属物，教皇们在艺术上投入大量的金钱来提高个人威望，还想借此恢

复那已破碎不堪的自尊。所以，教皇成为所有赞助人中最慷慨的解囊者，对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拉斐尔作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这种由教皇和其他贵族保护人对艺术的新的赞助方式，使得艺术创作迅猛发展。赞助人之间的相互竞争，社会地位的不安全感，造成了权贵们疯狂地追求荣誉和名望。这就刺激了人们那种即使不靠雕像也要借助画像而留芳百世的欲望。伟大的艺术家凭借手中的画笔和刻刀而一举成名。

在中世纪，艺术家被看做从事低下体力劳动的工匠，即使是有地位的人也十分卑贱。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

空前未有的文艺复兴对艺术的需求，使艺术家的地位在历史上被首次公开承认。从此，直到工业革命，他们一直享有这种较高的地位。

在文艺复兴社会里，世俗观念不断增长。富有的商人和金融家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的引诱，产生了对享受金钱所能带来的尘世快乐的渴望。他们背离了中世纪为追求灵魂得救而终日忙碌的境况。确切地说，他们既不是无信仰者，也不是无神论者。但是，宗教不得不同人

们对尘世利益的关注展开日益尖锐的斗争，结果，城市上流社会的人对宗教日益淡漠，或至少不允许宗教干涉他们对人类丰富生活的探索。现世美好生活的挑战和享受看来比天堂的允诺更有吸引力。城市生活将富翁和天才从封建贵族的领地和教会束缚中释放出来。城市的杰出人物极力发展自己的个性，发掘和表现自己独特的感情，显示自己独有的才气，去赢得名誉和光荣，并进而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这种理想是超群，卓越的。它只重视个人身上那些特殊的、超凡的优点，而不注意大众身上那些共同的东西；只重视少数杰出人物的非凡能力，而不注意大多数人的需要和权利。个人主义深深植根于西方的思想中，这从艺术家们努力追求准确把握人的个性特征并艺术地表现这一特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那些冒险进行处女航的探险家身上，在那些渴望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征服者身上，在那些积聚起巨大财富的商业资本家身上，个人主义无以伦比地体现出来。

人性的开掘

文艺复兴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而

且重要的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作为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新思潮，成为西欧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照亮了近代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道路，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发现了现实世界和世俗的人，与其说发现，毋宁说是醒悟，这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大师们，撕破了封建贵族、宗教神学的面纱，揭穿了他们的欺骗、愚弄伎俩，开始向旧社会的宣战。这是人性战胜神性之战。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人"从"神"的统治下脱颖而出，完成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拥有了新灵魂的人们，不再憧憬来世的天堂，而是要把天堂建立在地球之上，享受人间的真正幸福。谱写阳春白雪，讴歌下里巴人，塑造人间天堂，给人间以欢乐、华美、娱人心目的田野。他们掀起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狂飙，以摧枯拉朽之势震撼了整个欧洲。他们是在大声疾呼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口号下，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加速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并向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的曙光照耀着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哲学世界的

产生。

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渴望民主、共和、统一的思想，欣慕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这一切显示了蕴涵着民族意识形成的胎动。明快的自由思想使人们为之耳目一新，力量所及之处，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这些思想以方言文学和民族艺术形式传播，为群众喜闻乐见，深入人心，启迪了人们的觉醒，也征服了封建神权统治者。

5～15 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 1000 多年中，基督教神学思想严格的制约着中世纪。基督教的哲学都从《圣经》的角度出发，完全鄙视人的智慧和才能，屏弃一切经验和实践，反对人们去探讨现实世界和人的生活，反对人们去研究自然界，人们唯以圣言为依据，以上帝的启示来指导人的思想。“上帝的真理是第一的、最高和最完善的”，“《圣经》的权威远超过人们的头脑，一切都应以圣经为标准，决定取舍”。

处于正在成长着的资产阶级，为要反对基督教神学教条，必须借助于古典文化、现实自然科学、文艺艺术和新的哲学作为武器来促进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粉碎

封建王国，把天国和神的万能转移到尘世上来，为“人”服务，他们提倡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人道反对神道，用人性反对神性。这些巨人用笔、舌或用剑向封建制度进行顽强的战斗。

文艺复兴的波涛

文艺复兴于15世纪后和16世纪北上向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进军。在北上的过程中，它使自身适应了意大利前所未闻的新环境、君主国的成长及世俗信仰力量的增强。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文艺复兴文化逐渐演变为以宫廷为中心，反对共和的文化。法国弗兰西斯一世和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文艺复兴文化的命运就是如此。君主国在德意志和莱茵河地区并不存在。低地国家存在着一种极为重要的世俗信仰传统——强调教育和实用信仰观念的平民运动。

但北方的人文主义思潮不论从哪方面都不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那种反宗教传统思潮相比。北部人文主义者主要是对古代教会特别是对于古代教会基督教的原始结构问题感兴趣，他们在寻求一个典范，并试图通过这个典范去

对当时腐败的教会进行改革。

无论在哪里，有两个重要因素使1450年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加速了传播：日益增长的繁荣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由于和平、自然灾害减少，黑死病的消声匿迹而带来的经济繁荣使人们有力量去开办学校和大学。上流社会及商人们将他们自己的儿子送往学校接受由意大利传播来的人文主义教育，使他们将来在教会和日益成长的国家机构里谋得一席之地、进入上流社会奠定基础。15世纪中叶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使用进一步加快了文艺复兴思想的传播。书籍低廉，知识获得变得更加容易。印刷技术使科学知识更为可靠并且避免了因手抄而出现的讹传。通过学者提供同样版本的书籍，人们就可以在重要知识和科学领域展开研究，取得更快、更坚实的进步。

意大利以外的人文主义者对于通过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活动而开展的基督教和社会改革的重视要大于对复活古典文化的重视。这种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改革强调人类获取知识和美德的能力。除了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外，还溶进了新的修辞艺术和历史学。人

们相信语言的力量，并且用自己手中的笔攻击经院神学和教会的腐败。

德国和法国人文主义者都在追求基督教人文主义目标。他们运用人文主义知识和语言讽刺挖苦中世纪经院基督教，从而建立一个更纯洁、更符合圣经教义的基督教。他们希望准确可靠的圣经版本的发现会引起一场伟大的宗教觉醒。针对众多的诸如天主教、新教等宗教派别的教条主义纷争，他们认为人对事物的本质知之甚少，或者说一无所知。人们接受基督教信仰和信奉政治上的无为主义。个人不能对自己的信仰完全负责，他们是脆弱的理性主义和环境力量的产物，人不应当为他们自己的信仰而遭受惩罚。需要遭受惩罚的仅是那些宗教上的教条主义者。

法国的蒙田不是一位自成体系的哲学家，但他致力于研究从苏格拉底的自我反省中了解到的内容。他的文笔机智诙谐，富于文雅，充满对事业的执着，对以后的一个世纪产生了重大影响。

拉伯雷则极力维护个人的基本美德和享受尘世美好生活的自由权力。一旦摆脱了宗教束

缚，人可以凭借自己善良的天性去建立一座尘世乐园而不必去理睬神学家梦中营造的天堂。男女们可以不受法律、地位和宗教习俗的束缚，依照自由意愿去度过一生。他们想睡就睡，想吃就吃，读书、写作、歌唱，用几种语言写出古怪而有趣的文章，总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在15世纪后期，16世纪初期的西班牙，严密的教会等级制度控制、垄断了人文主义学科并使之为高压的目的服务，持异议的人文主义者在西班牙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余地。头脑清晰、办事谨慎、具有现实主义认识的人，在一个由头脑充满幻想的人统治的世界里遭受着不幸，固执己见的西班牙恪守着十字军圣战时的保守观念。

英国人文主义的目标常常是反对权威和传统。各种身分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来到英国，他们在15世纪把古典文化——严肃的文艺复兴文化介绍到了牛津大学。莫尔的《乌托邦》引起了人们对那个时代弊端的重视，并进而主张激进的改革。他利用了人们对那个时代弊端的重视，想起一些人发现到海外的非基督教世界可能建立乌托邦的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幻想而使

他的批评更加尖刻，更切中要害。举世公认，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表达了荣誉、英雄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念。人们的这种追求与命运发生了矛盾和斗争。具备人类的美德，战胜人类弱点时也要克服十分巨大的困难。文艺复兴时期，人物性格的高尚与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恶及自我毁灭的本能之间的冲突都充分展现，而那些高尚的人物形象是一幅自我英雄的形象。奥菲莉娅说：

“无比的青春美貌，在疯狂中凋谢！啊，我好苦，谁料过去的繁华，变作今朝的泥土！”

强烈的人性使艺术超越了教条主义而反映出生活本来的面貌。

人类理性的胜利

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无论它的艺术观，对个人在历史和自然之中作用的认识，还是社会的、政治的、战争和外交的观念都是近代思想的开端。文艺复兴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人本质的新观念。人们要重获新生就要冲破上帝从外部强加的命运的神秘网罗。人的命运由人自己来决定，现实的世界，人本性的推动影响着人的命运。人

要自由，就要从神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人是历史的产物又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人的前途不是由神明决定的。

在最早发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富有的商人和教会神职人员及旧贵族一样重要，在新的政府形式中，商业寡头政治家、人文主义者和雇佣兵队长比在欧洲其它各地占统治地位的教士和贵族起的作用更为重要。新事物产生和不稳定所引起的问题有待人们去解决，城市的财富需要有才能的人去创造和取得。商业财富和新的政治缔造了新的文化。那些富有天才的个人——学者、诗人、艺术家和政府官员返回到古典文化中去，而这些古典文化无论如何就在身边，就在意大利和希腊。古代的艺术、建筑、文学及哲学典型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

回归古代引出了人们对中世纪的认识，人们把中世纪看做是一个黑暗、愚昧、野蛮的时代。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复活并不是全盘领受，本身是一件自我意识很强的表现，它每一步行动都使自己与过去区别开来。在文艺复兴艺术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中，对世界的描述和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得有涉及更高一级的，超自然

领域的意义和权威。与义艺复兴文化中世俗因素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向现代观念发展的新现实主义，它不但在想象中的世界发现了现实主义的政治，而且在艺术领域内也展现了自己。数学透视法将世界置于空间来表现，并赋予立体感和戏剧效果，这也就是构成现代视觉和美学现实主义的因素。无论是美学现实主义还是政治现实主义都可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形式。当时的人们喜欢这样，以此增强它的影响力。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于有能力的人们会受益于古人的智慧，从而了解并改造世界充满了很强的信心。他们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以其强有力的结合去摆脱中世纪的观念。在基督教薄弱的地区，人们逐渐产生了直接面对生活的意愿。人们认为，有能力的人类可以战胜极大的困难。这种新的信心与对个人的崇拜密切相联。无论君主还是画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人动机的驱使，总愿展示才能和满足个人野心的欲望。这种个人的追求既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富有保护人的恩惠，也受到重视才干而有谋略的君主们的鼓

励。

中世纪基督教所强调的自我否定美德和自负的罪孽不复存在。与之相反的是，文艺复兴运动高度重视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重视个人潜在才能的实现，尤其是少数具备天赋者。文艺复兴培育出一种气氛，使有才华者，甚至天才人物的本能得以施展。这至少是一种能人治国的思想。流行于全欧的那个超越地理、道德、语言和民族界限的唯一的教会制度受到猛烈的抨击。

在以往的若干世纪里，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会已将其影响渗透到欧洲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教会对它手中巨大的权力和财富的重视要远远超过了对现实世界至善及对彼岸世界拯救的追求。为财富所累，又加上对跨越国界的权力的迷恋以及对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渴望，教皇和他们属下的各级神职人员成为在文艺复兴中获得新知识，变得信心十足的人文主义者批判风暴的中心对象。中世纪初期，在文化方面，甚至在国家治理方面发挥着和前罗马帝国一样作用，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中是一个具有凝聚力和负责教化的巨大力量的教会在中世纪晚期进

入了它的危机时代，教皇和主教的作用，权威及其教义的生命力开始被怀疑。随着国王权力的增长和拥有大量熟谙人情世故的市俗阶层的城市中心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大增加，这个国际性教会的权威和独立性正在丧失。

在若干领域里，教会的权力都受到了仔细的审查。教皇和国王的权力都来自上帝，但两者之间权力的界限在哪里，却不是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根据基督教教义，教皇可以教导君主正确使用权力，世俗君主必须为教会服务并不得向教会挑战。但是，世俗君主在世俗事务上向教会的至上权威的挑战与日俱增。教会曾教导人们，新思想须屈从于神学统治，但掌握在俗人手中的新思想却威胁着教会关于权威的论述，威胁着作为当时文化中心的修道院和教会控制的大学。

当国家经济和地方权贵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时，向遥远的罗马精神上的统治者——他们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进贡纳税就成为不可能的了。教会威风扫地，丧失了它在世俗事务中的领导作用。

由于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低下，文艺复兴

中关于个人和世界的概念虽然大胆新颖，也只局限于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之中。但不管怎样，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在建筑风格和鉴赏，教育和城市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许多领域中，为近现代建立起了文化标准。

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许多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从意大利掀起的这一伟大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封建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体系发动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些给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打下基础的人们，绝不受封建阶级的局限。他们具有时代的进取精神，勇于超出自己的时代，敢于冲破封建神学网罗。尽管他们民族不同，语言各异，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志愿和目的，推翻封建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只有勇敢的人才敢去领略大海的翻天巨浪。

第二章 永恒的魅力

站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前，也许你会感觉到《蒙娜丽莎》永恒微笑的“神秘”，却绝不会感觉到耶稣的“神圣”。你是否更深地体会到了那生命的自由，跨时代的人生主题，“神秘”微笑的媚力，大卫的健美，圣母的完美的凡间女子之体。

僵死与鲜活的两个艺术时代

辉煌壮丽的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在文化中起了迥异寻常的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些互相竞争的行会与同业用卓绝的美术作品装饰了教堂与广场。拥资百万的名门名族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出于个人的虚荣心与政治上的打算，还是出于充分享受自己的财富的愿望，他们都建筑了宏伟的宫苑，兴修了壮丽的公共建筑物。艺术具有显而易见

的社会性质，它直接面向广大的市民群众。壁画，油画，雕像与浮雕装饰了教堂、市政厅、广场、宫苑。

基督教在欧洲封建社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教会都处于统治地位。基督教垄断了一切文化教育事业，神学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它科学文化被称为“神学的婢女”。中世纪的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完美、永恒的彼岸世界的幻景。现实生活完全排除在艺术表现之外，基督教的教义成为艺术创作的主题。整个中世纪的艺术虽现出一种人为的痛苦、忍受、失望和恐怖的气氛。简单的艺术线条是为了愚弄广大没有文化知识的群众，突出的主要部分，省略的繁复的造型手段便能引起神圣感觉和恐怖气氛，迫使民众敬畏神灵。几个世纪里，中世纪的艺术家一直在忠实模仿，细心绘制上帝的造物。他们的目的不是让观众去相信物体或事件的真实性。物体放在造作不合逻辑的背景中，出现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东西。一个漂亮的淑女可以坐在花园里亲抚一只独角兽，而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要不就是一

群野兽在她脚下亲昵地绕来绕去。大量的这一类东西以及图中的异国情趣向我们展示了奇思妙想。宗教观念的升华，逃避了冷酷现实，不能理解也不能享受上帝创造的果实。正面的人物形象表现严肃、古板、对称的布局，加强了形象的神圣性和神秘感。金色或蓝色的衬景，使人产生了一种远离尘世，超凡脱俗的感觉。牧羊人求鱼象征着耶稣，羊羔象征着人民，孔雀象征永久，鸠鸟象征圣灵，心脏象征爱，船象征教会，念珠象征虔诚，苹果象征天堂的幸福，刷子象征纯洁，碇象征希望，持锤的手象征不灭。裸体的画是不严肃、雅观的。即便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也要穿上衣服，而且穿上镶宝石或黄金般的同国王一样的华贵服装。没有表情，缺乏生命感。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则不同，他们在阐述一种转变了的心理状态。对他们来说，人生在世不仅是为观赏神的伟大，他们自己本身更是骄傲的自我体现，是神在大地上的天然继承者。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取代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积极肯定和表现人生和自然，反对否定人生和自然。艺术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艺术和现实生活紧

密地结合起来。人代替了神，人成为艺术作品的主人公，创作的主体。艺术家歌颂人的形象，赞美人体美，讴歌人的理想，宣扬善的崇高、恶的卑鄙。艺术中广泛展示出现实的境界，是人们在其中生存着、行动着、斗争着的生活环境。正是文艺复兴时代，绘画初次发挥了它所积蓄的潜力。作为时代特征，对于科学的向往，有助于掌握人体解剖，有助于探讨出现实主义的透视，有助于表达大气空间这一工作中取得的初步成就，也就是说有助于得到一切必要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使画家们能够现实主义地真实地来描绘人物，描绘围绕人物的现实。精神上的强烈影响，对于精神上强烈影响具有无限威力的信心，从宇宙的生动形象化完整性中来认识宇宙的愿望，早已贯穿在当代的艺术创造之中与科学的创造之中，决定了艺术创造与科学创造的密切的错综联系。

思想上的变化导致艺术手法的变化：重视比例、对称和和谐。这些艺术形式的效果相继通过新的、使时间空间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观念得到了充分表现。人们对中世纪的艺术潮流进行了有意识的背叛，这种反叛使艺术创作产生了

革命性的发明和突破。

绘画在解决新的课题时相应地发展起来，改进了它的技术手段。作品现实主义地表现空间中的布局，表达出非常强烈的、绚烂的色彩效果与光的效果，富有质感地深刻地塑造形体。人们虽然继续运用了取自基督教神话与传说的传统题材，但作品具有突出的现实主义性质，这些作品实质上肯定了尘世人的美。

雕塑，尤其是在刻划神话人物、圣经人物以及真实的当代名人的雕像上，用英雄气概的庄严形式肯定了当代人物的典型特征与品质，揭示出了当代人物性格中的激情与毅力。美术家把雕像造型的鲜明性和为绘画所固有的进行了透视结构处理的空间深度相结合，力图表达出有大批人物参与其间的复杂事件。

建筑较之其它艺术领域并不逊色的感染力表现了热爱生活的人文主义理想，表现了对于和谐明朗的造型美的向往。世俗建筑的广泛发展，新的风格丰富了市政厅、敞廊、市场喷泉等世俗建筑。它适应了公众与城市的需要，具有突出的纪念碑性质与非宗教性质，形成了在和中世纪建筑相形之下全新的建筑形式，富有的市

民的住宅变成了庄严地贯穿着节日欢乐气氛的宫苑。文艺复兴时代的宫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艺复兴时代城市的建筑风貌。建筑物构成的背景上，突出着用纪念碑式的雕塑作品与绘画作品体现出来的人的形象，这样的人统治着世界，或是在世界上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进行积极的战斗。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用对于古老的基督教神话与传说进行再构思的办法来塑造英雄气概的形象。当他的处理这样的课题时，有时是略显天真地往往以古代神话与传说的威望作为凭借。实际上，这是意味着对美术上古老的基督教题材与情节的全部原有内容进行彻底的改革。自然流露人的感情的美、真实的生活诗意，坚决排斥了中世纪形象上神秘的形象和道貌岸然。

自由与神明的皈依者

1380年间，一个来到佛罗伦萨的旅客沿着大道进入城区时，他还难以看到今天那种受人称赞的旷世绝伦的美景。蜿蜒曲行于亚诺河北岸的陡峭的山丘的那条从波隆那进入佛罗伦萨

的大道，虽然能给人以一些难忘的景象，城区的美景却大半被那些像手指般伸入平原的山脊截断了。

这一天风和日丽，一个在山野牧羊的娃娃用尖石粒在岩石上聚精会神地画羊。这个大自然的骄子，日后使多少人徘徊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钟楼前不忍离去；又有多少人站在《犹大之吻》前以百感交集的心情品味耶稣那逼视犹大眼睛的意味深长的目光。这深邃的目光向世人推开了一扇心灵之窗，这扇在中世纪已关闭了近千年已久的人类之窗。一股清新的，来自天堂的神风吹进了人间，人们开始从僵死的世纪中苏醒过来，开始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又获得了新的生命之源，人们又称这个延续了几世纪之久的文化解放为文艺复兴。

无论你走到哪，你都能感受到的是那个时代意大利不朽的艺术魅力。那位小牧羊童，他就是现代绘画天才的奠基者，“欧洲绘画之父”。他，发现了人，把人从神的铁牢里解放出来。就像《庄严的圣母子》中的在宝座上端坐的圣母健壮朴实如一农妇，安祥和蔼如人之生母，昔日那

威严的圣母已脱胎换骨。他笔下不乏那无猜无忌的童心和对自然生物的挚爱。仁爱与宽容、博爱与尊崇生命体现在《向小鸟说教》中，圣路兰西斯正转向路旁，向一群欢跃的小鸟低头俯首，流露出仁慈与爱戴之情。他仿佛在劝说小鸟们赞颂造物主，因为造物主赐给了它们美丽温暖的羽毛，还创造了枝叶繁茂的大树让它们栖息。他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就是"绘画自有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神明的皈依者"的乔托。

这是 14 世纪意大利重要的界碑。此后真正进入了群星辉耀的时代。

这是文艺复兴时代世俗生活的一个特色：他时常在艺术中乐而忘形，不修边幅，不拘细节，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马萨乔"。半个世纪前由乔托开创的人文主义新艺术由于后继无人，由高潮跌入低谷。时代需要天才来冲破沉寂。

当机遇到来时，成败在于你是否迎上去，抓住它。年轻的马萨乔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接过乔托的旗帜，同中世纪禁欲主义决裂，将人文主义引入绘画，强调以人为中心。圣母玛丽亚在马棚里抱着耶稣，在丈夫约瑟的陪伴下接受东方的

《博士来拜》。亚当和夏娃一旦从蒙昧状态脱颖而出，有了智慧，能分辨美丑善恶，便失去童年的天真；因为有了欲望，产生了自我追求，便受到不可抗拒力量摆布，因而失去欢乐，常与痛苦为伴。幻想世界中的伊甸园在马萨乔笔下变成了现实世界的《失乐园》。几百年来，它给观众带来心灵震动，它抓住了跨时代、超国界的人生主题。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成为人文主义新艺术的典范。运动精神和生气赋予了他笔下的人物。虽然马萨乔华年早逝，被人毒死时，年仅 27 岁，但时间不能磨损他的崇高地位——“文艺复兴之父”。

时代召唤的巨人

历史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众多难解的谜。时时萦绕在我们脑际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俊美的谜：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 3 颗最亮的艺术巨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几乎同时出现在天空。

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艺术家们已从中世纪神学艺术中跳出来。他们发现了一个个广阔的现实世界，一个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

心的世界。但在15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运动成熟的时代，人们需要探索新的天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时代提出的另一个课题是：艺术和科学经过文艺复兴初期，已经取得迅速发展，尽管其间有人在两个领域里同时涉足，如建筑家希鲁内斯基、画家马萨乔，可是毕竟做得有限。还没有一位艺术家在那个时期同时也堪称一流的科学家。时代需要通才、全才来沟通两个领域，为艺术注入新能源。

时代召唤巨人。达·芬奇走来了。

名人传说总不免带些传奇色彩，但人们不能怀疑达·芬奇出众的感受力、奇异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他以他的博学通才，在绘画、雕刻、建筑以及自然科学若干领域奇峰突起，宛若珠穆朗玛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兴趣是事业的向导。达·芬奇兴趣广泛，勤奋好学，长于观察。9年的求师学艺期间，他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在接触自然和人生中，他在本子上画满了人和动植物的速写，记满了寓言、格言和故事。聆听所走访的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的教诲，写下心得，记下数理公式。

“画家必须是博学多能的，我的朋友。研究自然现象乃是神所喜欢的一种事业，这是同做礼拜一样的好。我们发现自然法则，便是以此去赞美那第一位发明家，赞美那创造宇宙的艺术家，并学着去爱他，……谁知道的少，他爱的也少……爱是知的产儿。知得愈深，爱得也就愈热烈。”

然而，理工两大类自然科学没能羁留住达·芬奇，他虽然主持开凿了“达·芬奇运河”（米兰），设计了组合式桥梁，试验了飞弹、飞机、战车、机枪、降落伞、升降机等等，但他更倾向于在广大的范围内认识人类世界。他们处的时代也正是人类在广大空间开拓视野的时代。伴随 14、15 世纪人的发现，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新航路的发现和美洲新大陆的拓殖，人类在科学认识世界方面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达·芬奇加入了这个行列，并站在最前面，成为受当代进步思想——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一名反封建的坚强战士。他要着眼于现实生活，在深度空间中展示人物的心灵世界；歌颂人生的幸福和大自然的美，创作崇高、健美的艺术形象，即使宗教传说中的人物也是那样真实、生动。《最

后的晚餐》这幅不朽名画，经历了500年沧桑，可当今天的人们再站在它的面前，如同铁屑到了磁石面前，人们的生活经验、想象力被调动起来，欣赏者与被欣赏者融为一体，展现出它流芳千古的永恒的艺术力量。

“灵魂应该通过姿态和动作表示出来。”达·芬奇在这幅画上展示给我们的是：当耶稣在餐桌上突然同门徒宣称“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时，全场哗然，像真有声鼎沸之感，12门徒的表情发生了急剧变化。

耶稣的话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进了一块巨石，卷起了千层波澜，顷刻间打破了晚餐平静的气氛，激起了门徒的义愤与惊讶。整个画面层次清晰。巴多罗米欧（耶稣左端首位）情不自禁地从座位跳将起来，好象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恨不得马上将暗藏的叛徒当场揪出来；安德烈惊愕地举起双手，不相信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小雅各像要急于弄清楚的神态；西门的沉着；马太的问询。右端的多马向耶稣伸出一个指头，好象在问：“什么？有一个人要出卖你？”老雅各表现惊奇，两臂张开，身体稍向后仰，似乎在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呀！”年轻的腓力两手扪胸，

表示自己的忠诚、善良："难道能怀疑我对老师有变节行为?"而犹大、约翰、老彼得（左边靠近耶稣）特别富于表情，表现了较复杂的心理状态。约翰的温顺、年轻大有不胜愤怒之情；老彼得情绪激动，从自己座位上跳起来，把头伸向约翰耳边，对约翰耳语："你知道谁是叛徒?"右手紧紧握着刚切了面包的刀，无意识地接近犹大胁部，暗示要用它来对付那个没被揭露出来的叛徒。

上述 11 门徒都朝向耶稣。唯独约翰旁边的犹大表现不同。众人向心，他则离心。听到耶稣的话后，引起他闪电般的反应，神情惊慌，如野兽般地把身子一横，身体稍向后仰，想把自己置于事外，右手在无意中把出卖耶稣的钱袋抓紧。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惊，左手在耶稣面前拉回食器，弄翻了小盐壶。这一切显示出犹大面目的阴险、狡诈、杀气。

达·芬奇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充分暴露了叛徒的丑恶灵魂，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它热情歌颂了耶稣的光明正大，门徒们的忠诚善良和嫉恶如仇；同时，猛烈地鞭挞叛徒的丑恶灵魂。这种爱憎分明的感情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是达·芬

奇从当时意大利人民争取祖国统一、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感受到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意大利人民的斗争意志和道德标准，给人以巨大精神鼓舞。

达·芬奇在创作这一作品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饶有兴趣的故事。修道院院长对达·芬奇绘画工作进展缓慢表示不满，一再催促他赶紧画完，认为他有时大半天在画前沉思，完全是浪费时间。要求他像他菜园里的雇工一样，昼夜劳动，永不停笔。这样催促还不算，他竟跑到米兰公爵那里喋喋不休地抱怨。公爵无可奈何，只好派人把达·芬奇请来，并把院长的意思婉转地告诉了他。达·芬奇不屑辩解，只说他即将完成这幅壁画，现在画中还缺少两个头像，一个是救世主耶稣，另一个是叛徒犹大。他辛辣地对公爵说，后一个空缺，他还要尽力去找，万一找不到合适的，他准备借用一下这位无理捣乱的院长的头。

公爵听后大笑不止，把在场的院长弄得十分尴尬，悄悄地溜走了，以后再也不来打扰达·芬奇了。

成功与失败总是不断交替陪伴着达·芬

奇。他在佛罗伦萨逗留期间所作的肖像画《蒙娜丽莎》却获得惊人的成功。

蒙娜丽莎是该城皮货商乔孔达的妻子，年方 24 岁，刚刚失去心爱的女儿，常怀哀愁与抑郁。达·芬奇为了使她一舒愁郁，请来了弹竖琴和唱歌的人，邀来了小丑，在庭院里布置了鸟儿花草，甚至还给她讲故事。终于，她那嫣然一笑的神情，擦过脸庞的一丝笑意永久地留在了画家的画布上。

数百年来，这件作品曾使目睹者为之倾倒，激起千般情思、万般悬想。她的眼睛别具神采，双眸明亮，略带湿润，脉脉含情。脸颊隐现两个酒窝，嘴角微皱，极其自然的双唇传达了蒙娜丽莎会心的微笑。她那蒙着黑纱的两绺长发，很自然地披在肩上，她那袒露的胸脯，有着妇女细嫩皮肤的质感，显示出健康的生气勃勃的女性美。似乎是高兴，又似乎有点生气；似乎是喜欢你，又似乎有点蔑视你。无论你站在什么位置去看她，她也总是在看着你，而且有牵魂动魄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能超越时代、国界，超越阶级、信仰，令人永远怀念和追慕的。它所调动的是千千万万人的经历和想象。你可以对它作各种各

样的理解，却无法说清它的含意究竟是什么。因此，人们把它称为“神秘的微笑”。达·芬奇自己也被那神秘力量给迷住了。他把这件作品放在身边，直到离开人世。

1519年5月2日，这位文艺复兴时代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匠、站在时代前列的巨人中的巨人走了。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曾这样写道：

“只有一个列奥纳多·达·芬奇走在时代之前，发明一切近代观念和近代知识；他是个包罗万象、精湛无比的天才，永不满足的孤独的探险家；他的预见超过他的时代，有时竟和我们时代会合。”

达·芬奇学生梅尔兹在他死后写道，“列奥纳多的逝世是每一个人的损失，……大自然没有能力重造这样一位伟人”了。

市民英雄的创造者

如果说达·芬奇的作品精深、智慧，擅长人物内心刻画，表现感情细腻入微，米开朗基罗则以雄壮刚健，充满活力著称，被誉为“市民英雄的创造者”。

这位出生在卡普莱斯镇（距佛罗伦萨不远），由奶妈抚养大的文艺巨匠，从他懂事起就熟悉了雕凿之声，目睹石刻上的种种形象，从小就喜欢雕刻和绘画。后来他和瓦萨利开玩笑说："乔尔乔！如果我有什么好本领的话，那是从你的故乡阿列佐的温和气候得来的；而靠了我奶妈的奶，我才拿得起雕刻刀和锤子来创造雕像的。"

1489年他进入佛罗伦萨银行家"无冕之王"豪华者罗棱索、美第奇创办的美术学校学习，为以后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这里也开始了他自己的创作生涯。《标旁的圣母》成为后来装饰西斯廷礼堂拱门的那些巫女的模型。从背面看到的婴儿基督的大胆的转身，说明着潜藏的力量。人物形象宏伟、庄严。

显示人体完美的《大卫》是即将战斗的一刹那间的形象。强健的体魄，每一块肌肉都刻画得充满青春活力，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米开朗基罗把爱国主义这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娴熟的雕刻语言表现得极其生动，显示了人物坚决、勇敢、机智与无畏的英雄气概，准备要用全身力气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这与当时

意大利人民的民族情绪高度融合。那《被缚的奴隶》似乎内部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内心世界的愤怒，通过富有动感的躯体不可压抑地迸发出来。他被反绑的双臂，强烈扭曲的身躯，绷紧的肌肉，使得缚在他胸前的绳子显得脆弱无力。他高高昂起自己的头，睁大双眼，双唇紧抿，显示出决不屈服于自己被束缚的命运，渴望获得解放。

智慧、非凡的《摩西》炯炯有神的目光怒视前方，对叛逆者表现出不可饶恕的憎恨。怒火如焚，简直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但又正强压心中怒火，抑制自己的感情。作品显示出摩西英明、智慧、刚毅、果敢的英雄气质，像是一位执法如山、公正无私的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青筋暴出的血管，似乎正沸腾着生命的血液。米开朗基罗以理想化的健美和巨人般的力量形象，寄托着自己的理想，表述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期待一位有力的英雄人物去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对黑暗长《夜》的痛苦失望、忧国忧民思想感情体现在《夜》这个妇女形象之中。这位妇女很不舒服地沉睡着，显露忧郁、困惑和沉迷不醒的表情。但是她那沉寂在黑夜中的女性的躯体，

既不是娇弱的，也丝毫没有因痛若的折磨而变丑的痕迹。她那饱满、雄健的身躯，不仅体现着女性的刚柔兼蓄的美丽，而且富有弹性的躯体，透露出旺盛的精力和蓬勃的生机，仿佛正在酣睡的巨人，一旦醒来，她将迸发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实际是当时被蹂躏的意大利现实的生动写照。这是米开朗基罗以艺术为武器向反动黑暗势力进攻。正如诗人乔凡尼·斯特洛茨依的赞美诗：

夜，为你所看到妩媚地睡着的夜，
那是受天使点化过的一块活的石头；
她睡着，但她具有生命的火焰，
只要你叫她醒来——她将与你说话。

站在先进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米开朗基罗，把矛头直接指向中世纪教会的黑暗势力。他所痛恨的教皇及其爪牙作为罪恶的代表赤裸裸地站在基督面前，接受《末日审判》。当时教皇由他的司礼官赛斯纳陪同来看完成了3/4的画面。司礼官对画持否定态度，他恶意地认为：

“太无耻了，把这么赤身裸体的人画在这种

神圣的地方（因这是西斯廷大教堂的一幅壁画），这些人不知羞耻，竟把猥亵的地方都露出来了。像这样东西，只配装饰浴室和旅馆，不应该放在这样庄严的场所。”

米开朗基罗非常气愤，便把司礼官的形象画做大蛇缠身的长着驴耳的灵魂形象。尽管赛斯纳一再请求教皇保罗三世要求米开朗基罗去掉这个画像，大师予以拒绝。教皇对赛斯纳嘲笑地说：

“如果米开朗基罗把你放在炼狱中，我还可以设法救你出来，但他把你放在地狱里，那是我无能为力了。”

这个司礼官的形象就这样保存下来。当时正值教会提倡“贞洁运动”，反动势力日益嚣张之时，米开朗基罗将画中所有的人物：基督、圣徒甚至圣母，无论圣贤还是魔鬼，不论善恶都一律画成裸体。这开创先例的无比勇敢的“渎神”行为，遭到教会反动势力的攻击，被扣上异端的罪名。他们纷纷要求毁掉这幅画。但教皇迫于艺术家创作的成功和群众的拥护，认为不宜公开刷掉它，而授命画家伏尔泰拉给这些裸体人物画上“遮羞布”！这个画家因此获得了一个轻蔑

的绰号："穿裤子的人"。大师死后32年（1596年）教皇克列门八世还想涂掉这幅不朽的杰作，遭到罗马圣路卡美术学院师生的反对，才未得逞。可见米开朗基罗的艺术追求与教会企图强加于人的思想是多么格格不入。

虽然有黑暗、反动封建势力的压迫，但他的全部艺术创作充满了积极的人文主义战斗精神——显示出崇高的道德品质和自由的意志，是理想中英雄的颂歌。"在这种奴隶和寂寞的情况下，在岔道上，在精神极端贫乏之中，我应该从事自己的神圣的创作。"内忧外患，"神圣而痛苦的生涯"，使他非凡的、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他在孤独中奋斗，终身未娶。他的艺术天才被禁锢在宗教题材的樊笼之中，无法尽情挥洒。

1564年2月18日，一代巨匠与世长辞。叶落归根，佛罗伦萨人民将他安葬在佛罗伦萨圣罗棱索教堂，实现了他的遗愿。正如他在《夜》这件作品上所写的：

睡眠是甜蜜的，
更愿意化为石头，

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
不要活着，不要觉得生命令人羡慕，
静一些，朋友，别惊醒。

大师走了，也带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璀璨光环。美术开始由盛转衰。正如法国文豪罗曼·罗兰所指出的，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最伟大也是最后的一个市民”。

大自然感到了败亡的恐惧

“为了创造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我不得不观察许多美丽的妇女，然后选出那最美的一个作为我的模特儿。”

“由于美的人太少了，因此在创作时我不得不求助我的头脑中已形成的和我正搜寻的理想美的形象。”

温顺听话的拉斐尔·桑西，思想深度不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但具有强烈的个性；他的艺术不像达·芬奇那样深湛、含蓄和富于理智，也不象米开朗基罗的那样雄健有力和充满激情。他以优雅、和谐、秀美的作品，为我们创造了许多理想美，特别是女性美的形象，为后人

所难以企及。

勤奋的拉斐尔于1504年来到佛罗伦萨。这座中世纪的名城住着名满当世的前辈大师。艺术视野豁然开朗，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当时，米开朗基罗是画坛上的少壮派，建树多，名气大，青铜雕塑名作《大卫》已问世。精力盛旺的达·芬奇正在创作绝代佳作《蒙娜丽莎》。作为初出茅庐的小字辈，拉斐尔能否在天才辈出的行列里崭露头角，还是个未知数。拉斐尔以他艺术敏锐把握住了大师们的长处。他向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学习，向佛罗伦萨前辈们的优秀作品学习。

“他认识到在他成为大师之前，他必须再做一次学生。”他研究了马萨乔的壁画、多纳太罗的雕刻和浮雕，摹绘米开朗基罗的雕像、草稿以及巴纳依奥罗、曼坦那、西略累利（都是著名的艺术大师）等人的绘画。

他画的那些温柔美丽的圣母与圣婴，形象生动、节奏明快，赢得了佛罗伦萨画坛的好评。在《花园中的圣母》稍稍侧身坐着，照看两个正在嬉戏的孩子。耶稣站在母亲的脚上，由她一手扶着，一手拉着，母子相视微笑。从画中可看出

慈母之心和耶稣的逗人可爱。一膝跪在她身旁的是圣约翰，他身披毛氅，右手执十字架杖，温柔地望着耶稣。优美的田园风光，轻描淡写出几座深绿色的远山，一条平静的河流，肥沃怡人的田畴，疏朗不动摇的树，轻灵苗条的倩影。鲜花覆盖着地面。天上，有朵朵轻盈白云，映着柔和的微光。这一切是多么亲切、和谐、幽静、典雅而又富有诗意。

拉斐尔用世俗化的描写方法来处理圣母圣子，以现实生活中的母亲和儿童形象为模特儿，把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理想化。看他笔下的圣母，形象端庄、温柔、秀丽、健康、心灵纯洁，完全是现实生活在中一位年轻的洋溢着欢乐和幸福的母性，没有丝毫神秘色彩和禁欲主义气味。因此，他笔下的圣母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人们认为他描绘了典型的女性美。这充分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拉斐尔的圣母像是世俗的理想战胜基督教的修道院的理想的最突出的艺术表现之一。”时至今日，意大利女子们认为，只有长得像拉斐尔所画的圣母才能算是美貌女子。

1508 年，一个新的成功机遇扑面而来。拉

斐尔由他的同乡——建筑家布拉曼特向教皇推荐，前往罗马，在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委任下，为梵蒂冈宫廷绘制大型装饰壁画，并担任梵蒂冈古代艺术品的监护人。当时的罗马，既是古典艺术的故土，又是中世纪哥特式艺术的荟萃之地。

在这里，拉斐尔汲取了古希腊罗马艺术的严整与朴素，逐渐形成了他那博大纯朴的风格，成了卓越的壁画大师。诗神（阿波罗神）住在《帕那索斯山》上。它怡然自得地拎着琴。文艺与科学的女神们簇拥在阿波罗周围，聆听它那悦耳的琴声。

古希腊的盲歌手荷马、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人文主义先驱诗圣但丁、文艺复兴运动初期佛罗伦萨的大诗人彼得拉克以及拉斐尔同时代的文人学士和艺术家，这些古今名人聚集在帕那索斯山上，或促膝畅叙，或欢歌吟咏。艺术上的成就使拉斐尔登上了荣誉的高峰。教皇不断委以重任，求画者络绎不绝，他只得建立庞大的画坛来应酬。许多作品由他打好底稿，让自己的学生代笔。他俨然成了画坛上的一位王子，周围簇拥着众多的门徒和崇拜者。

有一次他在罗马城的街上行走，迎面碰见米开朗基罗。这位当时正在西斯廷教堂作画的大师踽踽独行，见了拉斐尔便挖苦道：

“你倒很像一位带领千军万马的将军！”

拉斐尔得意地回敬道：

“大人，你倒像一位赴法场行刑的刽子手！”

尽管见面水火不相容，但拉斐尔却在暗中研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据说，当米开朗基罗不在绘画室的时候，拉斐尔便偷偷找到有教堂钥匙的布拉曼特开门，观摩米开朗基罗绘制的壁画。画中那魁伟的人体和豪迈的气派使他大为震惊，启迪他改进自己的艺术。

另一作品风格甜美抒情。名扬遐迩的《西斯廷圣母》怀抱婴孩耶稣，脚踏迷漫云气在光明的背景中自天而降。教皇西斯廷二世身着绣衣以忠厚纯朴长者风度慕迎圣母和耶稣，并为母子指路。圣女芭芭娜虔心垂目，微露羞怯，沉浸在被圣母的伟大、亲切感动之中。两个长翅膀的小天使仰望圣母降临。圣母体态丰健优美，赤脚款步而行，柔情似水的大眼睛里蕴含悲悯，那手中托抱的婴儿似已准备献给多难的人世。裸体的圣婴健壮可爱，目光里也含着一种超乎普通婴

儿的肃穆与忧虑，俨然已做出为人类幸福献身的准备。“圣母好像在说，请你们抱去吧，他不是我的。但同时又把他紧贴在怀里，好象如果可能，她就带着他逃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用自己的奶来喂养这个并非救世主，而是自己儿子的普通婴儿。”

1520年春，他正在罗马近郊忙着为一个贵族别墅的建筑工程工作时，突然接到教皇手谕要他立即觐见，返回梵蒂冈。恭顺的拉斐尔快马加鞭，飞见教皇。满身是汗的拉斐尔在天井中见到教皇，可谈话的内容无非是像平常一样的鸡毛蒜皮的琐事。这给艺术家带来不幸。由于出汗着凉，患了严重感冒，发高烧。为他治病的庸医又给他放血，把他推进死神的怀抱。

罗马为他举行盛大、隆重的葬礼，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罗马最神圣的地方——万神祠。这是一个具有1500年悠久的古建筑。他的弟子雕刻家洛伦绰采雕刻了一座大理石圣母像放在他墓前以示怀念。他的一位密友用拉丁文写下了耐人寻味的墓志铭：

拉斐尔在这里安息，

在他生前，大自然感到了败北的恐惧；
而他一旦溘然长逝，
大自然又唯恐他死去。

我要把罗马的万神庙举起

“我要把罗马的万神庙举起，搁到和平庙的拱顶上去！”这是用人文主义的新思想、古典艺术的表现手法冲破和改造了一直被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建筑思想和建筑形式的，立志要建造古罗马时代以来最宏伟的建筑物；对欧洲建筑产生了长达数百年影响的文艺复兴盛期建筑艺术大师纳托·布拉曼特的誓愿。

罗马城的复兴以及新思潮的活跃，给布拉曼特拓展艺术才华提供了新的“大舞台”。他设计了刚健有力、气势宏伟的作品，显示出罗马的光荣伟大，鼓舞了当时人们反异族统治的斗争士气。典雅、明丽的圆形圆顶的特比多埃小礼拜堂，是带有浓郁的纪念性集中式建筑风格。地下室象征坟墓；16根多利亚式圆柱围绕的内堂象征人间教会；那高高的鼓形环状拱顶则象征天上教会。从上到下形成圆锥体形。上中下各层形

式各异，比例协调，虚实有度。在高大的鼓楼上构筑了穹顶，以统率各个局部，给人以浑然一体的美感，成为新建筑学派的完美典范，后世纷纷效法。这是16世纪意大利新建筑流派的第一件纲领性作品。

好大喜功的教皇优里乌斯二世，有着大西洋般的野心。他要征服世俗社会，建立一个世俗国家。在用战火扩大教皇领地的同时，还要宣扬他的文治之功，为自己树下不朽的丰碑。他广召天下艺术名流，在罗马城大兴土木。才华横溢的布拉曼特被委任为首席建筑师，进行改建、扩建梵蒂冈宫的工作。别出心裁的培尔维德庭园，上中下三院的建筑及设施分别围绕长长的中轴线配置，上下呼应，左右联贯，有隐有露，形成宏大统一、时空变换的整体。蜿蜒曲折的楼梯，大小相照的喷泉，高低参差的圆形小祠堂，大胆新颖的设计令人赞叹不已。在罗马的布拉曼特把文艺复兴建筑艺术的潮流推到了顶峰，意大利全民族的建筑风格形成了。

人们惊叹着这个时代的辉煌艺术，品味着宇宙和人的完美。对意大利昔日光荣历史的缅怀，激励人们去寻找不朽艺术灵魂的塑造摇篮

的过去，感怀民族的祖先对他的后代的恩赐。背衬着意大利民族的是渥大维的强力，圆形大剧场的灰宏。其实，他的子孙后代又何尝不是在追踪着祖先——古罗马大帝国的遗风。

色彩大师，上帝的宠儿

贯穿在形象上的现实主义说服力，对于人的幸福与完美的人文主义的信心，都奔放灵活地听命于这样一位画家的构思的表现手法。他的作品永远是人类艺术遗产中最宝贵的部分。是他，提香，第一个透过威尼斯水域深度看下去，抓住了它那神秘而丰富多彩的倒影。色彩战胜了一切成果。

家乡有终年白雪皑皑的山峰，奔腾而下湍急的河水，到处都能呼吸到高山地带清新的空气。从小喜欢绘画的提香常常跑到森林和田野采摘鲜花，用揉烂的花汁画画。支持他的父亲将他送往威尼斯一家画坊学艺，后来投身于威尼斯最著名的艺术家贝利尼兄弟门下。1510年后，又继承师兄乔尔乔内的事业，进入光辉灿烂的创作旺期。

生活在威尼斯多变而娇妩迷人的天空下的

提香，受到上层社会的恩宠，人世的荣誉达到了极点，像“上帝的宠儿”一样过着幸运的生活。自1520年代起他成为全欧洲最出名的画家，教皇、皇帝和意大利的领主们都来找他画画。查理五世封他为宫廷特命伯爵，给他一笔年金，查理的儿子菲利浦二世又增加了这笔收入。几乎没有一个显贵人物不和提香交往。他在自己家里接待过法国和波兰的国王，宴请过红衣大主教、王公贵族、共和国元老、政府显要以及当时的学者名流和艺术家。他不卑不亢，周旋于达官贵人之中，应付自如。他继续画各种题材的画。画威风凛凛权力无边的尊贵王者，也画无拘无束的自由想象的神话故事。他画美丽的女性形象，也画严肃的宗教题材。绘画的每一种艺术形象都在提香那里得到最高度最全面的文艺复兴表现形式。

柔和宁静的风景，裸体上散发着清新的气氛，漂亮的、调子略显寒冷的服装上色彩鲜明绚烂，这些都形成欢乐的印象。动作优美高雅的人物，洋溢着生命的魅力，仿佛娇媚人体更加从容潇洒。这到底是《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中的哪一样呢？跪着的、坐着的、站着的、张开双臂跟

在后边跑的，形态各异的使徒在升天的圣母下边组成一个坚实的矩形基础，一片半月形云朵从画面前部飘开，飘到画的纵深处去，这使圣母玛利亚身后的金色区域显得宽阔无比，像光轮一样闪闪发光。小天使们近大远小各具其形，他们面向圣母，一边飞翔玩耍，欢欣雀跃，一边靠自己的运动把载着圣母的云环推向高处，推向远方。圣母的红色长袍由于上升而翻动飘转，她蓝色的披风因上升的气流而缠绕纠结，膨胀如兜。上帝的形象根据透视缩形的原则画得只见到头部，他周围的一圈小天使画在不同强度的金光金影中，从而把画面引向终点。

作品从人间逐层一直画到天上，挥洒自如，而又不失古典风格，宗教意浓而又诗情奔放。从使徒们水手似的青铜色肉体中看到，这些形象无疑是现实生活劳动者的写实，他们显得乐观、开朗、英俊而又豪迈，洋溢着人生欢乐。画面充满世俗精神，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圣母也是一个凡俗妇女的形象。

光和色在《圣母升天》中浑然一体，相互匹配。所有这些集合在同一幅作品中，表达出绘画史上罕见的热情和感染力。再看穿着白绿衣裳

的使徒，看看白衣裳是由多少种颜色组成的，可以说，只有环礁湖，在暴风雨将来临而映出发白的天空时，人们才能理解这一整个系列的颜色。

提香生活时代的意大利依然滞留在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路线以外，它似乎由历史决定不可能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异族列强的统治下，成为封建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但意大利的进步力量依然存在，并且在文化领域里显示出他们的影响。在艺术中首尾一贯地确立进步力量的社会基础是异常软弱的，在创造新的现实主义的艺术体系时，除了保持着局部安宁的威尼斯以外，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都遇到了严重困难。与此同时，现实主义的卓越传统，在文艺复兴时代一个半世纪以来发展中人文主义理想的传播，决定了这样的美术在美学上的完整性。处于这样的背景下，提香在自己的创作中提供了现实主义的美术范例。以进步的现实主义美术和以发展前期文艺复兴的基本成就作为起点，使提香的创作灿烂辉煌。

圣母玛利亚悲哀地在一旁，3个男子抬着基督尸体准备《入殓》。画面充满着悲壮豪迈的气氛。好象基督不是宗教传说中的为人类赎罪的

受难者，而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死去的基督显示出慷慨激昂的英雄气质，尸体健美，神态安祥，给人们视死如归之感。抬着尸体的魁梧男子，行动粗犷，感情强烈。没有自责与绝望的感觉，而是充满豪壮之情，歌颂了为祖国而献身的人们的壮丽与崇高。

圣母玛利亚在孩提时代参拜神庙，深得祭师爱戴。在提香的《圣母参拜神庙》中有50个人物、3座宫殿及圣殿大门、柱廊、方碑、丘岗、树木、山脉、浓云密布的天空。在高大的灰色台阶顶上站着最高祭司和祭司。在台阶中间是一个小女孩，穿着天蓝色的衣服，绕着黄色的光环，提着衣服往上走。她身上没有一点神秘的东西，她是从生活里抓来的。她的可爱的脸蛋圆圆的，她向最高祭司伸着手，显得小心谨慎，仿佛在问大祭司要她做什么。在前景上，紧挨着台阶，提香画了一个穿天蓝色衣服，戴白色兜帽的嘟嘟囔囔的老婆子，这是一个进城赶集，牢牢守着自己的鸡蛋筐和老母鸡的地地道道的乡下女人。这个贩卖鸡蛋和鸡的老妪形象，渗透着生动的民间色彩，这是对现实生活的写照。

看着自画像中的72岁的提香，越过桌面审

视自然。这个自然在他年轻时曾给他无数的教益，而现在，他的眼力也许有点衰退了。他的蓝衣服现在变成耀眼的红橙色，更适于冬季穿戴。老人依然形体宽阔，他横越整个画板坐在方桌后，以占取更大的空间。他深沉的双眼和脖子上珊瑚色项链衬托下的鲜红嘴唇，都表示这位色彩大师技艺不减当年，脸和手不用天然肉色，而是在袖子、衬衫和背景的大片桔色影映下发生变色。大胆而有棱色的笔触可以一划划看得很清楚，脸侧面那青灰加黑的大块阴影并没有强烈到足以使绯红的脸庞稍有减弱的程度。那些调配得灼人的色彩被一束深藏的光照耀着，即使眼睛不好也能看得见，它使人们整个心身都感到由衷的温暖。

提香艺术形象的"健美通过色彩表现出来。"他在画布上涂满了大块颜色，好象是为了进一步的表现打下底子。这个底子初步确定了中间调子。他所使用的画笔，有时蘸上黑色或黄色，画出了明亮部分的起伏凹凸。他以如此卓绝的才智，仅仅把画笔挥了几下，便使一块空白的画布上显现出美丽的人体的雏形来……他打好这些珍贵的底子后，就把画布反转，甚至连一眼

也不去瞧它们。当他再度拿起这些画布时，就极端严格地察看他们，简直把它们当成凶恶的敌人一样，以期发现什么缺点。他尽可能找出与构思有丝毫不合的地方，然后像一个良医那样动起手来，对恶瘤绝不怜悯，割去了烂肉，矫正了手足部位……随后，他在那个代表最本质的因素的骨头架上，画出了活生生的人体。他不断挥动画笔，直到人体逼真得似乎除了呼吸以外，其他都与真人一样时为止。他决不仅仅依靠最初的即象描绘人体，并始终坚信即兴的诗人不可能写出智慧的、真正具有任何格律的诗句来。他用手轻轻擦着，以作最后的修正，使最亮部分得以缓和地渡向中间色调，并把一种色阶涂抹到另一种色阶中去。有时，他使用同一只手指加强了某一部分的阴影，或是把红得像鲜血一样的颜色抹上去，为了要使画面生动起来……在作画的最后阶段中，他使用手指的时候要比真正用画笔的时候为多。

不为同时代人理解的艺术家

人物只有从他个人情绪的感染力上方才显得出类拔萃。吸引尼德兰具有卓绝才华的画家

古斯注意的是悲怆的感受。在他的作品中，情感上洋溢的主动精神及主要形象上完全个人的动人心弦的仁慈倾向得到了发展。圣母玛利亚几乎像一个弱不禁风，郁郁寡欢的少女。仅仅用一半珍珠作为装饰的玛利亚，笨手笨脚地抱着婴儿，她有大而圆的前额和半垂的眼睑，这是一个寻常的并无任何突出的外表，然而却隐藏着深远的精神世界。作品清清楚楚地表现了把人物中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壮丽揭示出来的渴望。

古斯达到了使形象具有动人心魄的感染力的境界。他所刻划的造型表现力不比意大利画家们逊色。波澜壮阔的激情，能够理解事件的重大伦理意义的天赋从每一个人物身上明确地被揭示出来，并且奠定了形象的基础。也许，在尼德兰这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成就在著名的作品《鲍第纳里祭坛》上得到了更加卓越的体现。玛利亚的姿势是迟钝的，拙笨的手压皱了圣经书页。深色背景衬托出张开翅膀，伸出爪子的鸽子。玛利亚郁郁不乐，动作却显得十分温和。天使有一对浅色、清澈的眼睛。天使的动作里贯串着精神的紧张，鼓动翅膀看起来不是表明突然出现的情节，而是感情的折光和反射。形象富有

表现力，洋溢着音乐气氛。揭开祭坛又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婴儿面对观众，上面是倾斜地俯下头来的合着掌的几乎有些拱背的玛利亚，两翼的屏风表现了动态活跃的向心倾向。左边是鲍第纳里家族中跪着的一群男子，睥睨一切。处于这一群男子之上的是圣徒多马与安东尼·亚拔的魁梧沉重的形体。庇护圣徒们的形体厚重沉静，色调浓艳，而人物的精神世界以感情的爽朗与热烈而引人入胜。右边的屏风空间特别明净，仿佛充满着潮湿的大气。形象的感情是秘而不宣的，只有马加丽特摇曳生姿的动作，苍白脸孔上细腻的不对称的因素，祭坛捐献人之妻玛利亚、巴隆采里浮光掠影的表情，透露出了她们感情的玄奥与虔诚。

约瑟埋头沉思，其令人信服的真实性，由于和跪着的天使相毗邻而显得更加明确。跪着的天使有一张毫无动静的长脸孔，细细的眼睛里露出也是毫无动静的仿佛入定的目光。为了和天使秀丽苍白的脸孔相适应，和紧张的静止状态相对照，在天使的头上，古斯安排了像摇晃着的露珠似的系在一支高竿的珊瑚上的3颗珍珠。真实的生理上的描写和从情绪上产生联想

的刻划相结合，使中央屏风上的整个左侧具有深广而突出的激动人心的感染力。在一群牧人欢乐的精神净化中，看到婴儿的一个牧人有一张粗枝大叶的脸孔、略为张开的嘴巴和紧张的目光，另外一个牧人已经看到了奇迹。一个老年人，他的粗糙脸孔由于温和的微笑而熠熠发光，青筋嶙嶙的两手带着为他本人所不熟悉的感情合起了掌。人物表现出最纯洁、最深广的精神动态过程。

激情沸腾的，感情净化的或是由于预见灾难而悲戚苦闷的人们和天使们，为这一事件里隐藏着的意义所震惊或激动的人们和天使们，构成了环绕着马利亚的精神与心理境界。在马利亚身上贯穿着所有围绕着她的人们的情绪的各种迹象：约瑟的悲痛，天使们郁郁不乐的沉思、牧人们精神上的净化。而马利亚的形象则对所有的人投射出了她温顺与纯洁的折光。作品表达出艺术家对于人的精神潜力的信心，描绘了捐献人的自信，在光线的逐渐暗淡中形成了深沉、庄重的境界。

艺术家在行将结束一生时进入了修道院，这大概是对这位画家的艺术起决定作用的悲剧

性矛盾的反映。

大胆独创的古典主义大师

他是法国人，却长期居住意大利。他用他喜欢的画笔描绘了崇高、庄严、肃穆的场面。出生在诺曼府省莱桑德利村的普逊，自幼便喜欢绘画，致使父亲也改变了要他当律师或法官的初衷。画家康坦·瓦兰发现了富有天赋的、18岁的他，一生的命运就这样得以改变。在巴黎，他看到了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对拉斐尔的作品钦佩得五体投地。

1622年，他与别人一起受雇装饰卢森堡宫，不久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旅居巴黎的意大利诗人马里诺骑士发现普逊堪当他打算献给路易十三的诗作《安东尼斯》的插图者，于是便请他到自己家里来住。由于都对神话传说有热切的爱好，他们彼此非常投机。

1624年春，普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到达罗马，居住在外国人集聚的西班牙广场。马里诺热情地把他推荐给教皇乌尔班八世的侄子巴贝里尼红衣主教。又通过他认识了卡西亚诺·达尔·波佐，并成为密友。然而不幸的是，马里

诺随即去世，巴贝里尼又很快出使法国，孤立无援的普逊陷于困境。为了继续留在意大利研究拉斐尔及其他大师的作品，他勤奋作画，不论价格如何低廉也要卖出去。1626年，巴贝里尼返回罗马，普逊也得到了一些支持。同年，他为巴贝里尼画了《攻克耶路撒冷》，次年画了《吉马尼库斯之死》，以真实动人的历史悲壮气氛赢得了罗马人的赞赏。1628年，官方委托他为圣彼得大教堂作祭坛画《圣埃拉斯迈殉教》。1630～1640年，由于对神话与历史的爱好和所具备的渊博知识，他创作了一系列出色的作品，如《阿尔卡迪亚的牧人》、《阿斯杜德的鼠疫》、《花神的王国》、《诗人的灵感》、《仙女出浴》、《酒神节》等。

普逊的名声传到自己的祖国，法王路易十三和他的重臣黎胥留希望他回国工作。经过长期考虑，普逊终于返回巴黎，担任了国王的首席画师，负责王宫内院全部绘画装饰事宜。这段时间，他为路易十三作了《耶稣基督门主圣体圣事》等画作，此外还做了许多其它工作。但宫廷的生活使他感到很不习惯，加上竞争对手的明暗攻击，他便借口探望妻子而再次返回罗马。次

年（1643年）路易十三驾崩，法国内部政治混乱，更促使普逊决心留在意大利。从此以后，他再没有离开过罗马。

他和妻子及家人简朴度日，不再追求荣誉，一心作画，在永无止境的艺术道路上探索、创作了《所罗门的判决》等艺术杰作。

普逊是位文化修养很高的画家，在文学、哲学方面有渊博的学识，对建筑学、解剖学和透视法也有较深的研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经历文艺复兴运动风暴，宗教势力日渐衰微，各国的王权普遍壮大的时期，在艺术上也盛行起一种歌颂威严，大事夸张，表现激情的风格。普逊在第一次去罗马之前，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特色。在意大利接受了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影响后，益发完善了他的独特风格。

《阿尔卡迪亚的牧人辨》是件沉静而富于哲理的作品。3个牧羊人在艰难地辨识一块墓碑上的铭文，“我曾住在阿尔卡迪亚……”阿尔卡迪亚是希腊传说中的乐土。一个年轻的牧人以询问的目光注视着一位象征造化的女人。画家在这幅作品中表达了乐土也有死亡，人生的幸福极为脆弱，而造化才是永恒的思想。

《所罗门的判决》画面情节紧张，充满了戏剧性，一位妇人向所罗门控告另一妇女用死孩偷换了她的儿子。而另一位妇人则提出了同样的控告。以智慧著称的所罗门王便命令武士把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判给争执的双方。一个欣然同意，而另一个则悲恐之极，竭力阻止国王下这样的命令。这位智慧国王就这样利用母亲的心理，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似乎难以解决的争执。画面表现了所罗门说出判决的一刹那间的场面，武士拔剑，要劈提在手的孩子，真母慌忙阻拦，哀求告免，假母则幸灾乐祸，还在气势汹汹地诬控对方，周围的人群不安地注视着眼前的事变，而所罗门高居宝座，眼里闪着智慧的光芒，表面上装出凶狠无情的样子，内心因为自己一句话就判出真伪而洋洋自得。

《花神的王国》则完全不同，显得柔美而又抒情。在花神的国度里，阳光灿烂，春风和煦，小爱神中间是翩翩起舞的花神芙洛拉。明净的蓝天驶过太阳神阿波罗的金车。花树丛中和岩石泉边是因殉情而变成植物的男女。画的色彩柔和明亮，气氛欢乐轻快。

《吉马尼库斯之死》则表现了一个悲壮肃穆

场画。吉马尼库斯是古罗马功勋卓著的统帅，被嫉妒他的罗马皇帝提比略派人下毒暗害。这位忠于祖国却遭阴谋而命在顷刻的英雄，无力地靠在枕上，妻子悲痛地掩面哭泣着。衷心拥戴自己主帅的将士们群情激愤，举手宣誓：要伸张正义，报仇雪恨。吉马尼库斯的崇高品德，通过将士的友情、忠诚和悲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普逊一贯爱好“高尚的题材”，深刻发掘主题，理智而真实地再现人物与环境，特别注意刻画精神和意境，既追摹古风，又敢于自由大胆地创造。由于他对古希腊罗马艺术十分推崇，尤其从拉斐尔和提香作品中得益非浅，后人公认他为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杰出大师。他的画外观与内蕴精神协调，浪漫与逻辑统一。高超的艺术充满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带有理性的构思。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虽汲取了希腊、罗马古典艺术的精华，却是全新的艺术佳作，特别是反对封建神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开创了近代现实主义的先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所创造的光辉璀璨的艺术，成为文化宝库中瑰丽珍宝。

第三章　揭去神秘面纱

揭去神秘面纱的泰斗

14～17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学领域产生了一大批世俗文学泰斗。他们是一批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着一个正在成长的先进的资产阶级，具有蓬勃的朝气，坚定的信心，乐观的精神和旺盛的创造力。他们多数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探讨各种问题，成功地复活古希腊、罗马文化，创建世俗文学，并把它作为反对封建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经院哲学、宗教神权、来世轮回观念的工具。他们参加反封建斗争，迫切要求消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制度。

因此，产生于这个时代的人文主义文学泰斗，大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激进思想。他们克服重重压力，没有屈服于封建势力的迫害，大

胆地向封建主义神学挑战，探索着一条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创作道路，热情歌颂新生事物，反映社会现实的种种状态，描绘了在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的人的喜怒哀乐，讴歌自然，赞美人生，突出地表现爱情和人的幸福；他们探索中世纪社会罪恶之根源，触及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阶级的种种丑恶和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衰败事实，暴露地主、封建贵族、僧侣的虚伪、荒淫和残暴；抨击了骑士制度和腐朽的封建意识；他们颂扬和充分肯定农民为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横暴虐，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这些文学家都是学识渊博，善于词令的学者，他们的文风对以后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16世纪以后，资产阶级已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经济羽毛也开始丰满，展翅腾飞。这时，人文主义者创作了大量历史剧、喜剧、悲剧、诗歌，显示了民族文学的优势和特点。他们不仅向宗教、封建势力发动进攻，给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开始寻找资本主义某些方面的弊病，予以揭露、讽刺和批判。他们的文学作品对其祖国语言文字的形成、统一和丰富都起了很大的

作用。他们以锋利的笔和尖锐的语言公开向宗教神学和封建制度宣战，用人们的信仰自由来对抗宗教迫害，用思想自由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封建枷锁。

当时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伊拉斯莫、塞万提斯、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人。他们当中的英国作家乔叟在薄伽丘的《十日谈》影响下，写下了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开辟了英国文学现实主义道路。法国作家拉伯雷创作了欧洲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巨人传》。西班牙戏剧家维加对西班牙的民族戏剧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西班牙戏剧之父”。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和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更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学巨擘，他们把欧洲文学推向高峰，他们的作品被誉为世界文化宝库中最光辉的瑰宝。

总之，粉金碎玉，光辉永存。这一时期的文学家虽有的遭到迫害，但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泰斗，为近代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近代欧洲文学的发展。

连接两个时代的诗人

中世纪的黑暗中预示着近代的黎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有人在用犀利的笔为黎明的到来与黑暗搏击抗争，这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三杰”之首，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诗人——但丁。

但丁·阿里盖利（Dante Alighieri，1265～1321）于1265年5月下旬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的骑士家庭。传说他是在双子星的光辉中降临人世的，带着“天国”的光辉，预示着他将造福于人类，让人们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但丁是他名字的简称和昵称，他的名字完整的叫法是杜兰丁。

诗人很自豪自己的家世，对自己的血统表示夸耀，自称是古罗马人的后代。的确，他的祖辈确是佛罗伦萨的贵族，他的祖先是佛罗伦萨的骑士。但丁在他的巨著《神曲》天堂篇中曾完整地叙述了他的祖先的历史和功绩。他的高祖父卡恰基达随着神圣罗马皇帝康拉德三世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侵，立下了显赫战功，被皇帝赐封为骑士。卡恰基达的妻子姓阿里盖利，生下

了第一个儿子后，取名母姓，从此，阿里盖利便成为这个家庭的姓氏了。到了但丁的父亲一代时，家道中落，开始衰败。他的父亲为了全家人的生计问题，不得不寻求职业，曾一度当过法庭文书，以微薄的收入供养全家。后来长期经商，同时兼放高利贷。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的店铺和放债上，谋取经济上的收入，对但丁并不关心，没有尽到父亲的职责，父子关系冷漠。因此但丁把自己的生父当做陌生人看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提到他的父亲。当他只有 6 岁时，他的母亲就离开他死去了，使但丁在缺乏父爱的情况下，失去了母爱，但丁更孤独了。5 年之后，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位妻子。在他经历了失去母亲的痛苦之后，18 岁时父亲也去世了。

关于但丁出生的经历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传说中，但丁的母亲生他之前，做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异梦。她在一个非常平淡的一天，舒适而悠闲的躺在床上睡觉，她梦见在一片青翠的草丛中，有一棵粗壮、高大，叶冠丰满的大树，这是一棵桂树，桂树下有一泓清泉，涓涓地流淌着。她站在高大的桂树下生了一个白胖的大男孩。男孩生出来就能吃桂树叶，喝清泉水，甚是

奇怪。男婴吃了桂树叶，喝了清泉水，转眼之间，便长成为一个成年的牧羊人。他手执羊鞭，一副成年人的模样。当他用双手去攀桂树时，因为用力太大，跌了一跤；当他挣扎着站起来时，不料却成了一只美丽的孔雀。母亲面对这只美丽的孔雀，看着它抖动着羽毛，吃了一惊，梦醒了。这时感觉到腹痛，于是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但丁。

这传说中的经历，在后人中流传。但丁逝世半个世纪后，薄伽丘对这段传说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这段传说是但丁一生事业最好的象征。他分析了这个梦中的情景，指出诞生在桂树下，预示着但丁的未来将是一代大诗人，在人们的习惯世俗中认为，代表诗人荣誉的冠冕是用桂树叶做成的；长大成了牧羊人，暗示但丁后来踏入政界，牧羊人含有平民庶人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之意；双手努力攀折桂树叶，象征着他呕心沥血地在文学领域耕耘，创作不朽的诗篇《神曲》；变成孔雀，象征他死后留下的不朽诗篇绚丽多姿。

这一段传奇色彩很浓的传说，是对但丁一生活动最好的形象概括和总结。这梦中的举动

似乎与但丁的一生中的经历有某种意义上的吻合，使但丁本人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名人更具有传奇色彩。

但丁的幼年时代失去了母亲的疼爱，是在他姐姐的照料下长大成人的。他早年曾跟随当时著名的学者勃鲁内托·拉铁尼学习拉丁文、诗学、修辞学和古典文学作品。10岁以前，但丁就已经读完了古代罗马时期作家维吉尔、奥维德和赫拉斯等人的作品。但丁非常感激拉铁尼对自己的教诲和照料，视拉铁尼为慈父严师，在《神曲》一书中，称拉铁尼为“伟大的老师”，说他具有“父亲般的形象”。是的，拉铁尼的言传身教，对但丁后来一生的创作、为人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但丁对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十分推崇，在《神曲》中称他为“导师”、“智慧的海洋”，还说“你是众诗人的火把，一切光荣归于你。”说自己是他的学生和继承者。但丁把维吉尔视为理性的象征，看成是引导自己走出人生迷途的第一位导师。也是因为如此，但丁成为第一个提出个性和理性觉醒的诗人和人文主义思潮最早的代表。

但丁青年时代是在非常繁忙的学习中度过

的。他勤奋好学，求知欲十分强烈，曾到帕多瓦、波伦那和巴黎等地大学去学习深造过，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他对各门学科的知识进行广泛的涉猎，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对美学、音乐、诗学、修辞学、古典文学、哲学、神学、伦理学、历史、天文、地理和政治都有很深的研究和爱好，这也是他之所以日后能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学者的根本原因吧。同时，这也为他日后从事政界活动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成为一个反对封建教会的斗士，用自己的笔和口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

但丁自幼喜爱诗歌。13世纪意大利诗歌深受法国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清新体”诗派，把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少年时代的但丁曾经写过一首诗，勇敢地把它献给了这个诗派的佛罗伦萨青年诗人加富尔（1259～1300）。加富尔收到但丁的诗后，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但丁对他的这种豁达、没有名人架子的态度十分感激，接到来信后欣喜若狂。从此两人建立了友谊。但丁后来曾为自己有一位年轻的诗人做朋友感到自豪，并在自己的一些诗歌中，表达了这种自豪和

高兴，高度颂扬了这件事。同时，两位年轻人的建交，也激发了但丁的创作热情。在这位年轻诗人的影响下，但丁开始接受了“清新派”的风格，开始了早年的文学创作生涯。1291 年到 1292 年，但丁写成了早期的诗歌集《新生》。这是一本 14 行诗和散文体的诗集。诗中写道：

长夜是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光，
繁星都在为我们辉煌，辉煌在天上。
爱情的大神在这里突然下降，
他来时气象庄严，真使我现在还不敢回想。
可是对我，他却好象在表示快乐，
他的手中紧握着我的热心一颗，
他的臂间抱了个睡美人，裹着轻罗。
我看见他轻轻地摇醒了那位美人，
使她战战兢兢吞下我的热心。
最后，我看见他含着悲泪，离开了凡尘。

但丁第一次依事情先后串连起来，写成了这部诗集。诗中描绘的是他对一位名叫比亚德里斯的淑女的爱恋。由于比亚德里斯后来出嫁了，不久又夭亡了，这件事对但丁打击很大，他

用半诗半文的长篇故事，抒发了他的哀痛，于是就有了《新生》。诗人认为在女主人翁死后，她的灵魂得到了新生，飞上天空，天国的光辉照着她，她的灵魂象洁白的羔羊，追求着天国的真理。全集共收集 31 首抒情短诗，各诗之间用散文连缀。《新生》歌颂理想中的爱人，洋溢着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渴望，大胆地提出了被中世纪神学所蔑视的“爱情”。但丁抒发了自己对比亚德里斯的一片纯洁、真挚的钟爱，用诗意寄托了自己的哀思，这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公开挑战，显示了人文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思想。

这部作品把抒情和叙事紧密揉和在一起，既抒发了诗人的强烈感情，又叙述了诗人的恋爱故事。

1274 年春天，但丁 9 岁时，随父亲去比亚德里斯家赴春宴，第一次见到了比亚德里斯，她也刚好 9 岁。但丁被她那美丽的相貌所倾倒。诗人在作品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次见面的情景，并且还抒发了自己的爱慕之情。比亚德里斯那天穿着合身的红衣，形象楚楚动人，她的带子和裹在她身上的各种装饰都和她那娇嫩的年纪配上了个正好。但丁一见钟情，“藏在心脏深处的

‘生命之精灵’就开始颤抖起来了”。他的心从此不再安静了，“爱情便来做了我灵魂的主人”。九年后，他们又一次在街上邂逅相遇，18岁的比亚德里斯穿着雪白的衣服，走在两位女友中间，她望着站在路旁忸怩失措的但丁，打了招呼，用她难得的盛情行了一礼。诗人异常激动，说这使他“觉得是触到无思的边际了”。

就在当天夜里，但丁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面貌庄严的神，抱着一位只裹着一条深红色被单的人，这就是比亚德里斯。神的手里拿着一颗燃烧的心，他叫醒比亚德里斯，命令她吞下了那颗燃烧的心。这颗心象征着但丁的爱情。转眼之间，神带着比亚德里斯悲哀地升天而去。这个梦象征着但丁对比亚德里斯的强烈爱情和悲剧的结局。诗人为此写了一首诗，把它献给所有“爱情的仆人”。从此但丁就“全身心都沉溺在想念那位美人的相思中去了”。

1286年，21岁的比亚德里斯和一个名叫西蒙的银行家结婚。但丁由于失意，非常痛苦，身体日渐瘦弱。1290年，比亚德里斯不幸夭亡，死时24岁。但丁对比亚德里斯的死，伤心至极，悲恸欲绝，感到一切都失去了生气，如像“连城市

也变得凋零不堪”。比亚德里斯死后一年，但丁写诗赞美比亚德里斯，寄托自己的哀思。诗人在《新生》中说比亚德里斯是“爱情的化身”。她有“说不尽的温柔，说不尽的高雅”。她的光辉“竟使天上增加了荣耀”。在诗集最后，但丁他要用“从来对于一切女性都不曾用过的话去说她”。他在《新生》一书中发誓：要创作一部绝世之作。诗人后来在伟大的《神曲》长诗中，实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诺言。在《神曲》中，比亚德里斯继维吉尔之后成为引导但丁进入天堂的第二位导师，她成为将人类引入幸福乐园的爱情象征。

《新生》这部诗集，可以说是《神曲》的先导。它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向读者披露作家隐秘思想的自传性作品。它是诗人一生中除了《神曲》之外的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自然，开创文艺复兴抒情诗之先河。

后来，但丁在《神曲》中，选择了理想中的恋人比亚德里斯为游历天堂的引路人。著名画家亨利·豪里达的油画《但丁与比亚德里斯相遇》里，描绘了但丁青年时代的美好生活。画中描绘了在春光明媚、阳光洒满佛罗伦萨共和国大地，那美丽的比亚德里斯和随从侍女漫步在

亚诺河畔。但丁从桥头走过来，他凝视着走近的比亚德里斯，既惊喜，又怅然。比亚德里斯手捧鲜花，双目直视前方，仿佛没有看见但丁，但是从此种下了相爱的幼苗。这一双情意相投的恋人在桥头相遇的情景，在画家笔下刻画得脉脉温情而富于深厚的爱慕之情。

但丁自比亚德里斯死后，日益憔悴，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他的亲友们都很关心他的身健，于是经多方努力给他介绍了一位少女来和他认识，以此来排解他的痛苦。1291年，但丁与盖玛结了婚。盖玛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温柔善良，与但丁婚后生下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但丁在参加政治活动中得到了她的支持，但丁被流放期间，盖玛一个人支撑着把儿女哺养成人。

在但丁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他对比亚德里斯的爱情；另一件事就是但丁参加了佛罗伦萨的政治斗争。

但丁生活的年代正是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而佛罗伦萨是欧洲最大和最繁荣的工商业区和文化中心，经济制度处于交替的时期；又是国内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夺权争斗的时期。这个斗争集中表现在从1215年起出现的归

尔夫党和吉伯林党的斗争上。

新兴市民阶级和小贵族的党，叫归尔夫党，该党主张依靠教皇势力统一意大利，故又称教皇党；封建贵族的党叫吉伯林党，主张依靠日耳曼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统一意大利，故又称皇帝党。两党的斗争错综复杂，各有胜负。1282年，归尔夫党最后战胜了吉伯林党，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政权。1293年，佛罗伦萨市民在民主派领袖基诺·贝拉的领导下，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正义法规》，建立了行会民主政权，由全市七大行会的代表组成最高行政机关，设6名执政官（又叫做长老）和1名“正义旗手”，任期为两个月，届时选举正义旗手为共和国最高领袖。新兴的市民阶层在共和国里处于支配地位，各行业公会中只有少数贵族分子。只是在商人和自由职业的同业公会中，贵族的势力才较大。

但丁的“骑士”世家，早已衰落，家业微薄，仅够温饱。而佛罗伦萨的政府规定，必须是参加同业公会的人才能当选为官吏。因此，但丁就参加了医药行会。但丁在青年时代，就卷入了佛罗伦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坚决支持共和派，站

在归尔夫党一边。他在24岁时，就先后参加了同阿雷佐城的吉伯林党作战的康帕迪诺战役和攻打吉伯林党盘踞的比萨战役，他作为一名战士，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战斗气慨，冲锋陷阵，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以至于英勇负伤。

1300年他以医药行会代表身份，参加佛罗伦萨市最高行政会议，被任命为6名行政官之一，从事共和国的建设工作，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白党的骨干）。白党代表银行家和商人利益，主张城市自治。当时是白党成员独揽大权，黑党（归尔夫党的另一派）代表贵族利益，主张依靠教皇势力。黑白两党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但丁虽然是白党的骨干，但是为了维护共和国的稳定，为了完成意大利的统一事业，他以全局为重，在他6月15日到8月15日两个月任期中，一方面强调两党的团结，要求所有党派放弃纷争，统一行动，服从政府命令，谴责那些闹事的党派领袖，并秉公执法，维护共和国的权威，把凡是妨害政局稳定的党派首领一律驱逐出境。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教皇干涉内政，反对贵族把持政权。驱逐的人中包括他的年青时代的挚友、著名的清新派诗人加富尔，加富尔后来病

死在流放地。为此，但丁终生引以为恨。

同时，但丁从不屈服教皇的压力，坚决反对罗马教廷伸出黑手干涉共和国的内政，挫败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企图控制佛罗伦萨的阴谋。1301 年 3 月，但丁在一次顾问会议上反对向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二世拨款，主要是因为查理二世和卜尼法斯八世勾结，企图重新征服西西里。就在这一年的 4 月 1 日到 9 月 30 日，但丁再一次参加了“百人会议”。在 6 月 19 日的两次会议上，他坚决反对支援罗马教廷向外扩张。

这几件事已经得罪了卜尼法斯八世和黑党的首领科索·多那底。二者勾结在一起，蓄谋铲除白党，攫取佛罗伦萨政权。教皇暗中盛情邀请驻扎意大利的法国军队，要求他们以平息意大利的党羽为名，开进佛罗伦萨城，帮助黑党来达到他们的目的，铲除白党。黑党的阴谋给佛罗伦萨造成了威胁。

为了佛罗伦萨的安全，为扭转危局，缓和与教皇的矛盾，市政厅于 1301 年派出 3 名使者：但丁·阿里盖利、马索·米奈贝蒂和基多·乌巴迪赴罗马城，向教皇表示他们忠于教会的诚意，宣传维护佛罗伦萨自由的目的，同时请求教

皇不要让外国军队侵入自己的国家。

卜尼法斯八世采取流氓手段，大耍花招，表面上装出接受3位使者的诚意，非常热情地接待了3位使者，并且一再保证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他是站在佛罗伦萨的立场上。他让两位使者先回去，诡称留下但丁和他进一步商量有关佛罗伦萨安全的细节问题。但实质上是害怕但丁回去可能会号召民众起来拿起武器反对异族入侵、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样会不利他们的行动，会妨碍他们夺取佛罗伦萨政权。

与此同时，教皇和黑党在暗中紧锣密鼓，加紧进行他们的阴谋。法国军队开进了佛罗伦萨城，黑党夺取了佛罗伦萨政权，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大批的白党成员被杀害。黑党终于在佛罗伦萨得势。

1301年，黑党以反对教皇、反对共和国、贪污公款罪，宣布没收但丁的全部家产，判处但丁终身流放罪，并开除公职，罚以5000小佛罗林巨款，以后永远不许担任公职。但丁拒不服罪，拒绝交付罚款。1302年3月10日，黑党对但丁又进行第二次判决，宣布缺席审判，处以火刑，一旦捉拿归案，将他烧死。在近20年的流放期

间，佛罗伦萨当局一再宣告，只要但丁交纳罚款，宣誓忏悔，则可安全还乡。但丁坚贞不屈，断然拒绝。

但丁的家属和亲戚没有受株连是因为但丁的妻子盖玛是黑党多那底家族的一个远亲，所以才得以幸免。

但丁在流放初期，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是强健的，不会被失败所击溃。他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共和国的命运，想着筹划组织力量驱逐黑党的反动统治，重新恢复那里的和平和安宁。

1302年6月8日，佛罗伦萨的政治流亡分子在离佛罗伦萨40公里处的圣戈旦佐召开了流亡分子代表会议，但丁也出席了会议。代表会议决定组织武装力量打回佛罗伦萨，推翻佛罗伦萨的现政权。会议委托但丁出面作为代表向维罗纳诸侯拔多罗谋借兵，求得拔多罗谋的帮助。

经过多次努力和争取，拔多罗谋接受了但丁的请求，借兵成功。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精心准备，严格训练，一共装备了40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结果却在1303年3月的布里诺（离佛罗伦萨城几公里的一个小镇）战役中遭到了惨

败。

1304年7月21日，政治流亡分子再度组织武装力量，重新制定计划攻打佛罗伦萨城。这一次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但是由于出了差错使整个作战方案全部乱套。一个名叫巴斯吉拉的将领立功心切，急于求成，不服从命令，单独行动，孤军深入，落入敌人圈套，中了敌人的计，使整个作战方案难以进行，导致全军处于被动局面，致使这次进攻一败涂地，攻打佛罗伦萨城成了泡影。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但丁没有失望，而是寻求新的途径来解决。但丁想通过和平手段，谋求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重返佛罗伦萨。1303年3月，卜尼法斯八世去世，新教皇本笃十一世上台后，立即派出红衣主教尼科洛·柏那多到佛罗伦萨斡旋，试图用和平方式来调解黑党和白党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黑党拒绝接受，坚决反对，于是和平的道路也被堵塞了。但丁彻底地被拒之佛罗伦萨之外。

但丁在武装斗争和和平谈判的途径都未能行得通的情况下，开始流亡各国，在许多小国的宫廷里做宾客，曾远到巴黎。他专心从事哲学和

神学研究，但不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从1304年起，他决心从事文学创作和著书立说，以笔为武器，唤醒人们去为意大利的社会改革开辟道路，为佛罗伦萨的前途而奋斗，借以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与抱负。为了找到一个安定的创作环境，他曾先后去过维罗纳、波罗格那、迦生丁、米兰、福而利、阿雷左、比萨，还到巴黎等地从事写作。1304～1307年间，他撰写了《宴会》和《论俗语》等作品。

《宴会》是一部政治和哲学性质的14行体抒情诗，它为意大利语奠定了学术散文体裁的基础，本文共四卷。《宴会》一书的内容有哲学、文学、政治、伦理等，但丁借解释自己的一些诗歌形式，以通俗性和知识性的方法撰写出来，把他的丰富知识作为精神食粮献给人民，故名《宴会》。可惜的是这部著作未完成，写了一小部分就搁笔了，它包括一篇序文和三篇文章，其中主要是论述他的美学思想。书中称赞俗语是丰富的，提出文学的思想内容重于形式，应该重视；作品的好坏在于思想性，作品的美丑在于言语形式的修饰，二者都应注意，但更应重视做人的善行。他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犹如

一匹马对于一个军人一样，最好的马才最适合于最好的军人，最好的语言才最适合于最好的思想内容。他在谈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时指出："每一部作品中的善与美是彼此不同的，各自分离的，作品的善在于思想，美在于词章雕饰；善与美都是可喜的。"然而，"应该特别注意到它的善"。这说明他深刻地理解内容和形式都很重要，但内容应重于形式的道理。书中批判了封建等级观念，认为人的真正的高贵，在于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而不在于出身和门第。

《论俗语》的内容主要是探讨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它是意大利最早的一部语言学著作。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用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取代拉丁文。鉴于意大利方言的复杂，他主张用"光辉的俗语"作为统一的标准语言，然后再"筛选"各地区俗语中的"宏伟字句"。但丁的这些思想和目标都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完成了。他的不朽的巨著作《神曲》就是用托斯坎那地区的方言撰写而成的。他以方言为基础，锤炼出一种自由表达、丰富、简捷又优美的语言。意大利一直保持着但丁时代的风格。现代意大利人读但丁的著作，要比现代英国人读莎士比亚

的著作容易得多。《神曲》诗篇的诞生为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因此但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也是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奠基人。

但丁在长期流亡中，广泛地接触意大利社会的各个阶层，了解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扩大了视野，有了丰富的社会阅历，从而加深了他对祖国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他看到了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由于彼此敌对和内讧所带来的灾难，人民生活的疾苦，也看到了罗马教廷的黑暗腐朽和反动。因此他的政治观点更加明确了。他抨击时弊，反对各邦内部的纷争，批判教廷干预各邦内政，梦想通过君主专制政权把四分五裂的祖国统一起来。

1308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要到罗马来加冕，宣布行将亲临意大利，旨在弥合各城邦之间的纷争，使流亡者回归家乡，给意大利带去和平和安宁。

消息传来，但丁振奋异常。当时他正在巴黎，立即启程，匆匆赶回到意大利。他给意大利各邦统治者写信，谨请他们归顺皇帝，接受和平。他的信里充满信心和热情的渴望，认定和平

统一的意大利将会到来。他的心情兴奋不已，甚至放下手中的《神曲》撰写工作，为亨利七世的到来四处奔走。除了用书信的方式以外，还到处去说服、动员他所认识的和敬佩的人参加这一和平统一祖国的活动，同时，还不辞辛苦，亲自到米兰、福而利、阿雷左，同分散在各地的同党联系，号召他们支持这一行动。为了稳妥，促使皇帝早日驾临意大利，他亲自写信给皇帝。在这时他写了一部《王政论》。

《王政论》是为反驳敌视皇帝到来的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和教皇克列门五世手下的一伙御用文人而作。此时这些人正在挖空心思，摇动笔杆子，攻击亨利七世，否认他的权力。全书共分3部，每一部分讨论一个问题。在第一部里，他用巧妙的逻辑论证了皇帝的权力应放在教皇之上，能使世界处于太平环境，使意大利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再受僧权的控制。这充分反映出但丁把希望寄托在世俗王权身上。他强调只有皇帝才能把分裂的意大利统一起来，从理论上论述了建立君主政权的必要性。值得提出的是，他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政教分离、政治和宗教平等的思想，向神权思想进行了英勇的挑战，

反对教皇干预世俗政权。第二部里，他考察了欧洲的历史，证明皇帝的称号应该是“罗马皇帝”，并把王朝设在罗马，驱逐教皇；诗人认为教皇的使命是管理人类的精神生活，而皇帝的职责是把人类引导到人间幸福的世界。但丁指出教皇是意大利统一的障碍，它的统治只能加剧意大利的分裂局面。因此，他反对教皇，拥护建立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三部里，他大力驳斥教皇与皇帝同受于天的论调，认为皇帝的权力直接受命于上帝。这反映了意大利新兴市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表达了人民渴望建立统一国家的意志。

但丁的《王政论》正是中世纪教皇与皇帝争夺最高权力时，代表了皇帝这一派。但是，把统一祖国的伟大抱负，寄托在异邦的野心勃勃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身上，是不现实的。

1310 年，亨利七世亲征到意大利本土，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起来坚决反对。为此，但丁写了《致穷凶极恶的佛罗伦萨人》一书，愤怒声讨他们的罪行。同年他上书亨利七世，恳请他尽快出兵佛罗伦萨。

他终于等到了这天，1312 年，亨利七世率

兵进军佛罗伦萨，却遭到抵抗。更让但丁失望的是，皇帝在行军中偶感风寒，高烧不退，不久就死在途中。这对但丁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他决心彻底脱离政治生涯。

1315年5月，佛罗伦萨黑党统治者宣布对流放者宣布特赦，但丁也在其中。但返回佛罗伦萨的条件十分苛刻，除了要交付罚金外，还要公开认罪，即进城以后首先入狱，然后再头带僧帽，手拿蜡烛，游街示众，到圣约翰教堂俯首忏悔。但丁严词拒绝了在这种苛刻的条件下返回。他说：

"这实在不是使我重返祖国的办法，要是有别的好法子，不要玷污了我的人格和名誉，我很愿意接受。像这样的让我回国，那我是永远不愿回去了。"

但丁继续过着流亡的生活。他晚年住在拉文纳古城，这里较为安定，在这里他着力于《神曲》的创作。多年的流亡生涯，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对社会问题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他的政治遭遇和意大利复杂的社会条件，使他创作的《神曲》可同中国屈原的《离骚》相媲美。他们都在不同

的国家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但丁的《神曲》反映了中古时期社会的政治思想，交织着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的观念；屈原的《离骚》包含着楚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其对哲学、神学和自然现象的观念，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就。

但丁的《神曲》创作于1300年至1321年之间，全书由14233行连环韵体诗组成，共100篇，是一部长篇诗集。全诗共分三部分：《地狱》完成于1308年；《炼狱》完成于1313年；《天堂》的最后13歌完成于1321年，据薄伽丘的考证，是但丁的儿子加各伯所续。

《神曲》原名《喜剧》，后人为了表示对诗人的崇敬，给这部巨作冠以“神圣”二字，故名《神圣的喜剧》，汉文通译为《神曲》。全诗用白话拉丁文写成。书中的情节是描写但丁假托自己梦游“地狱”、“净界”、“天堂”三界的经过——但丁从35岁那年的4月8日入梦，至4月14日梦醒，历时一周。

在这段时间里，经拉文纳统治者基多·诺勿罗的精心安排，但丁把他的妻子盖玛接到了拉文纳。他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了，女儿安托妮娅决心弃俗，以“贝德丽斯”为教名，当了修女。

两个儿子加各伯和比罗后来都成为诗人和研究《神曲》的学者。骨肉团聚，亲人相见，使但丁晚年终于在20多年的坎坷流亡生活之后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也许是定数吧，在诗人与亲人相聚不久的1321年，“天堂”篇刚刚写完，但丁便受基多·诺勿罗之托，出使威尼斯，不幸染上了疟疾，同年9月14日逝世于拉文纳。拉文纳人民隆重地举行了葬礼，给诗人戴上了桂冠，安葬在圣弗兰西斯寺院。

但丁生前，当他的《神曲》“地狱篇”和“炼狱篇”于1320年出版后，他相信全书出版之时，佛罗伦萨人民会请他回家乡，给他戴上桂冠。因此当波伦那大学在授予他桂冠诗人称号时，他婉言谢绝了。几个世纪后，佛罗伦萨人想把但丁的墓迁回故乡，市政府在圣克罗斯教堂修筑了豪华的墓冢。此事却遭到了拉文纳人民的反对和抨击。他们认为但丁是拉文纳的光荣，他们讥讽佛罗伦萨人：“诗人活着的时候，被拒之门外，诗人死了，却要迎回他的遗骨！”时至今日，佛罗伦萨的但丁墓仍是空的。

《神曲》全篇共计14233行。据薄伽丘考证，

但丁谢世后，最后13歌的原稿并未找到。但丁的亲友建议加各伯和比罗续完其父的诗作。在但丁逝世数月后的一天，加各伯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父亲，儿子见父亲脸上放着神光，大吃一惊，问道："父亲，你还活着吗?"父亲说："在人世中，我是死了，但在永存的世界中，我还活着。"加各伯问起《天堂篇》最后13歌原稿时，但丁说已经写完了。父亲说完就牵着儿子的手，把他带到书房，指明了藏书稿的地方。加各伯梦醒以后不等天明，就唤醒了但丁的弟子齐阿迭诺，找到但丁的书房（实际是但丁生前的卧室，经常用来写作的地方）按照但丁梦中的指点，终于在墙上一个小洞里找到了最后13歌原稿。

这段轶闻是否是真实的我们无从证明。但有一点，但丁生前确实没有发表最后13歌，而且死后也未见原稿。是否是最后13歌由但丁的儿子加各伯来完成的，还是在但丁初稿上加工整理，都无从判断。但有一点倒是有趣：最后13歌的韵律风格、思想内容与但丁的整个作品是完全吻合的。

《神曲》的大概情节是写作者自己假托梦幻神游"地狱"、"炼狱"、"天堂"三界。但丁入梦

的时间是1300年4月8日，诗人此时已是人近中年了，走上了“人生旅途的中段”。这天黄昏之际，但丁在一座黑暗的森林（森林象征罪恶）之中迷了路。黎明时，来到一座洒满阳光的小山脚下，他刚想爬上去，突然出现3只张牙舞爪的野兽豹子、狮子和母狼（象征淫欲、强暴和贪婪），挡其去路。前有猛兽，后有幽谷，但丁在这进退维谷的时候，忽然他的第一个导师古罗马的伟大诗人维吉尔出现在他面前，说他受比德里亚斯之托来帮助但丁的，引导他走另一条通向“幸福之国”的路。维吉尔引导着诗人走过了地狱和炼狱。

地狱形似下窄上宽的大漏斗，共分9层，其苦境是愈下愈深，下地狱者是一些罪恶的灵魂，罪恶越大，住的层次愈下。炼狱是有赎罪性质的地方，比地狱的惩罚轻，犯有轻微的过失者在此忏悔、修炼、洗心革面。维吉尔的灵魂把但丁引导到此处就隐没不见了。比德里亚斯出现了，由她带领但丁游天堂。天堂是幸福精灵的住所，共有9重天，比德里亚斯把但丁引导到第九重天，便将他交给圣伯纳特，自己归于幸福的玫瑰中了。圣伯纳特指引但丁谒见上帝，此时但丁大彻

大悟，见到了“最后的真理”。梦游到此结束。

但丁是一位新旧交替时代的思想家和诗人，因此他的《神曲》具有跨时代的特征。作品中真实地描绘出佛罗伦萨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社会政治变化，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中世纪欧洲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广泛画面，描绘了当时意大利新旧交替的社会生活情景，这除了使我们得到巨大的艺术享受外，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因此，《神曲》几乎包罗了中世纪的一切学问，所以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神曲》是中世纪欧洲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诗人本人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诗人虽死了，但是，在永恒的世界中，他还活着。他留给后人以无比巨大的精神遗产。但丁的名字与他的作品共同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霜雪雨，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

文艺复兴之父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著名诗人、文学史上的“三巨星”之一——弗兰西斯科·彼得拉克，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位先驱者。

他以其14行诗著称于世，被誉为“诗圣”，为欧洲抒情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与但丁、薄伽丘齐名。

彼得拉克是但丁的老乡，也是佛罗伦萨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是一位法律公证人。14世纪的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也是全欧洲最为繁荣的工商业共和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迅速，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也非常流行，发展很快，因而佛罗伦萨也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这里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党派纷争，城邦之争迭起，杂乱无章。当时但丁与老彼得拉克都是白党成员，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都卷进了政党之争，而且都遭到流放。老彼得拉克在1302年被流放到了阿雷佐。1304年7月20日，彼得拉克就出生在这里。在彼得拉克儿时，7岁以前就生活在阿雷佐，7岁时，全家迁到法国1312年，全家侨居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这里位于抒情诗的故乡普罗旺斯地区，当时是教皇驻跸所在地。

由于受教皇都城的中心地位的影响，受当地文化的熏陶，彼得拉克很快就接受这里的文明。同时，由于动荡不定的生活经历，受但丁的

影响，决定了彼得拉克未来的前途。彼得拉克从小喜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每当他读起古罗马作家维吉尔和西塞罗的作品时，就情不自禁地憧憬着人类美好的未来和诗情画意般的生活。他特别敬仰西塞罗这位古代罗马的雄辩家，追随着他的足迹。彼得拉克认为人不仅要学习，掌握知识，而且还应懂得为了公众的利益如何去传播和运用这些知识。因此他认为教育应该强调将修辞学、道德哲学、智慧和雄辩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美德的关键。然而，父亲则期盼儿子能承继自己的律师职业，在法学上有所收获，有所造就。

从 1316 年起，彼得拉克曾遵从父亲的旨意去法国的蒙特波利大学和意大利的波作那大学学习法律。但刻板的法律条文，单调的文字，实在是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因此，在父亲谢世后，彼得拉克便放弃了法律专业的学习，潜心从事文学创作。

在创作生活过程中，彼得拉克先后游历了很多地方：普洛温斯、法国、弗兰德斯和德国的一些地方，搜集希腊、罗马古典抄本，深入阅读和研究古罗马作家的著作，向意大利市民阶层

宣传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诗歌。他曾说过西塞罗和维吉尔是古典学问的“两只眼睛”，人们要吸收古代人的现实主义人学，用来观察现代的种种社会现象。

1326年，彼得拉克父亲去逝，他回到阿维农，进入宗教领域，成为一名传教士。他因职业的关系，与教廷上层人物联系密切，亲眼目睹了教皇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情景；同时，他也同佛罗伦萨的进步学者通信往来，促使他开始人文主义活动。

1327年，23岁的彼得拉克已是一位成熟、才气充溢、精力旺盛的青年。这一年的一次偶然事情，给年轻的彼得拉克带来了终生的影响。

有一天，彼得拉克在阿维农的一所教堂里进行神职工作，在众多的祈祷者中，他猛然发现了一位少妇从他身边匆匆而过。他俩互有示意。他后来才知道这位体态端庄、妩媚动人的少妇是一位骑士的妻子，名叫劳拉。彼得拉克一见钟情，从此深深地爱恋着劳拉，堕入情网。尽管岁月流逝，可是彼得拉克依然恋着她，而且有增无减。此事对彼得拉克后来的文学创作起了巨大的影响。

从1330年起，大约有17年多的时间，彼得拉克大致上是在教廷中工作。随着工作上的联系，彼得拉克跟随红衣主教乔万尼·科伦那一起参与一些宗教方面的活动。在这段日子里，彼得拉克的生活较为平稳、清闲、安逸，有大量的时间读书和写作，为其后来的成功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同时，在这漫长的教会生活中也让他亲眼看到了在宗教社会这块所谓的圣地领域中，也充满了黑暗、腐败、贪婪和虚伪，使他逐渐产生了厌恶和憎恨的情绪，逐渐产生了抗争的思想。人文主义世界观开始萌芽了，从而使他能在文艺复兴的舞台上成为巨星。

彼得拉克生活较轻松，有些豪放不羁，喜欢名山大川，探寻名胜奇观，游山赏月，这是浪漫而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但这与中世纪基督教的清规戒律是相违的。因为在中世纪基督教是蔑视世俗生活的，认为山川湖海这些自然景观是由恶魔所造，会将人们引诱到歧路上。彼得拉克冲破了宗教的束缚，表现出了一种超然和洒脱的风度，表现了市民阶级的真实情感——热爱大自然、喜爱享受大自然的美学观点。

1336年4月的一天，春光暖人，空气新鲜，

鸟鸣花香的美景深深的吸引了彼得拉克，他马上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到户外去欣赏这大自然的美，享受大自然的清新。他同自己的弟弟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攀登阿维农附近的温都克斯山。半路上遇见了一位放牧的老人，他们与老人搭话，老人劝说他们不要去爬山。讲述着自己因为在40年前因为爬这座山而摔得遍体鳞伤，不能动的痛苦经历。彼得拉克放声大笑，毫不在意，与同伴继续上路了。当天下午，他们4人最终还是兴致勃勃、激情满怀地站在了峰顶。此时，他们极目远眺，将自己全部融合在大自然中，他们看到了阿尔卑斯山雪峰、罗纳河的波涛，马赛港的船只，以及阿维农周围的村落，使他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观、真实、村落生活的纯朴与真诚。真是心旷神怡，激起了他对美好的大自然的那种世俗生活的向往，增加了他回归大自然的渴望。

从1338年起，彼得拉克断断续续用了4年时间，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阿非利加》。这首诗是彼得拉克完全仿效了古罗马作家维吉尔的文笔，采用拉丁语的韵律，用了优美的语调，描写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生动场面。战争开始

时，迦太基大将军汉尼拔是如何出动奇兵，奇迹般地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部突入意大利；罗马军是如何猝不及防，节节败退，都城被围，即将攻破。后来罗马大将军西庇阿又是如何改变战术，派兵攻入迦太基本土，迫使迦太基投降的。在彼得拉克的笔下，西庇阿被歌颂为与庞培、恺撒相媲美的罗马功臣。通过史诗的叙述也使人们对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风俗习惯以及两军的战略战术加以了解。

史诗使作者顿时名声大振诗坛。巴黎大学的学者们和罗马市政府都表示要给予诗人以桂冠的荣誉。最后他选择了罗马。1341 年 4 月 8 日正式举行了加冕仪式。这一天，彼得拉克身穿安茹王朝国王罗伯特赐给他的紫袍，在仪仗队的护拥下，诗人显得格外的兴奋、激动、神采飞扬。在通往丘彼特神庙的路上，他容光焕发，更加显得才气横溢。在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致词后，便将一顶象征文坛最高荣誉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众人发出欢呼声，亲友们也在祝贺他的成功。从此，彼得拉克就有“桂冠诗人”之称。

在彼得拉克的一生中，大量的时间还是用来研究古典文化。他利用古典文献作为捍卫思

想独立和自由的工具，把古典文化看成是反对封建迷信和宗教束缚的武器。诗人说：

“在我感兴趣的事物中，我总是着意于古典，因为当今世界对于我常常是难以忍受的。”

基于自己的这种思想，他不辞辛苦，周游各地，尤其是有古典文化遗迹的地方，到那里去收集古代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和历史文物，然后加以整理校对，反复研究阅读，并用自己的观点来加以诠释和阐述。然后把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冠以“人学”，或“人文学”之称，以此和“神学”相对抗。他曾大声呼吁要进行“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想的复兴”。因此，彼得拉克是文艺复兴的发起人之一，有“人文主义之父”之称。

1347 年，罗马爆发了以科拉·迪·里思佐为首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起义，推翻了封建政权，建立了共和国。彼得拉克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兴高采烈，拍手叫好，衷心祝愿新诞生的共和国能永久地存在下去。他是一位正义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君主不应欺压剥削自己的臣民，而应热情地关心他们的疾苦，努力办好公共事业，赈济贫民，鼓励文明的发展。

但起义不久就被镇压下去，罗马又陷入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中。彼得拉克痛惜万分，挥笔致书罗马的起义者们，表达了自己的哀惋之情。

就在这时，彼得拉克一直思恋着的意中人劳拉，不幸染上了黑死病，不幸死去。这是一次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劳拉去逝的消息传来，彼得拉克痛不欲生，借助笔端，抒发自己的痛苦，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彼得拉克的诗大多是即兴而作的诗体日记，共366首，其中14行诗317首，抒情诗29首，6行诗9首，叙事诗7首，短诗4首。全部诗集分上下两部分：《圣母劳拉之生》和《圣母劳拉之死》。彼得拉克的爱情诗冲破了禁欲主义的藩篱，一扫中世纪诗歌中隐晦寓意、神秘象征的手法，直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向往和内心世界真实活动。在他的笔下，劳拉已经不是中世纪那种矫揉造作的、卖弄风情、高不可攀的贵妇，而是一位平易近人、单纯开朗、活泼可爱的新时代的女性。由于彼得拉克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劳拉的美貌和风姿，使诗歌的格调清新，富于感染力，令人百读不厌。

当他的爱情诗传开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有不少人甚至产生了好奇或对劳拉产生了爱慕之情，不辞劳苦，从老远赶来以求得一饱眼福，想看一眼这位绝代美人。但是劳拉已经是中年妇女，早已失去了往日的丰姿和容貌，对此，那些好奇者和爱慕者失望而归。

彼得拉克的抒情诗是在继承了法国南部的骑士诗歌传统和意大利“温柔的新体”诗派爱情诗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特点是格调轻快，韵味隽永，善于借景生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我像往常一样在悲思中写作，
鸟儿的轻诉和树叶的微语在我耳边缭绕，
一条小河，傍依着两岸鲜花在和风细浪中
畅怀欢笑……。

这里，作者是试图以“花”、“鸟”、“河”、“风”的描写表达了自己肯定人生、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果说作者是借景抒情，那么读者就可以通过诗的内容和意境领会其中的人文主义

之情了。

彼得拉克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把14行诗推到了完美的程度，发展成为一种新诗体，即“彼得拉克诗体”。这种诗体被后来的乔叟、莎士比亚等著名文学家和诗人所模仿，为欧洲诗歌中一种新体诗。例如，他的诗集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由两段四行诗组成，后一部分由两段三行诗组成，押韵的格式是：ABBA，ABBA，CDE，CDE，或ABBA，ABBA，CDC，CDC。诗句每行11个音节，通常是抑扬格。这一体裁传入欧洲其它国家后，因语言的特点产生了变体。因此，他的诗为欧洲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彼得拉克被尊称为“诗圣”。

《歌集》中还有少量的爱国主义诗篇和政治讽刺诗，其中《意大利颂》最具有代表意义。当时的意大利经常遭到来自德、法、西3国的侵扰，又有教皇的干涉，各城邦之间相互混战，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目睹这种现实，诗人写道：

我的意大利啊！
纵然我的诗句不能治好

那些折磨你美好躯体上血迹斑斑的创伤，
可我的心好象生了重病，
我的叹息从庄严的海岸吹到了台伯河上。
…………
看吧，我的祖国，
你所喜爱的我的故乡，
正在为无名原因引起的战争
和那不能抑制的纠纷，
受着多么残酷的
折磨和煎熬！

这血和泪凝成的诗句，饱含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情，寄托着渴望祖国统一的愿望。同时，他在诗集中也抨击了中世纪的封建势力代表封建教会：

以前是伟大的罗马城，
现在是万恶的巴比伦，
这里是数不清的悲伤。
野蛮凶狠的庙堂，
这里是那邪教徒的寺院，引入邪途的学堂。
这里是眼泪的发源地，

是黑暗的监狱，是充满欺骗的场所。
在这里，善良被扼杀，
凶恶却在生长，
这儿是人们死前的黑夜和地狱，——
难道上帝不将惩治你？

这战斗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在黑暗的社会中的拚搏和抗争。诗人也曾用愤慨的诗句指责那些经常发动内战的封建贵族和把祖国的利益置之度外的封建诸侯们：

唉！命运把统治国家的政权
给了你们，
你们对国家并无同情之心……
你们污辱了故乡
这块最好的土地，
彼此互相残杀敌对无情……

他在呐喊：爱国的人们起来吧，“挣脱你身上沉重的锁链”，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美德，面对狂暴，拿起武器站了起来。战争立刻就要结束，因为，在意大利民众的心中，

古代的勇气尚未泯灭。”

1351年以后，他曾对意大利的统治者寄予莫大的希望，提出一些改良的方案：君主不该再是百姓的主人，而应该是父亲；君主的职责应是治理好国家，维修公共建筑和寺院，保证城市治安，疏通沼泽，维修大道，保证谷物和酒类的供应，拯救无依无靠的患病者和贫穷者，杜绝野蛮的骑士比武。这些改革措施，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对意大利的统一是肯定会做出贡献的。

彼得拉克知识渊博，造诣精深。他不仅是一位“桂冠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用拉丁文写成一本从罗慕洛到恺撒共21位罗马时代的名人和皮鲁斯·亚历山大、汉尼拔的传记，名叫《名人列传》。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以人物传记形式歌颂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让世人了解意大利的过去是历史上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来激发意大利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反衬出今日的衰落，启发人们为祖国的统一而斗争，摈弃基督教宣扬的“世界国家”的空想。《名人列传》中所透视的是作者的民族感和爱国情操，这也正是彼得拉克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一个突出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彼

得拉克在史学领域中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概念。他把自己所处的新时代同中古初期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相比较，提出古代与新时代是两个高峰，而中古时代(这里提到的“中古时代”，是这一概念的萌芽）是黑暗、野蛮的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既毁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又毁灭了“公共美德”，因而是个愚昧、倒退的时代。在彼得拉克的心中已经存在一个日后所谓“中世纪”的概念，并规定了这一概念的全部内容。这是一大创见，但他自己尚模糊不清。

彼得拉克的流亡经历和个人对大自然的偏爱，使他掌握了大量的地理方面的资料，他也阅读了许多地理方面的书籍，使他在地理方面也很有建树。他几经周折，费尽心思收集了有关意大利半岛的海岸线、亚平宁半岛的地理特征和波河平原的自然情况，终于绘制了第一张意大利地图。

同时，他又取得了另一项成功。1349年，彼得拉克与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薄伽丘相识了，薄伽丘比他小几岁，是他的狂热的崇拜者之一。两位一见如故，志同道合，谈话特别投机，

真相见恨之意，二人终于结下了终生友谊，成为挚友。

1351 年，彼得拉克毅然辞去教皇秘书的职务。后来，由薄伽丘的举荐到刚刚成立的佛罗伦萨大学任教。在任教期间，彼得拉克与薄伽丘这两位人文主义的代表进行了密切的合作，相互促进。在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下，一位名叫里昂古奥·彼拉多的希腊籍人把荷马史诗全部译成了拉丁文。

彼得拉克的晚年是在自己的祖国生活的，他仍是充满激情地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忙碌着。他行踪不定，到处奔波，时而在这个城市时而在那个城市，常常为了各个城邦之间做些交涉使者的工作，也把所有这些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对待，真诚的希望各城邦之间能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

彼得拉克是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因此时代的矛盾在他的头脑中有明显的反映。他抨击教廷的虚伪，但又长期在教廷里工作，给教皇当秘书；他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但有时又认为这是邪恶的；他热爱着祖国和人民，却不与他们联系，轻视和脱离群众；他主张人类之爱，却又有

着浓郁的个人主义色彩。而这些又都是早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所不能摆脱的矛盾心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天主教禁欲主义信条，极力宣传人的伟大和自然界的美，相信人类是有光明前途的，人类生活充满了希望；宣传现实世界是美好的，人性是真实的，神性是虚伪的，人应该充分享受精神和物质的幸福。彼得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后来各国的人文主义学者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后人们称之为“人文主义之父”。总之，彼得拉克推崇的古典文化，把古人尊之为良师益友，认真刻苦地学习他们的知识，并加以革新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这正是当时历史发展的结果。

1374年7月18日，当夜幕徐徐降落之后，当人们都在夜的安静中与家人享受着家庭的幸福之时，阿克瓦村的一栋小屋子里，一个巨人倒下了，一颗巨星在这里悄悄的陨落了：彼得拉克在工作中突然辞世了。当人们来到他的房间时，发现70岁的彼得拉克在临终前仍然伏案工作，头埋在维吉尔的手稿中，看上去就像疲倦的老人伏案睡着了。

反动的教会势力因为彼得拉克的思想激进

和对教会的蔑视而恨之入骨。在老人死后也没有放过他，将他的尸体暴尸示众，手段是极为残忍而卑鄙的。然而，彼得拉克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在他逝世不久，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后人没有忘记这位“人文主义的鼻祖”，称之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的名字与他的思想他的作品流芳百世。英国的著名诗人拜伦在游历意大利时，留下了光辉的诗篇，赞美彼得拉克的“名声传遍各国”。

树立“划时代的纪念碑”的人

在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谁也不能忘记在文学史上的“三大巨星”之一、“划时代的纪念碑”的立碑人、意大利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

乔万尼·薄伽丘是佛罗伦萨商人的后代。1313年生于巴黎市，是一个私生子。他的父亲在巴黎经商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法国姑娘，和她同居并生下了他。母亲生下儿子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带着他回到了佛罗伦萨，不久又娶了一位继母，薄伽丘是在继母的养育下长大的。

因为家境较为富有，使薄伽丘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但是，由于继母的苛刻虐待，加上父亲的严厉粗暴，家庭生活毫无乐趣和温暖，薄伽丘感到寂寞和冷落，他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度过的。

他的启蒙老师是当时佛罗伦萨著名的学者乔万尼·达·斯特拉得。薄伽丘在老师的影响下，从小就爱好文学，特别是对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自己曾说过，当他还是个7岁的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能顺口编出儿歌似的小诗，被小朋友们称为“诗人”。

薄伽丘10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了巴黎一家商店做学徒工，老薄伽丘是希望儿子长大以后能子承父业，走经商的道路。几年以后，他跟着父亲经商，给他的父亲做推销员，然而他仍然酷爱学习，对推销工作不感兴趣。他父亲非常失望，抱怨他：

“你这小淘气，买的书比卖的货要多得多。”

父亲对他的厌商好学的志向毫无办法，无可奈何。6年时间就这样一闪即逝。他父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他又送回了意大利，送到那不勒斯大学去学习法律，希望他将来成为一名

律师。然而，法律条文的枯燥和乏味，使他像对经商一样地不感兴趣。因此，在这里学习的6年时间里，法律没有学到多少，白白浪费了时间，后来他在回顾这段生活的时候说：

“我讨厌这功课，这样我又白白浪费了6年时间。老师的教诲，父亲的旨意，乃至亲朋好友的劝说，都不能使我安心向学，因为好诗是克制不了的。”

薄伽丘在学习经商和法律的过程中，浪费了12年时间。但这段生活对他的后来也是有着直接影响的。在这12年中，他借经商的机会游遍了法国、意大利的主要城市，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他学会了法语，熟悉意大利各地的方言，后来又通晓了希腊语，所有这些对他日后的创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当时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政治是较为开明的。国王罗伯特是位开明的君主，他重视人才，招贤纳才，在宫中养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当时彼得拉克就是宫廷的座上客之一。薄伽丘也很喜欢这里的社交氛围，他经常与他们来往，结识了很多的名人和学者，其中有很多是人文主义者，

彼得拉克就是他的挚友之一。通过社交，扩大了他的文化领域里的视野。特别是与彼得拉克的结识，使二者志同道合，友情甚笃，成为他后来在文学事业上的良师益友。这时他开始熟读古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奥维德和西塞罗的作品，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准备了丰实的基础。据一些史料记载，他曾在那不勒斯的维吉尔墓前发过誓：要毕生献身于文学事业。从此，他坚定了决心要走文学创作的道路。

薄伽丘在那不勒斯的生活岁月中，就已经开始着手他的文学创作了。然而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与他的感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当他还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的时候，就狂热的爱上了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玛丽娅。玛丽娅这时已经出嫁了，她长得十分漂亮，是薄伽丘理想中的女人。他在《十日谈》中有过生动的描绘。那个名叫"菲亚美达"的姑娘就是玛丽娅的化名。"菲亚美达"的原意即是"小小的火焰"，也就是永不熄灭的爱情火焰。他写道：

"菲亚美达长着一头金黄色的披肩长发，一直垂到洁白细腻的肩膀上。她那鹅蛋脸儿才真正像百合花般洁白，腮上泛着玫瑰色。一对眼睛

象鹰眼一样明亮，两瓣嘴唇有如两颗红宝石。”

据薄伽丘自己的回忆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圣罗梭索教堂遇见了玛丽娅，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双方都堕入爱河，结为情侣，变得难分难离。

这一段感情生活激发了薄伽丘的创作灵感和热情，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很多专家研究薄伽丘的作品后认为，他的《菲洛哥洛》就是根据他的这段爱情经历进行的传奇式描写的。《菲洛哥洛》是他用托茨坎那语写的第一部描写爱情生活主题的长篇小说。小说的基本情节是写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和一个异教徒青年相爱了，他们不顾世俗和宗教的压力，冲破重重阻力，实现自己的心愿，结成伉俪。这是薄伽丘的第一部较为成形的作品，也可以说是欧洲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显露出作者的文学才能和造旨，也显示了作者的写作才能。当然他的作品仍沿袭着浮华的文体和骑士文学的古代传统习惯作法，所以也不能说是他的最佳之作。

1339 年，他创作了“史诗”《苔塞伊达》，也是写“菲亚美达”的。主要内容是写两个骑士与

一位美女的感情纠葛。这是他用托茨坎那语写的第一部“英雄史诗”。他写的诗也不是很成熟的。名为“史诗”，却缺少一种诗的韵律和宏大的气魄，完全是用华丽的词藻堆砌起来的。当他读过彼得拉克的韵律优美的抒情诗后，自愧不如，曾在羞愧之下将它烧掉。

1340年，薄伽丘被父亲多次的催促召回佛罗伦萨，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年迈了，非常需要他回到父亲的身边，帮助料理商务和家里的事。当时佛罗伦萨政局动荡，新旧两种政治势力斗争异常激烈。封建贵族的势力是极力要维护封建君主政体，而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却坚决反对。那些拥护共和的是一些商人和手工业者。1342年，封建贵族终于实现了封建政权复辟。第二年，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们举行了起义，攻占了王宫，推翻了君主专制，恢复了共和国。薄伽丘站在共和政体的立场上，反对君主专制。他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并加入了佛罗伦萨的一个行会。他激情满怀，热烈欢呼共和国的胜利，对这次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赞赏到：佛罗伦萨“使那批出身高贵的狼——反复无常而又傲慢的高级贵族受到了人民法律的管辖”。这一席话已经充分地表

现出他的早期思想倾向，已经倒向资产阶级民主了。

然而他也像其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没有脱离阶级的局限性，不能超越自己的两面性：轻视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视为“没有知识的贱民”。尽管薄伽丘当时也参加了佛罗伦萨的行会和当时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但他的观点并未能脱离中世纪时代那种新旧交替时期的矛盾特征。

当薄伽丘参加佛罗伦萨的政治活动时，也未能忘记思念他的情人玛丽娅，为了寄托自己的思念，他借助笔端，写下了3部作品。

第一部作品是牧歌《爱米多》（又译做《亚美托》，1341年作）。他采取神话的方式，用半文半诗的笔调，描写了一位年轻的牧羊人，性格粗鲁，行为不端，经过爱情的点化以后，变成了一位行为高雅，风度十足的文雅青年。作品表现出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可以改变人生，重新塑造形象。这部作品以讴歌爱情为题材，在结构上与他后来创作的《十日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7个仙女各自向牧羊青年倾诉自己的爱情故事。因此，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爱米多》是

“雏形的《十日谈》”。

第二部作品是1342年创作的诗歌《似真似幻的爱情》，又称《爱情的幻影》。这是由15章诗构成的一部长诗，主要是写诗人在梦幻中由情人引导，见到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一些英雄儿女们。这部诗有些利用和模仿但丁的抒情诗形体，与但丁的《新生》可称做为姊妹篇，但是它却又阐发了新的主题和思想内容，把尘世生活与天堂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强调了“幸福在人间”，而不是在天堂，反映了作家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长诗也存在一定的缺欠：薄伽丘还是没有抛开的文字上的繁琐。因而有些让人觉得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文字游戏。这样也就损害了作品的形象。如全书每逢奇数的句子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又成为3首长诗，其中第一首是薄伽丘写给玛丽娅的献辞；而且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行的第一个字母中又隐藏着玛丽娅的名字。诗人在这部长诗中不再用“菲亚美达”这个化名，直接提到玛丽娅的名字，反映了诗人对玛丽娅思念之情，对爱情的狂热追求与执着的坦率。

第三部作品是1343～1344年创作的自叙

式的长篇小说《菲亚美达》，又称《可爱的菲亚美达》。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不再用以前惯用的手法，即采取古典神话传说的办法，而是以大胆地现实主义手段，直接面对现实，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自己描写的中心，显示了作家的魄力和先进人文主义立场。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菲亚美达就是作者本人一直爱恋着的情人玛丽娅的化身。

薄伽丘真实地而又细腻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内心情绪变化，恋、妒、哀等交织在一起，彼伏此起，精雕细刻。因此，这部小说被称做欧洲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心理小说"。在艺术形式上，这部作品也脱离了骑士文学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这一点上，《菲亚美达》为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开了先河。

1344年，薄伽丘重返那不勒斯。此时正是罗伯特国王的孙女乔凡娜执政时代，年轻美丽的女王喜好诗文，宫廷中也网罗了大批文人学者。多才多艺的薄伽丘也受到了女王的欣赏。女王常请他为自己讲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说是《十日谈》的雏形。多年来，女王与薄伽丘之间的交往很深。女王对薄伽丘十分青睐。而薄伽丘对女

王也十分地忠实，以致于后来女王谋杀了丈夫之事被世人唾弃，遭到反对派的攻击时，薄伽丘和少数人还要竭力为女王辩护。

1344～1346年间，薄伽丘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菲索拉诺的仙女》，又译《菲索拉的女神》。这部长诗描写了仙女和牧羊人的恋爱悲剧。仙女因追求尘世爱情的幸福，触犯了禁令，遭到了黛安娜女神的惩罚。这位残酷无情极为凶恶的女神，厉行禁欲主义，把这一对恋人变成了两条河，以便把他们永远分开。可是这两条河流没有屈服，最后在亚诺河汇合到一起。

薄伽丘借这个故事歌颂了勇敢而神圣纯洁的爱情，大胆地对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这部长诗是薄伽丘的诗作中最好的一部。一些精彩的片段，其语言清新，而又自然。

薄伽丘从1335年起到1346年期间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主要活动，在文学方面的探索都给他以很深刻的影响，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使他日益走向成熟。他开始放弃从前的那种习惯做法，完全脱离神话题材和浮夸的文风，而是能够面对真实的生活，面对当时的社会

背景，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这一大转变是他日后能够写出《十日谈》的基本准备。

1348年，意大利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鼠疫，佛罗伦萨也在波及范围之内。从3月到7月之间，城里的人几乎都被感染上了这种病，短时间内就死去40多人。就在这场天灾之后不久，当人们惊魂初定的时候，薄伽丘就已开始着手写作他的成名之作《十日谈》。然而，《十日谈》的写作早在薄伽丘给女王乔凡娜讲故事的时候就已经着手进行了，只是还没有正式大规模地进行。

1350年，薄伽丘因父亲去逝，不得不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返回佛罗伦萨，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座城市。这次返乡得到了佛罗伦萨政府的器重，委任他做财政总管和外交长官。为此，他浪费了很多写作时间，奔波于政务之中。他曾先后7次受命出使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罗马教廷那里他也经常光顾，甚至远到巴黎。为了外交上的事务浪费了他很多宝贵时间。当时佛罗伦萨大学刚刚落成，市政府正在招聘当代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薄伽丘极力推荐彼得拉克。1351年，他代表佛罗伦萨政府亲自到帕多瓦邀请被放逐的彼得拉克返回佛罗伦萨，并且向彼

得拉克传达了政府归还从前没收的他的财产之消息。

这时候，由于薄伽丘的极力邀请，彼得拉克辞去了教皇秘书职务，到佛罗伦萨大学任教。从此，二人通力合作，在大学领域里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353 年，薄伽丘完成了他的杰作、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这部力著从酝酿到成书，大约是 10 年的时间。这 10 年的时间里作者花费了大量心血和精力。这部著作也像但丁的《神曲》一样，是操着浓重的托斯坎那地方土语写成的。在这一点上，薄伽丘超脱了很多文人惯于追求的那种所谓“不朽”，而采用拉丁文写作。应当说，薄伽丘在这一点并没有那么追逐名誉，他无意去追求这些，然而越是这样，却使他的作品成为不朽的力著。他和他的先辈、他所敬仰的但丁都成了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

在《十日谈》的序部分有一段小故事，讲得非常生动。叙述 1348 年佛罗伦萨鼠疫流行的时候，3 名男青年和 7 名少女在圣玛丽娅·诺维拉教堂相遇，他们带着各自的仆人一块来到乡村一个风景美丽的别墅避难。他们终日悠闲自得，

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光和打发无聊，除了欢歌狂舞以外，就是欣赏自然风光，再便是胡扯一些杜撰的故事，于是就有了一些人讲的故事，并逐渐地规定每人每天轮流讲一个故事，10天之间，总共讲了100个故事，于是书的名字就取为《十日谈》。

这部故事的题材来源是十分广泛的，分别取材于一些历史传说、中世纪趣闻，或是一些名人的轶事，或是法国民间的寓言、东方民间故事，还有一些是宫廷秘闻、百姓的传言等。薄伽丘把这些素材“移植”到了意大利，然后再加以整理，创作中加上人文主义思想，富于它新的立意和时代的特点，使这些素材就变成活灵活现的故事，而且令人入谜。

在这里，薄伽丘从自己的人文主义观点和思想出发，采用幽默、尖锐、泼辣、诙谐的笔调，大胆而毫无保留地揭露了天主教的虚伪，抨击了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朽，强烈反对禁欲主义的残忍扼杀人的个性的做法，热情歌颂现实真诚的生活，主张把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感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薄伽丘的主张，完全是站在人文主义世界观的立场，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

的呼声。因此，意大利近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桑克提斯把《十日谈》和诗人但丁的《神曲》相提并论，称之为《人曲》，说作者“写出了神父的真面目”。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天主教会，向以僧侣为中心的神权统治进行了挑战，无情地揭露了僧侣们的种种丑行秽德。有一位巴黎的商人是一个犹太人，名叫亚伯拉罕。他的好友杨诺——另一个巴黎的丝绸商竭力劝说他，要他皈依基督教，放弃犹太教。他犹豫不定，说要到罗马去看个究竟再决定。亚伯拉罕来到了罗马，通过多方面的观察，发现了在天主教中，无论是神甫、教士、主教还是大主教和教皇“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爱钱如命、贪得无厌，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坏到不能坏的地步”。那世界著名的“罗马城不是一个神圣的商城，而是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然后，他从商人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基督教确实比其他宗教“神圣”，因为上帝的仆人们干出了种种坏事来破坏它的威信，“它可还是屹然不动，倒反而日益发扬光大起来”。他回到了巴黎以后，确定自己的

选择，皈依天主教。这是在《十日谈》中的第一天故事第二的内容。这个故事绝妙地讽刺了基督教的“神圣”，原来却是“寡廉鲜耻”，“无恶不作”。这样把教会的“神圣”面纱彻底揭开，使它现出了原形，它那笼罩在头上的灵光也变得暗然失色了。这个故事实质上是全书的反神权反教会的主调。

薄伽丘在这个主调下，以锋利的笔，辛辣地嘲讽禁欲主义卫道者的虚伪与狡诈。作者认为僧侣们的罪过不在于他们贪图尘世享受，而在于他们的伪装和口是心非。表面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君子的样子，背地里却干着男盗女娼的勾当。

“我亲眼看见过成千个神父都是些色中饿鬼，他们调戏、勾引民间的妇女，这还不算，竟然还要诱奸那修道女；而正是这班人在礼拜堂的讲坛上声色俱厉地谴责这种行为。”在第九天第二个故事中作者描写了一个以“圣洁”著称的女修道院长的可笑形象。有一天傍晚，寺院中捉到一个犯通奸罪的修女，交院长处理。她在匆忙之中，拿起男教士的短裤当做自己的头巾戴在头上，出现在大厅，当着众修女的面，对犯通奸

罪的修女进行威严的审讯，并宣布对她进行严厉的惩罚。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个修女不但不怕，反而只用了一句话就轻而一举的灭掉了她的威风，使修道院长当众出了大丑：

“请你先把头巾扎好，再与我说话！”

作者通过这些故事，充分地批判了僧侣们“层层叠叠的外衣”掩盖下的虚伪和行为的丑恶。

在《十日谈》中，作者反对禁欲主义，歌颂爱情。因此，他写了许多关于僧侣和修女触犯教规，寻求人间欢乐之事。第七天故事第三中，一个修道士说：

“太太，我只要脱掉这身法衣——这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男子，而不是什么修道士了。”

第三天故事第八中，一个修道院院长向农妇求欢时说：

“我虽然是一个院长，可我也和别的男人一样，是一个人呀！”

所以薄伽丘反对僧侣不结婚，反对僧侣的禁欲主义，认为这些规定是完全扼杀了人性。作者认为爱情是人的一种健康自然的感情，他赞

美那些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蔑视金钱和权势，为了幸福而义无反顾的男女青年。但是作者也抨击那些出卖色相和兽欲的无耻行为。在第七天故事第五中，作者旗帜鲜明地喊出了“爱情万岁！”的口号，甚至也呼吁“消除夫妇不睦这一类的坏事情！”作者认为真正的爱情能够鼓舞人向上，感化人，唤醒人的聪明才智和无穷尽的力量，使人具有高尚的情操。

第五天的故事第一中，作者描写一个青年名叫亚利索，他行为粗鲁，又十分愚蠢，人们叫他“西蒙”，意思是畜牲。不管父母如何教养，老师如何教诲，都不能改变他。后来，西蒙与伊菲金妮亚相爱了。在爱情的感召下，西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是从前鲁莽的、愚钝的“西蒙”，而变成一个聪明、多才而有朝气的小伙子。而且后来成长为一个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小学者。第五天故事第九中叙述了爱情还能改变人的性格，让一个斤斤计较的小人变成了一位慷慨大度的君子，可以为了别人的利益牺牲自己。在第五天故事第六中讲了爱情能使人变得勇敢无畏，不惜赴汤蹈火。

第四天的序言中作者说出了一句有相当分

量的话，他说：爱情是一种伟大的“自然力量”，它比任何“教诲要强得多”。一个虔诚天主教徒吓唬儿子说女人是“祸水”，都是一些“邪恶的东西”，并说女人的名字叫“绿鹅”。虽然他的儿子一直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从未见过女人，但是当他第一次看到女人时就认为女人的亲切、温柔、美丽，比天使的画像可亲可爱多了。因此，他要求他的父亲要“带一只绿鹅回家”。

还有一个故事是作者对那些残无人性的统治阶级的控诉：莉莎贝达的3个兄长均为富有的大商人，看到莉莎贝达与自己店中的年轻的小伙子在偷偷的恋爱，他们起了歹心，先杀死了那个年轻小伙子。妹妹痛苦地将自己的情人的头埋葬在一个漂亮的花盆里，每天守着它，不思茶饭。3个兄长竟然连这个花盆也要偷走扔掉，抛下了妹妹，然后逃跑了。莉莎贝达见情人的头颅也没有了，自己失去了生的希望，没有任何事情再让她留恋了，心力憔瘁，最终在绝望中惨死。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还充分强调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他认为人不分等级贵贱，下

层的人民往往是最聪明，最勇敢的。在第三天故事第二中，就描写了一位出身低下的马车夫与国王斗智斗勇的故事。国王的马车夫爱上了皇后，他想了个办法，为了能得到皇后，自己假扮成国王，夜中偷偷与皇后幽会、睡觉。被国王觉察后，他机智地逃跑了，国王没有抓到马车夫。作者把高贵的国王与低贱的马车夫故意放在一个故事中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去形容马车夫的健壮、高大、聪明、机智，国王的蠢笨和渺小，用国王的口说出了作者的话：就才能而论，马车夫"居此下位实在是委屈的。""这个家伙尽管出身下贱，他的头脑可不是一个下贱的人的头脑。"

《十日谈》是反映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因此写这本书的时候，作者也不是一番风顺的。在写到不过一半的时候，就遭到天主教会的攻击、威胁和迫害。作者写道：

"那一阵阵的无情狂风，刮得我天昏地黑，刮得我站不住脚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体鳞伤。"

但是，他说："我将不辞辛苦，不管那暴风刮得多猛，也要背转身来，继续我的工作。"

1497年，天主教会将许多珍贵的《十日谈》版本和其他文艺作品收集在一起，在佛罗伦萨广场上全部焚毁。

1573年，佛罗伦萨出版了教皇批准的新版本《十日谈》，把书中干坏事的僧侣都变成俗人，改变了《十日谈》的原本的原貌。但是《十日谈》仍作为欧洲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葩留传至今。

1375年12月21日，薄伽丘因过度的劳累，加上来自宗教的迫害，在佛罗伦萨的拆塔尔多镇悄然长逝。他的逝世引起了佛罗伦萨人民的无比悲痛，数以万计的人群每天去拆塔尔多镇去追悼这位人们所敬爱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精英。

英国民族语言奠基人

在文学史上很多人都知道英国中世纪时代有一位伟大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而却不知道有一位英国的另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诗歌之父——乔叟，他也不失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

杰弗利·乔叟是英国伦敦人，家里富有，父辈是一位经营酒业和皮革的商人。本来，乔叟的

祖籍是法国，祖辈随着诺曼人征服英国时来到了这里，从此就定居在这里。他的父亲为了谋生，充分显示和利用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在国王的身边谋得了一份副司膳的职业。由于他善于奉承，又在宫廷里工作，很了解宫廷生活，认识了很多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而且关系很密切。他有着强烈的欲望要进入上流社会，因此，苦心经营以便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挤进贵族的生活圈。当时，英国社会有一种风俗习惯，那就是人们都渴望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宫廷和上层社会贵族家中做侍从，把这作为一种挤入上层社会的手段。乔叟的父亲也是这样想的，而且也这样做了。

当乔叟16岁时候，父亲就靠着自己在宫中的职业之便，把儿子送进宫中，给英王爱德华三世的未来儿媳妇伊丽莎白做陪读。3年之后，当时由英、法之间为了争夺法国北部的领土进行"百年战争"，战争情势使19岁的乔叟也卷进去了。英王为了使法国尽快地投降，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乔叟当时为了忠于国王，也随着英王出征。在兰斯战役中，英军惨败，全军覆灭，乔叟当时也做了俘虏。父亲后来听说儿子做了战俘，

就遵照当时的习惯，筹集大笔资金，准备赎回儿子。可是由于财力有限，急得老乔叟寝食不安，在无奈情况下，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英王，英王立刻拿出大笔资金，帮助老乔叟赎回了自己的儿子。并且，乔叟在国王的安排下顺利地返回了英国。

乔叟回国以后，在家中闲呆了几日。这时的乔叟已是一个很出众的小伙子了，国王的第三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约翰·贡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乔叟，对乔叟的品貌都很中意，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做了侍从。这样，就给乔叟创造了一个走进上层社会的机遇。由于乔叟聪明，善解人意，很是讨主人的喜欢，而且，他办事干练、稳重，深得公爵的信任。这样，他经常随公爵出入宫廷，对宫廷中的生活内幕极为熟悉。不久，英王也很喜欢乔叟的能力、聪明和他的品貌，就提议让乔叟兼任自己的侍从骑士。从此，乔叟近水楼台先得月，更有机会参加宫中的一些重要活动。通过社交活动，使自己大开眼界，长了很多见识，积累了很多在上流社会求生存的生活经验。这为他日后在政界大展宏图作了充分的准备。

乔叟的青少年时代，应该说是很顺利的，他做侍从和陪读时，也接受了很严格的宫廷教育，也学习到了很多外边学习不到的知识，加上乔叟勤奋、聪明，阅读了很多宫廷中的藏书。通过阅读宫中的大量书卷，使乔叟的文学才华大大提高。他后来写过一本叫做《善良女子殉情记》。这是他的早期作品。在这里，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能专心致志地读书时的情景写道：

“我本人虽然才疏学浅，但却喜爱书本，打心底里尊敬它们，我捧着一本书就万事如意，任何娱乐都不容易把我调开。”

由于他的勤学苦练，终于能精通英语、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对古典名著和当时的名著都有很深透的研究和见解。在这苦斗的经历中，他终于成为一名多才多艺、博古通今的作家、学者和诗人。在这同时他参与政事，有大量的社会活动，因此，他也不失为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这些才华中，应该说诗歌是乔叟的强项，是他最善长的。他经常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即兴赋诗，而且，诗句流畅，很令人感兴趣。他的诗格调清新，语言凝炼，特别受人欢迎，流传甚广。所以，在20岁左右，他在英国诗坛就已

经名声显赫了。

乔叟在诗坛名声大振的时候，在政坛上也开始一帆风顺了。由于他善长辞令，通晓几国外语，办事干练，精力充沛，聪明机智，深得国王的青睐。1366年，爱德华三世破天荒地将他从宫廷的侍从骑士升为廷臣，并委任他做外交官。上任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受命率英国代表团到那瓦尔谈判。这一次他出色地完成了国王交给的谈判任务，深得国王的喜爱。这一年，在别人的撮合下，乔叟与皇后的贴身侍从菲莉帕·罗埃特结婚。但是，乔叟并不爱她，但由于罗埃特的妹妹是三太子兰开斯特公爵约翰·贡特的夫人，这样，乔叟与自己的主人成了连襟，他由一个宫廷廷臣一下子就成了国王的亲戚。这可以使他在政坛上平步青云，一帆风顺。这种连姻关系纯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因而，乔叟尽管文才横溢，却没有任何赞美妻子，或表达对妻子爱情的诗句。然而，这种政治婚姻确实使乔叟在政坛上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

在14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是乔叟的政治生涯处于巅峰状态的年代。这段时间他的政绩很多，也最活跃，官职逐步上升。在1372

～1373年间，他曾奉国王的命令，率领两个使者出使意大利，奔波于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等城邦国之间，为了经济和商业贸易来往上的问题，穿梭往来，费尽周折，终于完成了使命。

1374年，爱德华三世又委任他为关税督察，掌管羊毛、皮革、酒类的关税。这些物质当时是英王室的主要财政来源，把这个重要的职位给他，可见国王是对他有多么信任。1377年，他又奉国王之命，出使西属尼德兰和交战国法国就佛兰德尔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斡旋，磋商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尔归属问题。

1378年，国王爱德华三世逝世，王孙理查二世继承王位。乔叟仍受到新国王的信任，继续担任他的外交官职务，并奉命再次出使法国和意大利，为了与意大利地中海地区的贸易问题和与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尔领土归属问题。在这10多年中，他的外交活动是频繁的，也是非常辛苦的。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他乘船、乘马车出使欧洲各国，风尘仆仆，在欧洲大陆上奔波，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中，也确实显示了他的功绩卓著，才能突出。1385年，国王又任命他为肯特郡的治安官。第二年，被该郡选为骑

士，代表这个郡出席国会下议院。乔叟作为国会下议院议员，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高职位。应当说，到这为止，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状态。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政治风云突变，当时宫廷发生了政变，格洛斯特伯爵为首的政治集团推翻了查理二世，杀死了大批国王的宠臣和亲信，有一些是乔叟的亲戚和朋友，乔叟也从此受到了牵连不能再为官，被贬为庶民。这时他的生活是很贫苦的，因为没有积蓄，从不贪污受贿，因此，没有财产，贬为平民之后坐吃山空，以至于后来靠借债来度日。生活十分艰难清苦。

3 年之后，叛乱被平定，查理二世又重新恢复了王位，这给乔叟无论是政治还是生活上都带来了转机，乔叟重新被起用了，被任命为皇家建筑工程主事，主要负责维修公共建筑、公园、桥梁等工作。1391 年，他调任到索美塞特郡皇家林区任森林官，生活有了转机。但是没有多久，1399 年，英国宫廷又发生了政变，这次是亨利四世推翻了查理二世。亨利四世是乔叟的老朋友，因此，这次他不仅没有受牵连，反而比以前更受到重视和信任，待遇也比以前更优厚。

乔叟的主要成就应该说不是在政界上，而是在文学上。但必须明确的是，他的文学创作的题材往往都是与他的政治生涯紧密相连的。一方面他从政治生涯中体验了生活，有了创作的题材和灵感；另一方面，也为他的思想成熟提供了条件，因为他在深入宫廷生活中了解了封建专制的腐朽与黑暗。他的创作活动大体上可以用 3 个时期来划分："法国时期"、"意大利时期"、"成熟时期"，也叫"英国时期"。

"法国时期"大体是在 60 年代。乔叟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诗歌主要是深受法国的诗风的影响，善长爱情的题材，因此，文学史上称这段时期为"法国时期"。这时期的这个特点也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由于英国在诺曼人征服之后，受到来自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影响太大，乔叟吸收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这时期最著名的诗有《悼公爵夫人》。这是一首长篇的挽诗，为了安慰他的妹夫和主人三太子兰开斯特公爵的。1369 年三太子兰开斯特公爵第一夫人不幸病逝，诗人借悼夫人之机，抒发自己的感情，下面是一首他寄托失意的诗：

我已给悲哀完全压倒，
快乐早已没我的份了，
我全心全意所爱慕的姑娘，
她何等明媚，转瞬间，死亡
临到了她头上，从此将我抛。

死亡呀，你是怎么回事呵，
当你攫走我心爱人的时候，
你竟不肯把我也一起掳去；
而她却那样鲜艳，没顾虑，
她心地善良，人人都承认，
善良的世界里惟她独尊！

在这里，他旁证博引，有些学究气。他主张追求现实生活的享受，沉醉于人生的爱情之乐，但失去恋人的痛，使他悲痛如斯、忧伤如斯。他强调尘世的欢乐，呼吁人们去勇敢地追求，充分反映出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这首诗一共有1300多行，诗人采取梦幻形式，用8音节双韵体写成，描写得细腻、抒情动人。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乔叟翻译了法国著名长诗《玫瑰传奇》。诗人首先独树一帜用自己本

民族语言来写作，打破传统的尊崇法文的惯例，采用伦敦方言进行创作。他经过精心的推敲、提炼和加工终于准确地表达了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这对本民族读者来说是感到非常的亲切，而且真实容易接受。他描写的一些生活情节逼真而活灵活现，使英语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之一，所以应当说乔叟是英国民族语言的奠基人。

"意大利"时期是大约在70年代和80年代。70年代的乔叟在创作方面有很大的转变，这是因为他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政治上的事务，经常出使欧洲大陆，特别是曾一度在意大利的各城邦之间穿梭往来。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诗人在这里看到了意大利各城邦经济繁荣而带来文化的蓬勃发展，充分感受到了资产阶级文化带来的社会氛围，令他心情舒畅。在这里他有机会拜读了文艺复兴"三巨星"—— 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的大作，深受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启发和写作方法方面的影响，因此使自己的人文主义世界观逐步形成，开始走上新的创作道路。

这个时期，由于忙于政务，他创作的文学并

不多，主要有《荣名的殿堂》，这部著作多达2000行，是一部教诲诗，用8音节双韵体写成。描写的是伊尼阿斯在特洛亚城陷落后冒险的经历和女人们被抛弃的悲惨故事。诗歌题材与当时流行于法国的“爱的幻景”颇为相似，但是在创作手法上可以突出地表现出是受但丁《神曲》的影响。

1381年，英国历史上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领导人是瓦特·泰勒。农民一度占领了伦敦城，乔叟的保护人兰开斯特公爵和一些贵族达官的住处都受到了冲击和焚毁。但是乔叟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埋头于写作事务之中，没有卷入这场大波动中，因而这时期的作品很多，而且明显带有意大利风格。其中《众鸟之会》最为突出，总共有699行，据说是为英王查理二世与波希米亚的公主安娜订婚而作。诗中写道，当诗人入梦后，见来到一座美丽的花园。当时正是“情圣节”，在这良辰佳景，百鸟云集，都在选择、寻觅着自己的佳偶。这时自然女神显示出她的威严，让群鸟先以尊卑等级按序坐好，然后就挥手举起了一只美丽绝伦的雌鹰，马上就有3只雄鹰站出来上前求爱，自然女神顿时不知该如

何决定，便将雌鹰的择偶问题交给百鸟讨论，让它们来决定雌鹰的命运。会上各鸟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是一个带有神话性的动物寓言，但反映出很多的道理。每一种鸟代表一个等级或阶层，地位最高的猛禽鹰隼，代表着封建贵族，食虫鸟类是指中产阶级，水鸟则代表市民商人，而吃五谷杂粮的鸟类指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诗人借助鸟类的对话，说出了当时在英国各阶层的爱情观，尤其是市民阶级的爱情观正在形成，骑士的爱情观正在动摇。

这一诗文用“君王诗体”写成。所谓“君王诗体”是来源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由他首先用这个诗体写了苏格兰方言爱情诗《国王的书》，故得此名。这类的诗体，采用7行诗段形式，每一行为10个音节，韵脚为ababbcc。乔叟是第一个使用这种诗体的英国诗人。此诗体极为重要，诗人后来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用这种诗体写成。该诗体后来演变为“英雄双韵体”，在新古典主义时期竟垄断了英国的诗坛。

乔叟曾根据薄伽丘的《爱的摧残》编译成了

长达8239行的《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在这部叙事长诗中，叙述了一个以特洛伊与希腊10年战争为背景的爱情悲剧。作者完全采用了“君王诗体”来进行。故事的男主人翁是特洛伊的王子特罗勒斯，他在一次庙会上闲逛的时候，偶然遇见了祭司卡尔卡斯的女儿克丽西德。王子一见钟情，认识了这位美丽的女孩，从此，彼此很快坠入爱河。彼此海誓山盟，永不变心，决心相爱相亲，在克丽西德舅舅的帮助下，终于结为伉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夫妻恩爱倍加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事情使这一对恩爱夫妻成了悲剧人物。克丽西德的父亲叛国了，逃到了敌国希腊，并且得到了重用。但是他毕竟是个慈父，思念女儿心切，就想出一计：用被希腊俘虏的特洛伊英雄交换自己的女儿，以便使女儿回到自己的身边。当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克丽西德即将与丈夫分别，十分难过，不忍离去，对丈夫发誓她会永远忠于他。按当时的情势特罗勒斯也完全可以把爱人留住，可是他恪守骑士的爱情法则，认为“万物发生必有其因，我之所失是命里注定”。使他错过机会，让妻子离开自己，这种思想使他从此失去了妻子，酿成了悲

剧。克丽西德回到父亲身边不久，在希腊军营中很快爱上了希腊的一位将军戴沃密，违背了对丈夫的诺言。此事被人们传开了，特罗勒斯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被欺侮的感觉。同时，也因为失去了爱妻感到很痛苦，因此，他不顾危险和别人的劝阻，只身闯入敌人的军营，被敌人团团围住，终因寡不敌众，死于敌人的屠刀下。

作者在这里大胆讴歌了男女之间这种纯真的而又真实的爱情，同时也抨击了听天由命的那种宿命论思想给人带来的悲剧。故事纯属英雄时代的事，但反映的是14世纪下半期英国社会的现实。本来，原故事中的主人公原本是氏族贵族男女，在乔叟笔下就成为中世纪高尚的骑士和贵族美女。因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在文学史界被视为是一部英国的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

还有一部作品叫《善良女子殉情记》，是乔叟根据奥维特、维吉尔和薄伽丘的作品撰写的淑女贞洁英烈的故事，描写了9位女子的悲剧。但诗中的9位女子再不是“罪孽的化身”，受“恶魔的蛊惑”，而是有真情实感、活灵活现的品

德高尚的美女。乔叟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故事来充分肯定妇女的地位，人的尊严和荣誉。

从80年代末至乔叟离开人世前的这段时期里，是他成熟的文学创作时期。这时期，在文学上的成就最突出是举世闻名的《坎伯雷故事集》。这是在欧洲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反映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

这部书本来准备拟写120个故事，但后来只写了24个故事。除了自己讲的《梅利比的故事》和乡村牧师讲的故事是以散文体之外，其他的故事都采用诗歌形式写成。其中总引是全书中最精华的部分，写的是4月中旬某一天，作者休息在伦敦泰晤士河畔一家名叫泰巴的小客店，准备第二天去大主教驻地坎特伯雷城朝拜殉教圣人托马斯·阿·贝克特的圣祠。那天晚上，有29位香客相继来到这座客店，他们相互认识了，准备结伴前往。在吃晚饭时，客店的老板建议大家为使大家在旅途中不至于寂寞，能愉快地旅行，规定每个人都要准备两个故事，分别在往返的途中讲，讲好了有奖励，大家请他吃饭。诗人在这里对每个人物都进行了特征方面的描绘如职业、风貌、个性等等，都栩栩如生。

他们当中有久经沙场的骑士，也有能武善艺的年轻侍从；有温柔淡雅的女修道院长，更有能言善辩的律师；有斤斤计较、负债累累的商人，也有热衷于学问、清贫的学者；还有阴狠毒辣、饕餮放荡的地主，纵欲狂欢、缺牙露齿老态龙钟的巴斯妇人。此外还有磨坊主、管家、法庭差役、各级僧侣、医生，不同职业的工人、农民。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是来自社会的各阶层，代表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特征，形态各异，汇集了一幅14世纪英国社会的画卷。因而，这部著作可说是"完全英国式"的，也是乔叟成为英国第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作。

在这部故事集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社会宣扬的禁欲主义，为爱情婚姻在精神和肉体上恢复荣誉，明确指出，男女间的性爱不是什么"邪念"和"淫乱"，而是人的天性，是人世间整体的感情之一种。在《医生的故事》中，用医生的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本性是上帝安排在地上的总督，其使命是"创造和修饰尘世万物，用爱情使创造物具有肉体，从而使其具有生命"。在《律师的故事》里，刻意安排了一对尘世夫妻生活，并进行了巧妙的比喻说："只有

天堂的乐园才能享受如此的快乐。”另外，乔叟也宣扬了爱情至上的观点，在《骑士的故事》中，就明白地表达了这一点，说爱情比人的其他任何感情都强烈、真实、高尚，爱情即是最高的法律。同时，乔叟还主张爱情是有个性的，是自由的，在这一点上，男女是平等的，不受阶级、财产和世俗的限制。在《自由农的故事》中就反映了这一观点：

“爱情是受不住压制的，压力来了，爱神就扑翅而飞，不再返回了！爱情和任何灵魂同样自由。女子的天性是要自由，不愿像被奴役那样受到束缚；男子也是如此。”

作者的这些思想，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在萌芽时期的恋爱观和婚姻观，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意识。

故事集中还有一些是揭露和抨击宗教和封建势力的虚伪与腐败的情节，揭露那些披着宗教的衣衫的僧侣们的骄奢淫逸。如在《赦罪僧的故事》中赦罪僧自己表白说：“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谋利，那些什么改过自新的一套我却满不在乎。……我能拿到羊毛、麦子、乳酪、金钱，不管村中最穷的孩子或寡妇拿来的，不管她的孩

子饿得快死了，我还是不肯放过！每到一个市镇，我就找一位姑娘，喝着葡萄美酒。”

在《船手的故事》中，作者描写了一位道貌岸然，却又花言巧语，耍尽伎俩，淫欲横流，与自己朋友的妻子通奸的僧侣。

此外，故事里也有关于有产者的自私自利以及对金钱追求的不惜犯罪的种种描写。笔锋是犀利而无情的。

整个故事集的总体结构处处都流露出乔叟的写作特点，从结构的安排到叙事技巧，再到人物塑造，素材的收集等等都是如此。这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薄伽丘。作者能够巧妙地由总引和每一个故事的前言作成连接，将内容各异、独立成章的故事汇编起来，有机地结合，使全书成自然过渡，融合为一体。故事中间有小插曲，让讲故事的人所讲的故事内容相互之间观点不同，相互讥讽，这样使故事的情节就显得很曲折又引人入胜。作者能够通过人物的表情描绘，来把握人物的心理活动，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并且把民间的故事、传说、俗语，骑士的传奇故事、圣徒传记汇集在一起，并赋予它以现实意义，使全书丰富多彩。

乔叟热爱写作根源于他热爱生活，热爱人生，对社会的发展充满了期望和信心。因而他宽以待人，富于同情心，却又嘲笑、讽刺人们的一些缺处和陋习，但从不强加于人，而是以幽默的形式引导人们去改恶从善。由于他的作品内容丰富生动，趣味浓郁，因此，他的著作在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能广泛流传，并得到了英国朝野的尊重和拥护。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采用伦敦方言来叙述的，因而在语言方面也是具有相当强大的生命力的。它奠定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基础。乔叟所创立的"双韵体"诗歌形式，后来被英国诗坛所广泛推崇，并流行延续下来，而乔叟则被人们尊称为"英国诗歌之父"。

由于长期过度疲劳，处于创作黄金时代的乔叟却突然病逝于伦敦，这个不幸的日子是1400年10月25日。热爱乔叟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诗人，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寺院，在墓的周围修起了文学寺庙，并命名为"诗人之角"。从这以后，这里就成为埋葬英国著名作家的地方。

乔叟的时代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因而，他

的思想也反映着时代的气息，存在着新旧之间的矛盾。他是一方面坚持人文主义思想，却又不能彻底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同时在他的人生哲学中还存在主张消极忍让的悲观态度；在肯定人生，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他又流露出市民阶级的那种对纵欲的崇尚。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些地方存在文字冗长、叙述太繁琐、拖沓，给人以无聊之感。然而，这些不足不能影响全部作品的整体形象和作品在文学领域里的贡献与地位。因此，他的作品、思想对后世影响都是很大的，后来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等历代作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大多渊源于此。所以，14 世纪被称为是“乔叟时代”。

敢于揭露丑恶生活方式的巨人

在欧洲，继薄伽丘之后又一位具有全欧洲影响的杰出人文主义代表当属长篇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作者——弗朗索瓦·拉伯雷。

大约在 1494 年，在法国中部著名的小城施农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里，有一位男婴呱呱坠地了，这就是拉伯雷。拉伯雷的祖辈并不是律师，而是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和财产。到他父

亲的时候，家中仍然是很富裕的，而且田产越来越多，已经初具田庄规模，他父亲也着实是一位阔富地主，在法国应属于“穿袍贵族”。后来，因为在当地小有地位和名气，因而当过一段时间的勤拿地区司法总管。

拉伯雷的幼年是在父亲的田庄里度过的。田间的优美风光，恬静优雅的庄园，乡村古朴习俗，都给他以极为深刻的影响和感染，使他从幼年时起就崇尚这美好而纯朴的农村生活，对农民的生活更是了如指掌，更了解他们的纯朴思想，同时能够掌握当地农民经常说的方言土语，这为他以后的创作都打下了基础。在他的一些作品中都有这段生活的影子和浓重的乡土气息及语言特征。

不久，父亲把他送进了一所教会学校，学习拉丁文，开始接受经院教育。从此，他的生活变得死气沉沉。在他父亲的精心安排下，拉伯雷于1520年进入圣芳济各的一所修道院，当了修士。虽在高墙深院，生活单调，但是，拉伯雷依然是性格开朗，活泼幽默，勤奋学习。在这里，通过学习希腊文，研读古希腊、罗马作品，他被人文主义思想所吸引，并与同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

吉约姆·布代建立了通信联系。这时，他的言行无不带有人文主义色彩，因而，触犯了修士的教规，冠之以异端邪说，轻慢神学之罪。从此，他受到了教会的迫害和制裁，禁止他自由阅读有关人文主义思想的书籍，并将这类书籍予以全部烧毁。

拉伯雷为了反抗教会对他的迫害，盛怒之下，离开了这所修道院。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与教会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然，这也是他在追求新的人文主义思想过程中的第一次打击。

第一次打击之后，年轻的拉伯雷在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复仇的念头，也更加激发了他去探索新思想。不久他来到一所新的修道院。这里可以自由进行学术探讨，允许吸收新思想。这就是圣本笃会的德马伊修道院。他觉得这里对他学习新思想，研究新学术有很好的条件：因为这里的修士们文化水平高，有利于他的研究，而且院长戴梯萨是一位重视古典学术研究的较为开明的主教，也是当时国内有名的人文主义学者，这对拉伯雷来说，是有了一个好上司；同时，更让拉伯雷惊喜的是这位思想开明的修道院长请他作自己的随行秘书，这可以大大丰富他的阅历。

因此，在这所修道院里，拉伯雷如鱼得水，使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了发展。

短短的3年时间里，他结识了很多有名学者，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如他曾向诗人布施学习过修辞学，向阿狄龙学习过宗教史，此外还学习了一些语言、法律、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他曾跟随院长戴梯萨访问过意大利和其它几个欧洲国家。当他来到意大利的名城罗马时，惊叹不已，对这里的文明、思想和社会氛围，都由衷地慨叹。因此他称之为“世界的首府”，而且对这座城市已经了如指掌，似乎是他在这儿土生土长一样，他曾写道：

“人们对自己的家所熟悉的程度也比不上我对罗马的大街小巷那么熟悉。”

这么说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已经显示拉伯雷对罗马的兴趣和对这里的文明的印象。这一段欧洲旅行，大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这对他后来的创作生涯是有着极重要的影响。

1527年以后，他继续游历了法国中部各大名城，走遍了大半个法国。中途，他在各城市停留，广泛地接触社会，考察和了解各地的司法和高等教育状况，从而对法国的社会有了全方位

的、深层次的了解，也认识到了封建法律制度的黑暗腐败和经院教育对人才摧残的现实，他极度地愤慨。这促使他下决心一定要揭露这个事实。拉伯雷后来的巨著《巨人传》的素材积累和创作酝酿的过程正是这段重要的长途旅行。

1530年，拉伯雷来到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学习医学。也许是由于医学和人文主义都是“以人为本”这个相似之处吧，他对医学就早已有较深的研究。这次，他依靠以前已经掌握的医学知识为基础，只学习了6个星期就拿到了毕业文凭，得到了学士学位。而医学素养又丰富了他的知识，为他的想象力和形象思维以及诙谐的笔调提供了条件。

1531年，他在里昂罗讷河圣母堂医院从事医务工作。在这儿，他更是得心应手。一方面是由于他和这里的人文主义学者有着很深密的交往，比如：像新拉丁诗人马可兰、徐萨诺，希腊学家都列，诗人圣日列、塞外、戴培利、杜塞克司和精通诗歌、哲学、历史的尚皮埃医生，还有正在法国讲学的伊拉斯莫。拉伯雷对这位学者十分敬慕，在1532年，曾给这位学者写过一封称颂的信中，称他为“非常可爱的父亲，祖国的

瑰宝，文学的保护人和不屈不挠的杰出人物。”这样更加坚定了他的思想是延着人文主义发展下去。另外一方面是由于他从事医务工作，他能够更广泛地去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也正是从事这个职业的原因，使他看到做一个医生来医治人体的疾病，不如用笔来医治整个法国社会的溃疡和人们精神意识方面的疾病。因此，他决心要依靠自己的笔来医治社会。

在行医过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民间故事《高大硕伟的巨人高康大大事记》，大受启发，于是欣喜若狂，写成了小说《庞大固埃传奇》，全名是《巨人高康大之子，狄波莎德王，十分有名的庞大固埃的可怖而骇人听闻的事迹与勋业记》。在这里，他的态度是玩世不恭的，大胆的揭露，以泼辣的语言挖苦、刻薄、讥讽和亵渎了社会上许多神圣威严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思想解放是空前的。但是，拉伯雷为了避免教会的再度迫害，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的字母重新组合成“拉西埃”作为作者名，并于 1532 年 8 月在里昂出版了，这就是《巨人传》的第二部。书出版以后立刻销售一空。

过了一年，他又用“拉西埃”这个笔名出版

了《高康大》。一下子轰动了法国社会，得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小说“在两个月内销售的数量比《圣经》9年的销售量还多。”但是，这次还是没有逃脱教会的迫害和贵族们的仇视。巴黎法院宣布这两部小说为禁书，不许流传，更不许看。

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拉伯雷只好暂时停止写作，但是教会和封建势力还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对作者进行迫害。然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拉伯雷机警地逃脱了恶势力的惩罚。不过，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好过，侥幸生存下来的拉伯雷在后来的生活中，处处都受到教会和封建势力的监视和束缚。

1534年，他不得不暂时离开了里昂，以私人身分到处行医，而且有幸跟随巴黎主教杜伯莱先后两度出访意大利。在意大利，他认真地钻研罗马文化和东方药物学，拜访了许多名人学者。在这里，由于教友的斡旋，他得到了罗马教皇的特许，以俗教士的名义继续行医。但是，他感到自己的医学知识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在1537年再一次进入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学习和研究解剖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两年之后，获

得了博士学位，成为法国最早的解剖学专家之一。在学医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人体与精神的关系，明确提出了大脑、神经和肌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的新看法。

这时，他在医学领域里已是功成名就，加上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使得拉伯雷的学识更渊博，才华横溢，赋有“天才之母”的盛誉。他并没有骄傲，继续研究，因此，他在医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音乐、考古、神学、法律、哲学、教育等领域都很有建树。他广博的知识中，还应数文学方面的成就突出。从1524～1527年，他曾用法语写了一首百行长诗，堪称法国文艺复兴的先驱和“巨人”。

当生活稳定了，经济上有了保障的时候，拉伯雷又拿起笔，勇敢机智地与封建势力进行了斗争和较量。这时，他开始着手《巨人传》第三卷的创作，并经过多方的努力，争得了合法的出版权，同时得到了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特许发行证。在送交出版的时候，他又在卷头上写了“献给”王后的诗篇，以此来增加作品和作者的安全系数。这种种步骤，都使《巨人传》第三卷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到1545年终于顺利地出版

了，而且这一次拉伯雷署上了“医学博士拉伯雷”几个字，第一次署上了真名！

小说的表面是较为温和而驯良的，但是内容的实质却透着辛辣和讽刺，使天主教会感到如坐针毡。顿时，群起而攻之，并要求世俗政府对拉伯雷和作品进行惩罚。后来，巴黎议会决定对该书实行查禁；作品的出版商、拉伯雷的朋友埃季艾姆被处以火刑，并暴尸街头。这时，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病重，已经失去了对拉伯雷的保护能力，教会即将对作者实行迫害。无奈，拉伯雷再逃难到边远的麦茨。

1547 年，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病逝了，由法王亨利二世继位。就在这一年，《巨人传》的第四卷出版了一部分。两年之后，法王喜得贵子，拉伯雷在朋友的鼓动下，写了一首贺诗，送进王宫，得到了王后、国王的赞许。因此到 1550 年，国王特赐允许他出版了第四卷的全部。然而，到 1551 年，作品再次遭到查禁。拉伯雷找到了他的保护人、红衣主教查理·劳伦斯，请求庇护。在主教的帮助下，曾经迫使教会停止了审查。在这段时间里，拉伯雷对第四卷作了很多修改，并于 1552 年 2 月重版，3 月 1 日被巴黎高级法院

再度判为禁书，不准发行、传播。

情况恶化了，使拉伯雷的生活落入贫困境地。到了晚年，他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了，为了谋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拉伯雷只好放弃世俗生活的自由和权力，再次回到了宗教社会，从事神职工作，在两个教堂做神父。从此，他又受到来自宗教的束缚和压制。然而，他的思想，他的思维还是在人文主义思想的领域发展，并未因为宗教的束缚和压制而停滞、衰老。所以在他履行神父的义务时，还给一些贫穷的百姓免费看病，在一学校做兼职教师，传授自己的广博的知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继续从事写作，完成了《巨人传》的第五卷。这一段时期里，他因为过于劳累，加上受到长期的迫害，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无法继续工作了。1553年，他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回到了巴黎。

这一年4月，巴黎的天气让人透不过气来，一个悲恸的日子——9日，拉伯雷与世长辞了。他在临终前，回首自己一生的经历，自己是在与黑暗的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斗争中走过来的，也回想起因为自己的连累而使一些朋友丧生，他觉得有些欠疚，但他又认为自己是在历史的

舞台上与宗教势力演了一场角斗戏，自己是个骑士。当自己即将走向历史的时候，他是个强者、巨人，因此，幽默地大笑道：

“拉幕吧！戏演完了。”笑傲人世，笑傲天地。他死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他的籍子里留有一段遗嘱：

“我没有财产，我欠人不少，把我留下的送给穷人。”

在拉伯雷死后的第十一年，1564年，《巨人传》全部出版了，历时大约20多年。

这是长篇的讽刺小说，反映的是16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现实，主要线索是以卡冈古杰、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3代人的神奇故事。作者以民间故事为基本骨架，用夸张的手法，滑稽讽刺的笔调，描绘了理想君主的形象。

《巨人传》第一部描写了卡冈都亚的出生和他的成长过程，着意刻画了一个理想的英雄形象。

卡冈都亚是一个生来就不同凡响的人物，作者描述道：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并不是与普通人一样，出生时是从母亲的耳朵中降生。一生下来就智慧超人，聪明绝顶，声响如钟，大声吵

着要喝、喝、喝，震惊了四邻。大人们赶紧喂之牛奶，他一下子喝了17913头牛的奶。这时父王正在喝酒取乐，当他听到儿子的声音时，大惊道："卡冈都亚！"意思是"好大的嗓子"，遂即给儿子取名叫"卡冈都亚"。国王卡冈古杰对自己的儿子如此奇特感到非常的高兴。卡冈都亚头戴重达5800公斤的项链，身穿紧身衣可以用来开一个布料专卖店。他的一双鞋底就用掉了1100张牛皮。卡冈都亚长得太快了，转眼之间，他的身材硕大无比，他伸出了舌头，就可以为整支军队遮风挡雨。有一次，他骑马到巴黎，路上用马尾巴赶苍蝇，扫掉了一路上的树木，使他经过的路上变成了平原。到了巴黎，他自己在随便的戏耍，竟然无意中踏上了巴黎人顶礼膜拜的圣母院之顶，在上面撒尿，淹死了周围的几十万人口，随手摘下圣母院教堂的两口重达两千公斤的大钟，挂在马脖子上作铃铛，他觉得很好玩。

老国王卡冈古杰为儿子专心设立了一些课程，对其进行教育。这里，作者有意安排了一个情节来嘲讽和讥笑经院哲学和教育的荒谬与无能。卡冈都亚在最优秀的经院学者的教育下，花

了5年时间，学会了字母，用50年时间才把各门课文读得滚瓜烂熟，但越读越愚昧。国王赶走了这些经院教育的老师，又请来了人文主义学者。这次，老师摈弃了经院式教法，引导卡冈都亚注意观察周围的事物，反对教条式背诵，而且注意体育活动，使卡冈都亚的思维和身体都得到了锻炼和发展，适合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作者除了宣传重视实践，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外，对经院哲学、巴黎神学院、教会、修道院、法官和教育机构都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大胆的抨击。这无疑触动了天主教会。

作品中还讲到了邻国有个国王毕克罗寿野心勃勃，妄图称霸这个地域，想建立"世界帝国"，当毕克罗寿率大军入侵的时候，卡冈都亚赶回国去进行了反侵略斗争，由于约翰教士的协助，终于赶走了侵略者。为了回报这位教士的功德，国王建造了一座特来美修道院。这座修道院是按照人文主义教育的要求来进行管理的，设有图书馆、运动场、打靶场和剧场等。修道的男女可以自由地交往和参加各种活动，完全否定和取消了天主教的陈规陋习。这又是针对天主教会的。

在第二部中，作者描述卡冈都亚的儿子庞大固埃的事迹。故事从庞大固埃的家谱开始，据说他的家谱长得44天也讲不完。庞大固埃本是民间传说中的海鬼。这个海鬼每当人们在夜深人静熟睡时，就闯入室内把盐撒入人们的喉咙，使得人们醒来时感到口渴。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有意地把海鬼写成了一个开明的帝王。他身躯仍然是高大的，降生时，从他的母腹中跟着他跑出来68匹背上驮着海盐的骡子，以示他的来历。庞大固埃被送巴黎去接受上好的教育。他学习很勤奋，进步也很快，因为他非同凡响，有双倍的理解力，记忆力也是非人能比的，“好得可以装下12大桶橄榄油”。卡冈都亚写信给儿子，嘱咐他要认真学习，研究各学科的学问，“把青春好好地用在学业上和品德修养上”。庞大固埃后来遇到巴奴日，巴奴日协助他去征服了迪普索德国。

作品在一个强大的荒诞外表下，显露出极端的讽刺，辛辣的抨击。拉伯雷对当时的经院哲学和教会及其各教育机构进行了讽刺，而对人文主义思想做了高度的赞扬，并欢呼着古典文明的重现。

在第三部中，他描写了巴奴日的荒唐。当巴奴日协助庞大固埃征服了迪普索德国后，就有了想结婚娶亲的念头。为此，他访问了女巫、诗人、术士、神学家、哲学家、医生和疯子等，从这些人的口中引出了许多笑料和滑稽对话，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关于妇女问题的混乱思想。同时作者借这些人的口说出了自己的话，嘲讽和抨击了社会的现实。当巴奴日的访问失败时，巨人卡冈都亚父子也对此事进行了探讨。庞大固埃决定去寻找"神瓶"，靠神来点化自己。

在第四部和第五部中，作品叙述了庞大固埃在巴奴日和约翰修士陪同下，为了明白结婚的利弊，远涉重洋，寻求"神瓶"。他们经过了很多古怪的地域，如"无鼻岛"，"混沌岛"，"空虚岛"，"长寿岛"，"鬼祟岛"，"荒野岛"，"吃风岛"，"反教皇岛"，"教皇岛"，"伪善岛"，"钟鸣岛"，"愚人岛"，"皮桶岛"，"第五元素"王国，"丝绸国"等地，最后到了"灯笼国"。他们阅遍人间丑恶，终于找到"智慧源泉"的"神瓶"。"神瓶"的启示是一个"喝"字。这喻示着："请你们到知识的源泉那里……研究人类和宇宙，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请你们畅

饮真理，畅饮知识，畅饮爱情。”也就是去追求知识和真理，肯定享乐的人生。这是全书的精髓和总结。

全部作品有着强烈的反封建特点。拉伯雷在第一部中就明确说过，“在我们的宗教方面以及在政治状况和经济生活方面”存在着“可怕秘密”。作者把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在政治、宗教以及经济等问题的斗争，放到卡冈都亚和他的儿子的头等任务上，因而小说带有浓厚的反封建特点。作者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揭露了当时的法、德两国的战争实质，对野心勃勃的德皇查理五世和法兰西一世都给以无情的抨击，尤其是针对法国国王在位30余年，造成了法国国库空虚，债务累累，苛捐杂税太多，使百姓失去了对国王的信赖，矛盾尖锐、起义频繁。通过对毕克罗寿的妄图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与贤明的君主卡冈古杰进行了对比，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战争，反对穷兵黩武的思想。

同时，作品也抨击了天主教会统治下的法国社会的腐朽和黑暗。拉伯雷反对禁欲主义、宗教裁判所和教阶制度。在作者笔下的神职人员，

不是行凶作恶，欺压百姓的“猛禽”，便是只会念经祈祷的胆小鬼。他把貌似公正的法官，比做“穿皮袍的猫”，嘲笑他们既愚蠢又贪婪，对审理案件一窍不通，说他们是靠掷骰子来判案的。他们胸前挂着大布袋，心中想的是钱，靠贿赂为生。拉伯雷尖锐地指出，封建法律是专门欺压百姓的“蜘蛛网”，而作恶多端、罪恶累累的教俗封建贵族则可以逍遥法外。这种“蜘蛛网”专门捕捉小苍蝇、小蝴蝶，不敢去招惹那些大“牛虻”。他说，在封建社会里，黑白是颠倒的，“把弊病叫做道德，把邪恶叫做善良，把叛逆命名为忠贞，把偷窃称为慷慨；劫夺是他们的座右铭”。

拉伯雷在《巨人传》中，用大量的篇幅和高度热情的笔调歌颂人文主义思想，可以说这是一部人文主义艺术化的百科全书。在作品中，作者以“特来美修道院”来实现人文主义思想的理想，表明了作者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和对宗教、社会的主张。这实质是一个乌托邦社会的典型。在这个社会的特点是要求个性解放，在这里，人人平等、和睦相处，没有束缚和男女之分，可以自由地交往，自由地学习，也可以光明正大的恋爱、结婚。在这里，不存在任何的宗教仪式和清

规戒律，人们都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我行我素，绝对不把个人意志强加于人，人们也不受任何违反个性自由的外在力量的干预。这充分体现出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唯一的院规就是："随行所欲，各行其是。"

然而，这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心愿，无法实现的心愿。

拉伯雷在自己的作品中，也痛斥了经院教育的毒害和经院哲学的荒谬。他塑造和描绘卡冈都亚这个人物和他受教育的过程，来证明经院教育误人子弟、培养愚昧的事实，指出经院教育只能是空洞无物、思想混乱的无用之物。与经院教育相对的，作者倡导的是全新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全知全能的人"。这种思想要求有全方位的发展和锻炼人思维的课程、单位时间的效率，只有这样才是全新的知识、全新的人，才能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这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渴求知识和开创新世界的美好愿望。

在描写巴奴日这个人物时，作者特意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因此，在全部作品中，有着突出重要的地位。巴奴日表面上是一个

"无所不为的人",但实际上是个核心人物。巴奴日原是江湖上的流浪者,外表潇洒倜傥,好酒色,喜欢恶作剧,是行骗敲诈老手。他认为人们可以自由发财,财神应受尊重,他最喜爱的是钱,"没钱是无比痛苦的。"他总结出找钱的办法有 63 个渠道,最主要的手段是欺骗和偷窃。生活中,他较为乐观而自信,在寻找"神瓶"过程中,他起着主要作用,因为他们经历的地域是很复杂而充满危险的,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在同形形色色的封建势力斗争中总能取得胜利。作者在这里实际上描绘了一个资产阶级的进取心强的冒险家形象,从而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历史作用加以赞扬和肯定。在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不乏浪漫主义色彩。作为长篇小说,它能独树一帜并流芳百世。

应该看到的是,拉伯雷在这里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才华:语言的丰富、诙谐、活泼和流畅,文笔的锋利和辛辣。因而他被后人视为讽刺大师。冷嘲热讽,不乏其中,令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在滑稽中透着一份"庄严",以此来揭露社会现实,让读者在笑声中去玩味。当然还有些具有丰富寓意的民间故事的插入,使作品显得

丰富多彩。

《巨人传》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历代文学评论家都视其为讽刺文学的典型而给予高度的评价。拉伯雷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对后来的莫里哀、伏尔泰、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名作家都有很大的影响，被后人称为“敢于揭露丑恶生活方式的巨人”。

不朽的“勒班多独臂人”

在人们谈到《堂吉诃德》这部不朽的名著时，都不会忘记其作者、西班牙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戏剧家、诗人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

1547年，塞万提斯出生于西班牙中部的阿尔卡拉·达·亚那拉斯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祖父是律师，父亲罗得果戈是一个江湖医生。为了生计问题，长年奔波于马德里、塞维利亚等地。塞万提斯因家境贫寒，兄妹太多（他排行第四），而无法呆在家里，童年起跟随他的父亲跑江湖到处行医，以便糊口谋生。据记载，1552～1553年，全家居住在瓦尔亚多利城，父亲因为

负债于 1564 年在塞维利亚受到控告。

他的童年和少年随着家庭的动迁而度过，生活过的地方有阿尔卡拉，瓦尔亚多利和塞维利亚。后来只在马德里读了一段时间的中学。这段时间里，因为家境困难而辍学。他经常去看戏剧家洛贝·德·鲁埃达的戏剧演出。戏剧是反映当时西班牙人民的现实生活的，这对塞万提斯日后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一个启迪。辍学并没有使他放弃学习的欲望，反而更勤奋更努力，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能够得到的书，甚至是大街上的烂字破纸也不放过。在马德里中学期间，他还得到了西班牙杰出的拉丁文学者奥约斯的指导，阅读了大量的古今内外的文学名著，大大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

1565～1569 年，塞万提斯跟随红衣主教、罗马教皇驻西班牙使节胡利奥到了罗马，并成为他的家臣。塞万提斯因此游历了意大利的很多地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米兰、热那亚等地，广泛接触一些文人墨客，大开眼界，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优秀作品，并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陶冶。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日子并不长久。因为当

时地中海东部新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在地中海上横行霸道。当时，西班牙联合了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共和国组成了一支名叫米盖尔·德·蒙·卡达的联合舰队，准备迎击前来侵犯的土耳其舰队。1570年，塞万提斯一腔热血愿报效祖国，加入了西班牙的军队，在“侯爵夫人”号上服役，1571年10月参加历史上有名的勒班多海战役。在激烈的战斗中，表现勇敢顽强的塞万提斯被火铳的铅丸炸伤了左手和胸口，伤势很重，被迫截掉了左手臂，终身致残。从此，人们称他为“勒班多的独臂人”。

残废之后，塞万提斯继续留在部队里服役，连续参加了希腊的纳瓦里战役和北非的突尼斯拉哥·列达战役，战功卓著。1574年，他随部队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驻防。

1575年6月，西班牙军队统帅唐胡安与西西里总督鉴于塞万提斯屡建战功，各自写了一封为他请求升职的推荐信，送给西班牙国王腓利浦二世。塞万提斯带着两封推荐信，与军中服役的弟弟罗德吕古一起动身返回西班牙。

9月26日，兄弟二人乘“太阳”号兵船从

那不勒斯海港出发，向西班牙方向前进。翌日，在法国南部的马赛港附近水域与3艘土耳其巡逻舰相遇。战斗中，由于寡不敌众，兵员与战舰全部被俘。他们兄弟两人被虏到了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做了5年的奴隶。土耳其人发现了塞万提斯身上带着两封出自西班牙和意大利高级官员之手的信函，于是把塞万提斯视为重要的筹码，以为可以勒索到巨额赎金。但是，塞万提斯家境贫寒，哪有力量赎回。在北非做奴隶这五年期间，他曾多次组织俘虏逃跑都没有成功，每次失败他都是挺身而出，保护战友，甚至是放弃单独逃跑的机会，赢得了战友们的爱戴。他的气概使土耳其海盗头目也大为赞赏，所以每次都免遭杀害。

1577年春，塞万提斯的父母筹得了一笔钱，但只够赎回他的弟弟。直到1580年，他的弟弟从一位当地的基督教商人那里勒索了300柯朗(古时银币，每枚约6先令)，作为赎金，才使塞万提斯获得了自由。10月，他回到了西班牙，这是他离开祖国10多年后第一次回国，感到祖国的亲切和家庭的温暖。他满以为会赢得国王腓利浦的器重，但是，他失望了，因为国王又派他

到北非去从事一些临时性的公务。对此，他感到十分的失望。

后来他来到葡萄牙当兵，但是生活十分困难。为了生存，他决心从事写作。从此走上了创作道路。

1582 年开始，他用 4 年时间共写出了 8 部喜剧和 8 个幕间短剧。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描写关于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和冲突。1584 年，他写的悲剧《努曼西亚》上演了，在当地引起巨大的轰动。

这是一首英雄主义悲壮颂歌，描写古代西班牙努曼西亚城人民受到罗马军队的围攻。努曼西亚人 4000 将士反抗罗马的 80000 人军队，以此为背景展开了故事情节。努曼西亚城弹丸小地，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击，宁死不屈的努曼西亚人坚持斗争 14 年，拒不投降，终因寡不敌众，城池被攻破。英勇的努曼西亚人为了不使财产落入敌手，实行坚壁清野，或全部烧掉，让敌人得到的是空城。然后集体自杀殉国，无一人投降。故事达到高潮时，写了一个少年在仅剩他自己的时候，面对罗马军队统帅西比阿，拒绝交出城门钥匙，面不改色心不跳，毅然从高塔上坠地

身亡。

这个剧本体现了“顽强战斗，不怕失败，战胜困难”的集体主义精神，歌颂了努曼西亚人民的英雄事迹，渗透着爱国主义热情，深受西班牙人民的喜爱。一位名叫卡塔琳娜的姑娘因此爱上了塞万提斯，并情愿与这位残废作家生活一辈子。

《努曼西亚》这一爱国主义悲剧给西班牙人带来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每当异族入侵的时候，这个剧就成为鼓舞人民斗志和抗争精神的最好的号令。比如1808年当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这个剧在马得里和萨拉哥萨城上演。1936年，当法西斯军队入侵马得里时，这个剧又在马得里城上演，这无异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总动员令。

1585年，塞万提斯以自己的恋爱史为蓝本，写出了第一部长篇牧人小说《加拉提亚》，这时是作者的“黄金时代”，是幻想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塞万提斯在葡萄牙时，曾经与一个葡萄牙女人相爱过。后来她嫁给了别人，却留下一个私生女给塞万提斯，由他抚养。他曾痛苦过。后来为了供养女儿，他不得不终日紧张地从事文学

创作，靠微薄的稿费来维持生活。然而，还是入不敷出，无奈，他又去从事自己十分厌恶的税吏工作。

1587年，适逢旱灾，人民生活已经濒临绝境，而僧侣贵族却囤积大量的粮食，抬高物价。这时，塞万提斯了解了这个情况，毅然不顾威胁劝告，秉公收税，征收了厄西哈大教堂讲经师囤积的麦子。这样就得罪了教会，因而被革职，并将他除了教籍。没有教籍是不能再担任政府中的职务的。

后来，他经朋友的帮助在海军中谋得一个军需官的职务。但是，当时海军内部也贪污成风，机构官僚，他常常是被别人当做“替罪羊”而加以诬陷。最终还是以“亏欠公款”的“罪名”革了职，同时被投入了监狱。后来经调查他是清白的，但已经在狱中关了三个月。从1592年至1605年期间，他曾几次被诬陷下狱。

他的善良也曾给他带来过灾难。有一次他见一位受伤的人倒在他家的门口，他便好心地把伤者搬进屋里进行照料，但是受伤者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死在了他的家中。此事成了他全家人的灾难，他也因杀人嫌疑罪被捕入狱。后来

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才得到获释。

在几度的狱中生活经历中，他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构思他的新著，据说《堂吉诃德》就是他在狱中构思的。

1603年，塞万提斯回到瓦尔亚多利城，这里是腓利浦三世的王宫所在地。繁华的都市却存在着贫穷，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塞万提斯住在一个污浊的小街深处中的最下等公寓里，楼上是妓院，楼下是酒馆，塞万提斯一家7口就住在中间，他的妻子、姐妹、私生女儿、亲戚和女仆拥挤在几个房间中。每天在楼上楼下的吵嚷声中，塞万提斯坚持在过道里的书桌上工作，凭任楼上楼下的杂嘈声不断，他以惊人的注意力和意志写完了《堂吉诃德》的第一部。该书1605年初出版，风靡全国，几星期内全部销售一空，6度再版，一时间成了最抢手的书。但是，这并未给塞万提斯带来转机，因为他把版权卖给了出版商，所以出版商成了暴发户，而他依然贫困，这时他已经58岁。

作品出版后，由于内容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宫廷贵族进行辛辣的讽刺，招致了统治者的憎恨和文人的嫉妒，特别是受到他讽刺的骑士

小说的作者更加仇视。1614年，有一个用佛南特斯假名的人，利用人们渴望《堂吉诃德》续集的心理，出版了《堂吉诃德》第二部。这个冒牌作者在序言中对塞万提斯进行了攻击、嘲讽，并把塞万提斯说成了一个不能写作的庸才，丑化了原著者在作品塑造的两个人物：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其情节也极为下流、俗气。塞万提斯看到这些极度愤怒，于是加快了《堂吉诃德》第二部的创作，并终于在1615年完成了。

塞万提斯这次故意用骑士文学的写法，叙述了一个穷乡坤吉哈达在阅读骑士文学时入迷而失去了理智，梦想自己也当个骑士游侠，于是找来一幅破盔烂甲，生锈发霉的盾和矛，化名堂吉诃德，把邻村一个挤奶的姑娘作为意中人，并取了一贵族的名字，决心为她效劳，骑上1匹瘦马，找了邻居桑丘做侍从，3次周游天下。他到处劫富济贫。他把幻想当现实：把风车当成巨人，把旅店当成城堡，羊群当成敌人，不顾一切，乱杀一气，结果是到处碰壁，干了许多蠢事，闹了许多笑话，吃尽了苦头，也受尽了世人的嘲弄，然而他仍然执迷不悟，直到几乎丧命。最后在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才顿悟，痛骂骑士文

学的毒害。然后，留下了遗嘱，不许他唯一的亲人即他的外甥女嫁给骑士，否则就不能得到他的遗产。最终的话是："我从前成天成夜读那些骑士小说，读得神魂颠倒；现在觉得心里豁然开朗，明白清楚了。现在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不及再读些启发心灵的书来补救。"

原来作者在创作中的意图是想讽刺封建势力庇护下的骑士文学，但是作品的社会意义已经超越了这一层，成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全面真实地反映了 16～17 世纪初西班牙的社会现实，广泛地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小说塑造了 700 多个人物，展现了一幅广泛的社会长卷，抨击了社会的丑恶、荒淫、无耻、伪善，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反封建教会的战斗精神。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艺术典型：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

作品自问世以来，一直保持着她的生命力，世界上有各种译本，通过语言来传播作品的艺术魅力。作者对"神秘的东方"尤其是中国有着极大的兴趣，在下卷献辞中说：四方各地都催着我把堂吉诃德送去，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

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以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请我去做院长。我问那钦使，中国皇帝陛下有没有托他送我盘缠费。他说压根儿没有想到这层。我说："那么，老哥，您还是一天走1～20里瓦，或者照你奉使前来的行程回你的中国去吧。我身体不好，没气力走这么迢迢长路。"

这很明显是作者的调侃，但是，他所说的"将来每个国家，每种语言，都会有译本"，确实是言中了。

塞万提斯一生勤奋，有很多短篇小说问世，如《二犬对话》，《玻璃学士》；还有《忌妒的埃斯特雷马杜腊人》，描述的是居住于塞维亚的大财主埃斯特雷马杜腊人费利贝·德·卡里萨莱斯，已经70多岁了，却看中了邻近一个家境贫寒的十三、四岁小姑娘莲奥诺拉。姑娘的父母贪财，同意了这桩婚事。但是，婚后老头对姑娘十分苛刻：不许大门守卫人黑人阉仆进入二门，连公猫、公狗都加以防范，到处上锁，一把钥匙总带在他自己身上，二门有传递东西的窗子，使这

位可怜的姑娘与世隔绝，过着囚徒生活。然而，有一天，当地的一个放荡青年洛阿伊萨，出于好奇而越过封锁线。他巧装成一个瘸腿乞丐，以歌声打动黑人，进了大门；又利用歌声和外貌征服了女管家和女奴仆，通过他们去劝说莲奥诺拉用药使老头失去知觉，偷出了总钥匙，把洛阿伊萨放了进去。女管家把莲奥诺拉送到了青年面前，但是姑娘坚贞不肯，最终两人都感觉有些困了，就相偎着入睡了。老人恢复知觉后，见此情景，盛怒之下，本想杀了两个年轻人，但是因悲痛过度而晕过去。最后，老人反省自己的过错，所以在临终时留下了遗言，死后把财产留给姑娘，并要她与青年结婚。老头儿死后，姑娘没有按遗嘱行事，而是进了修道院，从此做了修女。而洛阿伊萨也离开了西班牙本土，到西班牙殖民者开拓的新大陆去了。各走各的阳光道，各走各的独木桥。

塞万提斯的这个小故事，批判了那种买卖婚姻；而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在作者笔下已经明确揭示了这个观点。这部小说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它使作者的名字传遍欧洲，受到世人的崇尚。

塞万提斯晚年一直是坚持创作，即使是在患病中也不停止，《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的困难》就是在患水肿病中坚持写完的，这也是作者临终前的最后一部。

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贫病交加，由于水肿极为难治，在拖延了很久之后，与世长辞了，享年70岁。尽管作者生前的名字响誉全欧洲、全世界，但是最终走向历史的时候却是悄然的，没有人送葬，没有墓碑，迄今也难以找到他的墓地究竟在何地。直到他逝世的200多年以后，在1855年，西班牙政府在马德里的广场上修建了一个纪念碑，纪念碑上雕塑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艺术人物形象。

塞万提斯一生穷困潦倒，贫病交加，身无分文。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却给人类留下了不朽的财富，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第四章　先河开掘者

中世纪的法律和政治及教育往往是由经院主义统治下的以神为核心的内容，它束缚了人的主动性，使人们都以神为核心，去服从神的旨意和安排，把一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培养成了维护天主教会控制下的宗教与世俗封建势力的代言人。

然而，中世纪的黑暗并未能阻止黎明的到来，政治学、法律和教育不能永远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势力的工具。在这禁锢的时代，竟也有率先冲破这束缚，而创立带有新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拓荒者。他们勇敢地同传统的教育、政治和法律宣战，他们率先走出了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下的禁区；他们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和法律开了先河。他们是真正的先驱和拓荒者。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留给后人的财富。

狮子和狐狸的思辨

“一个聪明的君主，应当既是狮子，又是狐狸，”“因为狮子使豺狼恐惧，狐狸能认出那些陷阱。”

这是在所有的谋略书籍中唯一能独占鳌头的巨著《霸术》即《君主论》一书的中心内容。

《君主论》是由佛罗伦萨著名的谋略家、军事家和政治家马基雅维里的代表著。该书对君主人文主义的目标和理想进行了评论并因此对政治理论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马基雅维里可以称为第一位重要的近代政治思想家。他认为，坚持要君主们恪守道德而将其它因素都排除在外的人文主义理想是天真的。他写道：既然我的目的是为求教者提供一些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那么我想最好还是说明一些实质性而非想象性的问题。很多人都梦想过那种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共和国封邑。理想中人们应当这样生活与实际上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这中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以致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理想的生活方式而忽视了实际上人们做了什么的话，那么他就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政治既要

求道德也要求理性力量，甚至理性力量应先于道德。

在这一点上，他的意见是十分明确具体的，他写此书的目的也很明确。他的这些宏论是从古人的经验和自身经历得来的。

当佛罗伦萨还是一个小共和国城邦的时候，马基雅维里就已经看到了国家统一是未来发展的趋势。马基雅维里出生在没落贵族家中，从小没有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主要靠自学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摆脱了当时盛行的那种刻意仿古、皓首穷经的脱离实际的学风。

当马基雅维里 20 岁时，在佛罗伦萨政府当雇员，当他 25 岁时，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军进攻佛罗伦萨，乔凡尼不战而降。佛罗伦萨人民在多米尼派僧侣萨优那罗拉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赶走乔凡尼，重新建立了共和国。

马基雅维里在这时亲身经历了这件事。1498 年，萨优那罗拉被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异端”罪处以火刑。萨优那罗拉死后，共和国存在 14 年，这正是马基雅维里政治生命的高峰时期。他本在共和国第二大法官马塞洛·维

吉利奥·阿德里安尼手下当书记，29岁时升为第二大法官兼任共和国最高行政机关“自由安全十人委员会”的国务秘书，主管外交和军事，以及负责起草政府文件等工作。他曾多次奉命出使意大利各邦和法、德等国。诸多国务活动，使他受到了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等多方面的实际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他后来的著书立说打下了基础。

1500年，他第一次出使法国，同法王路易十二会谈有关比萨脱离佛罗伦萨共和国和比萨独立事宜。通过谈判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必须懂得外交斗争的策略。出访过程中，他实地考察了法国，法国的统一、王权的强大和国家的强盛，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深感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国势衰微和自己在国外受到的轻视，这激发了他强烈的使命感，要实现国家的统一。

这时他认识到消除分裂的唯一办法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国家，要像法国那样统一在一个君主政权之下，才会有幸福和安宁可言，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意大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只有强有力的君主，

才能使臣民服从，才能荡平国内的叛乱和抵御外族的入侵。

1502年，当马基雅维里受到当时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彼埃罗·蒙德里尼的赏识并给他做助手时，他的才干在国务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基雅维里认为国家要强大，必须建立一支常备军。因此他向政府建议实行军事改革。他认为雇佣军不可靠。因为他们平时专事抢掠，扰乱社会；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更不能依靠他们，因为他们往往视金钱如生命，不守信义，有奶便是娘，谁给钱多，就为谁服务，为利益而出卖主子。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各城邦一直就是依靠这种雇佣军作战，这些人骄横拔扈，纪律涣散，斗志不强，易于叛变。所以他主张建立一支普遍兵役制的国民军，他建议政府从城市附近的农村中征召18岁到30岁的农民参军，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孔武有力，如果能定期训练，装备精良，就能做到战无不胜。

政府采纳了他的军事改革建议，并命他全部负责此事。

还有一件事是促使他在政治思想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1502年10月，他以特使身分来

到凡作丁公爵凯撒·博贾的军营 。这位公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了他许多的思考。凯撒·博贾是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贾和其情妇凡诺扎·贾旦妮所生之子。罗德里戈·博贾后来夺得了教皇宝座，号称亚历山大六世。凯撒·博贾利用他父亲的权势，当上了凡作丁公爵，娶法王路易十二的侄女为妻。此人精通政治权术，自私自利，凶残奸诈。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残害亲骨肉，谋害亲兄弟。他用十分卑恭的礼貌对待政敌，隐藏自己的用意，一旦取得对方的信任，就无情地绞杀他们。当人民起来造反时，他派酷吏前往血腥镇压。当和平到来时，他向人民表示，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把他亲自派去镇压人民的官吏处以死刑，以平民愤。凯撒·博贾野心勃勃，妄图夺取更多的领土，称霸意大利。可是他的企图终因亚历山大六世的去世破灭了，凯撒·博贾也很快垮台了。凯撒·博贾的所作所为受到马基雅维里的高度赞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为象他这样的君主，才是实现意大利统一的理想君主。他说：

"现在回头去审视公爵的一生的行动，我不知道在哪一点上应该责备他，相反，我觉得我必

须像我所做过的那样，把他提出来，当做某些君王的榜样。”

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是理想的君主，后来把他写进《君主论》里，作为理想君主的典型。也正是这一次出访留下来的印象和反思，才有后来《君主论》的政治思想。

从1503～1506年间，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从3个方面总结经验：一是研究历史经验；二是研究当时意大利的现实政治；三是考察凯撒·博贾的政治生涯中所提供的经验。这时，他的政治学说特别强调君主要有实力，即所谓实力政策。他认为君主要加强自己的权势，就必须依靠军事力量，君主必须懂军事，重实力，尤其要培养忠于自己的军队。凯撒·博贾之所以能征服罗马地区，就是因为他已建立了一支由他亲自指挥的嫡系军队。马基雅维里还从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一书中借鉴到，古罗马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采用了普遍兵役制的常备军这一经验。因此，他深感实力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君主如不掌握军队，没有实力，法律再好，也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1506年底，他向“十人委员会”正式递交

了一份关于建立新军的建议书，不久获得批准，并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征兵事务的机构，由他担任秘书，全权负责组建新军工作。不久，他建立了一支以步兵为核心的国民军。1509年，他亲自率领这支军队攻打比萨，结果比萨投降，他凯旋荣归，从此名声大振。

1507年12月，马基雅维里出访德意志，拜会了德皇马克西米连一世。在出访期间，他亲眼看见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他对帝国的实力和政治上的弱点做了深入的研究。1510年，他再度出使法国，拜会了路易十二。他从多次出国访问活动中，了解了西欧各国的政治情况，特别是了解了法、德两国的君主专制的经验教训。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消除意大利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况，才有可能实现祖国的统一，才有可能使意大利强大起来。意大利如果长此分裂下去，必将招致外敌入侵，意大利的命运也就危在旦夕了。因此，他把意大利统一视为当务之急、高于一切的任务，全力以赴地寻求各种统一祖国的方案。

1512年，美第奇家族依靠西班牙军队和教皇的支持，重新打回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军事力

量由于太弱而失败。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握了佛罗伦萨政权。

马基雅维里于1512年11月7日被解除政府职务，但他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托人求情，希望再次效忠美第奇家族。正在这时，有一起图谋推翻美第奇家族的事件被侦破，从抄查阴谋者的密件中，发现支持他们的名单中有马基雅维里的名字。因而他被牵连逮捕入狱，先后遭到4次审讯和酷刑，身遭摧残，后因找不出确凿的证据而被释放。释放时，他已经瘸了。而且他的行动仍受到监视和限制。他唯恐再度入狱，便带着家室，回到城外他家的小庄园里，过清苦日子。但他仍想重返政坛，实现自己统一祖国的理想。因此，一再托人疏通美第奇家族，甚至自己亲自上书请求，或进呈作品，以求重新得到重用，但毫无结果。

然而，在马基雅维里政治上失意之日，也正是他学术上成功之时。他在隐退生活中，忙于著书立说，用自己生命最后的15年时间从事著书立说，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的遗产。1513年12月10日，他在致老友佛兰西斯柯·维特里出任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的贺信中，倾

吐他在乡间撰写《君主论》一书的情景，以幻想的笔调写道：

“黄昏到来，我回到屋里，走进书斋，在门外脱下那套沾满尘土的衣裳，穿上朝服。我整整齐齐地重新打扮好了以后，走进古代人物的古代建筑里。我的主人在那里以全部的慈爱之心欢迎着我。我在那里饱餐美味，只有这才是我的真正营养，而我天生也就应该享受这种饮食。在那里，我毫不愧色地向他们致辞，并询问他们所作所为的动机和理由，他们亲切诚恳地回答我的问话。我忘记了一切忧虑，不再感到烦恼，即使死亡也不觉恐怖：我完全与古代人物为伍了。”

他又说：“但丁说来，如果不把所见所闻随时记录下来，我们就得不到知识。所以，我把和古人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写了《君主论》。在这本书里，我尽可能深入探索‘权术’问题，讨论什么是王国，王国有哪些种类，讨论了君王们是如何夺得王国的。”他系统地阐述了一个君主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和才能，以及关于君主统治的种种方式和政治权术的理论。他主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即提出所谓“目的

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原则。他认为，“君主应以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为目的，而为此至所采用的手段，总会被人认为是光明的，而且会受到人们的称颂。”换句话说，在他看来，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统治的目的，必须彻底屏弃道德，施展权术，甚至采取残暴狡诈、背信弃义以至玩弄阴谋诡计等种种卑劣手段，都是在所不惜的，只要能实现目的就行。马基雅维里写道：

“我们时代的经验证明，正是那些忽视诺言，善于诡计惑人，而最后战胜了那些专讲信义的人的君主，才创下丰功伟绩……君主必须会那样随机应便，以便遵循时代潮流和变幻无常的命运所指出的方向，正如我以上所述，如有可能，不要离开善良的道路。但是，如果必要，要善于走恶毒的道路。”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它最先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学说。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同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政治思想传统完全决裂了。他试图不借助基督教教义而去理解和解释国家，否定国家是上帝创造的以及统治者应基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去制定政策这一普遍观点。他认为宗教不是政治的基础，而仅仅

是君主取得成功的有用的工具。在必要时君主要在信仰上把自己伪装起来，不管他内心的真实世界如何，在表面上要显得无比虔诚，并且还要利用其国民的虔诚。作品完成后，作者把它献给了美第奇家族。

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全书是他对意大利几百年来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总结，也是他自己从政经验的理论概括。他在这本书中收集了许多古今实例。马基雅维利明确主张“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有利”。凡是“聪明”的君主就应该运用暴力和欺骗，高压和怀柔，刽子手和牧师相结合的软硬兼施的手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用狮子和狐狸做比喻来形象地说明自己的主张。他说一个“聪明”的君主，应当效法狮子和狐狸，“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一个君主必须是一个狐狸，以便认出那些陷阱，同时又是狮子，以便使豺狼恐惧。”在他看来，凡是贤明的君主，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如果真的具备了各种美德并永远遵行的话，那对君主来说也是极其有害的。但是，君主必须懂得在表面上装成具备这些美德的样子，“要做到在

人们看来是仁慈的、忠实的、合乎人情的、虔诚的与正直的，甚至，事实上也可以真这样做，但君主一定要有这样一种思想准备，即一旦局势需要，就毫不迟疑地抛弃一切美德”。他的这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权术“理论”，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基雅维里主义”。

“马基雅维里主义”这个政治概念，后来带有贬意，逐渐变成了政治上尔虞我诈，背信弃义和不择手段的同义语了。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概念和对马基雅维里本人的评价严格区别开来。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毫无疑问地已经打上了资产阶级局限性的烙印，存在一些缺陷和弱点，但是我们从他的主要著作来看，他的思想主流是爱国主义的和反封建的。马基雅维里下面提到的观点震惊了基督教的欧洲：

“如果一个君主要确保其统治就必须学会如何不义，并且要根据需要来对义与不义进行取舍。”

在 1557 年，罗马教皇保罗四世把《君主论》正式列为禁书，说明它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几百年来，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权术“理论”

一直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发生着特殊的作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为了夺取和巩固权力，把马基雅维里主义奉为金科玉律，顶礼膜拜。他们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宣扬武力，尔虞我诈，背信弃义，不择手段成为他们所实行的政治的典型特征；对劳动人民来说，“马基雅维里主义”却成了最好的反面教材。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学说的世俗性，即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他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用神的眼光来研究政治学说，他的政治理论摆脱了宗教信条、神学概念，冲破了传统的神权政治理论藩篱。他的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第二个特点是他研究政治理论不从道德观念出发。他的政治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以权力作为法的基础。因此，马基雅维里颂扬明君，歌颂强者，崇尚暴力，摈弃道德，却是为了一个最高目的，即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所以他才主张不择手段。

总之，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建立统一和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进

步要求，但是他不是把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而是求之于精明强悍的霸主。

马基雅维里不仅是国务活动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文化巨匠。他的著作涉及到政治、文学、历史和军事等各个领域。最著名的作品有《君主论》,《罗马史论》,《李维历史注疏》,《战争的艺术》又叫《兵法七卷》或《军事艺术》,《佛罗伦萨史》等。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围绕如何实现意大利统一和富强而撰写的，为后世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角斗场上的仲裁人

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中，有一位开国际法理论先河，奠定了自然法学派的基础，建树卓越超绝的资产阶级法学家——荷兰人格老休斯。

16 世纪末的荷兰正经历着时代的大变革。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次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摆脱西班牙王室束缚的革命。革命取得成功，形势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在这大革命的风雨中，洗练了一位近代法学大师的鼻祖。

当时，格老休斯亲身经历了这场革命，他的心灵深处逐渐打下了民族意识的烙印，孕育了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同时他受到来自家庭的激进思想的影响，从小就已经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11 岁的格老休斯就已经成为一名大学生，广泛地学习文学、历史、法律、哲学、天文和数学等科学知识。14 岁就完成了全部学习任务，后来跟随驻法大使巴威尔特到法国学习法文。此时他立志攻读法律，所以又来到奥尔良大学进修法律，18 岁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学业结束后不久，他在海牙获得律师资格，以后就长期以律师为职业。当时由于他的文学和历史素养很高，在神学和哲学上造诣也很深，通晓自然科学，所以被委任为主编拉丁文编年史的史官。但这时他正忙于撰写他的第一本法律书《捕获法》。他一边负责修史，一边著作，并于 1604 年完成了《捕获法》，但是没能顺利出版，直到 1868 年由后人整理出版。在这本书中，基本上具备了他的法学思想，为后来完整、系统的法学理论打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他的才华和能力在社会上进行律师工作中逐步地为社会所接受，名气越来越大。从

1607 年起，他承担了荷兰最高法院副总检察长和辩护律师。

荷兰资产阶级在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之后，积极推行海外殖民掠夺政策，谋求海上霸权，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角逐，在 17 世纪已经成为海上的霸主，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在激烈的国际争夺中，格老休斯从法律角度出发，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辩护、呐喊。1609 年他应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要求，发表了《论海上自由》，提出了所谓自由航行权的主张。他认为海域应自由利用，共同所有。这个主张的出发点是为了打破西班牙和葡萄牙及英国的制海权，为荷兰资产阶级进行海外掠夺开拓道路。文章发表后，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西班牙坚决反对，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也大为恼火，但荷兰资产阶级却拍手称快。荷兰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于 1613 年任命他为鹿特丹市长。

1616 年，格老休斯又奉命出使英国，要联合英国对付西班牙。在与英国谈判过程中，他再次提出了“海上自由”的主张，坚持荷兰政府一贯倡导的“海上自由”政策，获得了突出成就，谈判顺利完成，为荷兰争得了国际利益。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初期，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开始激化了。以联省大议长奥登巴恩韦尔为代表的所谓“共和派”与以莫里斯·德·纳骚为首的奥兰治家族的所谓“君主派”之间的斗争，以及新教内部出现的派系斗争，使刚刚诞生的共和国陷入分裂。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新兴的荷兰资产阶级与封建保守势力之间的争夺果实斗争。矛盾冲突扩大化，发展为武力争斗。格老休斯站在共和派的立场上，支持荷兰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成为其得力的干将。他与奥登巴恩韦尔关系密切，来往甚多，在议会里，撰写文章呼吁制定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宗教政策。这场斗争以君主派胜利告终，因为莫里斯用武力镇压了共和派，处死了奥登巴恩韦尔。格老休斯被捕下狱，特别法庭判他无期徒刑。3年之后，他越狱逃跑，到法国的巴黎避难。

1618年，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爆发。各教会和世俗封建主集团之间长时间的争战，严重损害了法国资产阶级利益，促使他们四处寻找消灭封建战争的理论根据和法律根据。

格老休斯的新著代表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心声。1625年，法国出版了他的新著《战争与和

平法》。这部著作除序言外由3部分组成，主要探讨国际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法规的问题。在序言中论述了权利和法律的起源；第一卷论述了战争的性质及有关主权等问题；第二卷论述了战争的原因等一些问题；第三卷谈到了战争期间的权利义务等问题。著作出版后极为畅销，70多次再版，被译成24种语言文字。一些大学里还开办了专题讲座，研究这本著作。格老休斯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来维护主权的，著作中的观点不可能符合保守的封建势力的口味。所以，当他的著作出版后，满怀希望地把著作献给法王路易十三时，遭到了握有实权的法国首相黎塞留的白眼。

1631年，格老休斯返回荷兰，再度卷入了荷兰国内政治斗争，并激怒了荷兰执政当局。1632年，荷兰执政者腓特烈·享利下令通辑他。国内呆不下去了，迫使他再度过上了流亡生活。这次他流亡到了德国的汉堡。1634年，瑞典政府得知他的流亡生涯，因仰慕他的法学才干，发出聘书，请他到瑞典出任大法官。格老休斯已经厌倦了流亡生活，也就欣然接受了聘请，来到瑞典从事法律工作。他曾以瑞典驻法国大使的身

分出使巴黎。在这段时间里，格老休斯没有什么突出的法学成就，只是忙于政务上的琐事，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没有新的进展，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只是偶然在工作之余，他写一些关于文史类的内容，在其逝世后于1657年发表的《尼德兰革命史》就是这一段时期的作品。他的史学著作有古代史学家塔西陀的文风和伊拉斯莫的人文主义观点。但是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是难免的。

早在希腊罗马时代，一些思想家在其哲学理论探索中，就曾有过以普遍道德为核心的自然法理论。到中世纪时，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也承袭了这个观点。但是，他们认为主导作用因素即是神法，以神法来支配自然法，将自然法看做是上帝意志的派生物。到17世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兴起时，资产阶级思想家以人性为出发点来阐述自然法，摆脱了神法的束缚，强调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格老休斯集前人之所长，汲取了他们的一些观点，并加以发展，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自然法理论和观点。

在他的著作中，格老休斯使自然法的概念

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具有了世俗的性质，有些地方表现出了无神论的色彩。他说，所谓"自然法"这个概念，不能做出别的解释，而是指人的本性，也就是人的理性的体现。他给自然法下了如下的定义：

"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的善恶的标准。"

实际上，他所指的是天理良心所产生的道德规范。他对自己的理论作了这样的说明：人的本性不同于动物，有社会性，要求和平地、合理地共同生活，因此，人的本性必然是自然法的渊源。自然法的实行不需要依靠强制，因为自然法来自人的理性，所以人人都自觉遵守。他认为：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上帝的意志不能将其改变，正象不使2乘2不等于4一样，也不能使理性认为恶的东西变为不恶。

用理性来代替神性，这是格老休斯法学思想的进步性。虽然他也承认上帝启示的作用，但认为理性起主导作用。格老休斯在承袭了古人道德观念的同时，又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然权利的观念，并用这种观念来阐述他的自然法学说，具有明显的近代自然法特点。他说："自然法的

根本原则：一是各有所有；二是各偿其所负。”因此，“他人之物，不得妄取，误取他人之物者，应以原物和原物所生之收益归还物主。”显然，格老休斯是完全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立场上来说明其理论的。

格老休斯也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法律分类法，将法律分为自然法与制定法两类，而制定法又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类。他认为，自然法出于人的本性，而制定法则出自于人的意志，但无论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归根到底都来自于自然法，服从于自然法的原理，尤其是信守诺言的原则。

格老休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国际法方面的研究。格老休斯认为，国际法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寻求和平，制止战争。但是，他不是笼统地反对所有的战争。他把战争按性质分为两种：一种是正义的战争，另一种是非正义的战争。什么是正义战争？他明确指出：“自卫，恢复自己的财产，惩罚。”他不反对以武力手段进行自救和自卫，用正义战争去消灭那些“不合法的”、“无理由的”非正义战争。他的观点就其实质来说，是只反对封建势力发动的战争和宗教战争，而

为资产阶级的扩张主义和殖民掠夺战争提出了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在国际法理论研究中，格老休斯有许多进步的观点。他把正义与公平作为国际法的准则，反对使用违反理性的暴力，提倡人道主义。他说："我们必须更加小心地用人道主义行为来缓和野蛮行为，如果我们过分地仿效野兽，就会把人完全忘记。"所以，他反对在战争过程中屠杀战俘，滥杀无辜，摧残妇女和儿童。这些思想延续到今天，已经为国际上很多国家所接受，仍有现实的意义。

另一方面，格老休斯的政治思想中，还有关于国家与主权的因素，这是研究法律必须涉及的领域，因此，格老休斯在这方面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在研究国家与主权的问题时，也是完全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来论证的。他认为，人类社会出现两个阶段：自然社会与人为社会。在国家形成之前，人类历史处于"自然状态"下，人们受纯粹的自然法的支配，孤立而分散地生活，但人人平等，没有也不存在等级差别，每个人都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力。后来，原始人类的这些素质消失了，引起了财产的分割，于是原始人从经验

意识到孤立的家庭不能抵御外部的强暴，一致同意结合起来成立国家，由此便产生出政府的权力。他根据自己上述这些关于人类社会的论证，给国家下了这样的定义：

"国家是自由人为了享受法律的利益和求得共同福利而联合起来的一个完善的结合。"

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动用公共的力量，并征得公众的同意，保证每个人使用自己的财产。"

这样，他既把国家看成是人们理性天然冲动的结果，又把社会契约看做是现代一切国家形式的渊源。他反对功利主义的法学观念，但是又赞成用功利主义作为补充手段。格老休斯的国家学说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理论，但对君权神授的神权论思想仍是有力的批驳。

在主权问题上，格老休斯写道："凡行为不受别人的意志或法律支配的权力就称做主权。"也就是说，主权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格老休斯是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出发来说明主权学说的。他认为，这种权力应属于国家所有。但是，从狭义上说，是归法律所承认的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所掌握。他的主权说表达了大资产阶级和

新贵族统治国家的要求，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反对主权在民的思想，反对民权高于君权以及君主与臣民相互服从的主张。他认为，君臣职分一经确定以后，只有臣民对君主的强制性的服从，不能因君主滥用权力而要求改变政府形式，只有特殊的例外。按他的看法，如果人民一旦起来反抗，那么国将不国，人民也变成一盘涣散的群体。因而他主张君主无须服从人民的意志，而应该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而存在。

他拥护君主专制，反对人民主权的思想，也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思想存在着保守性和阶级局限性。

从他思想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上可以看出，格老休斯的法学理论还没有同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体系彻底决裂，并且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常常陷入逻辑上的混乱。如：他既说国家是自然形成的，又说是由于契约形成的，把理性和契约混杂在一起。再如，在国际法方面，他一方面提倡人道主义，一方面又说因债务而扣押债务人，由契约或犯罪而罚为奴隶是符合自然法的。但总的来看，他的法学思想，尤其是国际法

方面的理论学说，具有开创性，因而享有盛名。他的思想和理论，不仅在当时欧洲起到进步的作用，而且为后来的国际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迄今仍被尊称为国际法的创始人。

教育史上的哥白尼

“穷人被忽视，而往往埋没卓越的才能。”这是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一句格言。

夸美纽斯在捷克语中是康敏斯基的意思。因为他的父亲原来曾住在康敏这个地方。他的父亲是磨坊主，也是捷克兄弟会的成员。这个组织是捷克当时较为激进的组织，继承了胡司的传统，为了争取宗教自由和民族独立进行秘密斗争。它的组织原则是内部实行互相援助，普及教育。夸美纽斯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明显受到了兄弟会的思想影响。

在大学时代，他刻苦学习，认真研究了许多古代思想家和人文主义著作，同时又接受了他的老师皮斯卡托尔和阿利什贴德两位学者的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教育观点。

从1612年起，他开始热心搜集和整理捷克

的民族语言，准备编写《捷克语宝库》一书。1613年，他到欧洲各地旅行，最后到达阿姆斯特丹，沿途所见所闻，开阔了眼界。归来后，他又入海得堡大学继续学习。不幸的是，他生病不能继续念书了，只好辍学返回故乡，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从事学校教育工作。1614年回到普列罗夫，被委任为他曾就读的拉丁语学校校长，并在兄弟会担任牧师。1618年，他被派到伏尔涅克城，任牧师和兄弟会学校校长。工作之余，他研究了西班牙教育家路易·费佛斯以及约·瓦·安德罗雅的教育学著作，收获很大。

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了捷克。1620年白山战役捷克失败。1621年，西班牙军队占领伏尔涅克，放火烧城。到处都是被火焚烧的残迹，夸美纽斯的藏书和大量手稿也都未能幸免。1623年，他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面对这战乱和失去亲人的不幸，夸美纽斯没有沉沦，而是在悲愤中更加努力，奋发学习，写出了一部揭露封建贵族和天主教僧侣的《世界迷宫与心的天堂》。

后来，由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局动荡，夸美纽斯流浪到了萨托夫斯基伯爵的庄园。在

这里，他用3年时间构思了一部《大教学论》的写作计划。

1627年7月31日，皇帝宣旨：天主教是唯一的宗教，在6个月内，贵族与市民必须公开宣布皈依天主教。反之就不能居住在捷克。夸美纽斯无奈离开了家乡浪迹天涯，来到了波兰的黎撒。在这里他负责管理古典中学，这是一所属于兄弟会办的学校。1631年他写了一部《语言与科学入门》教科书，这本书被译成了大约有15种文字，在全国学校中当做课本使用。两年以后，他写了一本《大教学论》和《母育学校》。这些教育著作使他得到了各国的称赞，并由此一举成为名人。到17世纪50年代，他又撰写了许多哲学和教育的著作，如《组织良好的学校条例》，《青年行为手则》和《世界图解》等等。

当波、瑞战争时期，捷克兄弟会避难的黎撒城也被烧掉了，夸美纽斯只得避难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全集就在这里用拉丁文写就并出版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可以概括其教育思想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接受的是英国著名学者弗·培根的自然哲学，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学观点。他认

为“在感觉中没有过的东西，在理智中也不会有”，要“在感觉的基础上认识现实世界”，这就是他的唯实主义和直观性原则，这成为他的教育思想的基础。他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很突出，主张建立一套统一的学校制度，一切都是为了儿童，不分等级、财产状况和性别，建立普及的义务国语学校。

其次，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很浓厚，他认为人是“最完善最优美的创造物”，是“绝妙的小宇宙”，学校是“培养人的工厂”。

再次，在教学目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的作用方面，他都提出了自己的明确看法。他所提倡的教学目的带有一些宗教色彩，让人为来世的永生做准备。这一点是由他生活的时代和本身的思想局限性决定的。教育的任务是为了认识自己和周围世界，自我管束，向往上帝。这一点，就更明白的表现出很浓的宗教色彩。至于教育的作用，他强调人之所以成为人只是在适当的年龄得到教育，他确信“任何儿童都可以成为一个人”。他的观点揭示了人世间有两种人，一种是天才、勤勉的人；另一种是天才、愚笨的人。而这两种人都是可以通过教育发挥他的智慧和

能力的。作者在这里宣扬着一种学校教育成才论，反对中世纪那种私人的家庭教育。

另外，在学校教育的制度、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的年龄等项目，他都明确地设计了方案。他认为，人受教育的年龄可分为4个阶段，每期均为6年：幼年期——从出生到6岁；少年期——从6岁到12岁；青年期——12岁到18岁；成年期——18岁到24岁。幼年期的特征是身体迅速成长，感觉器官发展；少年期的特征是记忆和想象力连同其执行器官——语言和手较快发展；青年期的特征是除了上述的特征以外，思维（理解和判断）向更高程度发展；成年期的特征是意志的发展和有了保持和谐的能力。教育制度又分母育学校（即由母亲担负学前教育），6年制的国语学校，为青年设立的拉丁语学校或古典中学，为成熟的青年设立专门学院（分设神学、法学和医学3个学科）。

在这里，夸美纽斯提出普及6年初等教育，呼吁必须废除“穷人被忽视，而往往埋没掉卓越的才能”的状况，“坚持主张对一切人授予一切知识的普遍教育”。他反对教条主义教学，他说：“不应单凭权威去教授任何东西，而应通过外部

感觉和理智，根据证据来教一切知识。”他主张用直观教学和独立思考能力学习知识。他对学校教育的教学组织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他认为，应该把学生的学习分学年来组织，一学年又分为几个学季，建立放假制度和学日组织（国语学校 4 学时，拉丁语学校 6 学时），学校分为若干个班级，由低到高，循序渐进。

夸美纽斯还为学生规定了教科书，他编写的教科书有两种：《语言和科学入门》及《世界图解》。前者属于语文教科书，后者属于对儿童传授基本知识的带有插图的百科全书——有关自然、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知识。这部教科书被许多国家翻译成各种语言的教材，在各国学校使用，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成为资产阶级推行学校教育的一套完备的启蒙教育教科书。

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和主张，表达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追求，试图打碎神学占统治地位的经院教育和蒙昧主义教育的桎梏，实现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民主教育，认识客观世界；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去科学地掌握知识和文化。同时也表现出他的

爱国主义，渴望民族独立的情感。

他在批判旧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博大精深，周密具体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有着完整的教育体系，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情。这种教学体系，为世界各国的教育事业都有“模式”性的影响，近代和现代各国教育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都有着夸美纽斯教育理论和教育体系的痕迹。因而，他的教育理论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先驱。

当然，我们从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中，也不难看出，作者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和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宗教色彩，还没有完全脱离神学的阴影。因为他不懂得教育也是有阶级性的，教育实质是某个阶级为自己培养接班人的途径。他仍然坚信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把教育看做对上帝的忠诚，为上帝尽职尽责的一个方法。因而，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具有跨时代的特点：一方面是倡导新的思想和教育理论，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但另一方面，又与宗教神学教育有着丝缕不断的联系，未能完全脱离宗教的阴影，未免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这刚好是时代变革

时，新旧事物之间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系的特点。对此，我们应当加以批判地吸收，客观地对待。尽管如此，夸美纽斯和他的教育理论仍不失为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教育家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理论体系。他被后世称为“捷克文化巨子”、“教育史上的哥白尼”。

自然的征服者

在世界史上，很少有象科学革命这样举足轻重的事件。从15世纪起的历史表明，欧洲对地球上所有地方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在不断增长。在这方面，西方的全新的科学和技术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发明的力量、美德和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再没有比那三项对古人来说一无所知的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更为引人注目的了。这三项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况：第一项之于文献，第二项之于战争，第三项之于航海，随之而来的是无以数计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类活动中，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都不如这些机械的发现更具有力量，更具有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精英们正是看到了这种发

现的力量，激发他们解释自然界的热情和测量、体验自然界的愿望。于是欧洲涌现出了大批科技巨星并对中世纪的经院主义自然观发起了挑战。

我们从天文学界可以再次看到人文主义与传统宗教之争。如同在别的领域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有着曲折而动人的故事，让后人为之心灵震颤，慨叹。

古代天文学有两个通行的宇宙体系，第一个是欧多克斯·卡立普斯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体系。它采用了一系列同心圆来解释恒星的周日旋转以及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为了解释观察到各种不同的运动，每个行星分别被指给了一些球圈，一个球圈内最多达到4个行星。有了足够数目的行星圈，就有可能解释如岁差和行星围绕恒星的逆行这样一些复杂的运动。通常认为，这个体系解释不了下述事实，即太阳、月亮和行星同地球的距离似乎周期性地发生改变，因为其表现的大小和亮度有所变化。

另一个体系即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求弥补亚里士多德宇宙论的缺陷而产生。公元2世纪，托勒密对这个新体系做了修改和细节的

扩展而使它成了一个数学体系。托勒密在他的《至大论》中描述了这个体系，直到17世纪都一直得到大多数天文学家的公认。

托勒密的宇宙体系保留了早先的天球圈，又增加了许多变化的圆圈来更详细地解释新观察到的现象。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如果一个行星看起来是绕地球做圆周运动的，它可以被放到一个大的圆或均轮上。然而，这种完美的正圆——除了对于恒星而言——是不存在的。因而就假设了许多别的圆圈。为进一步涉及到均轮的运动时，就引入了本轮，其圆心位于均轮的圆周上。这种双重的运动既解释了距离的变化，又解释了行星的逆行。别的一些不规则性使托勒密把地球放在远离太阳的地方，并且使用了偏心圆和对心圆。后者用来解释行星速度所呈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在相等的时间周期里就可以观察到相等的角度。把所有这些方法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个成熟的宇宙体系，这个体系在相当准确的程度上解释并预测了天体的运动。因此，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使其他古代学者黯然失色。尤其是托勒密在人文主义天文学家中的统治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而哥白尼正是托

勒密的最大受惠者。

哥白尼1473年出生于波兰的托伦城，其时正是斐尔巴赫天文学著作第一版发行的时候。哥白尼18岁时进克拉科夫大学，他在那里广泛地涉猎了天文学和数学著作。当列吉奥蒙达努斯正准备发表《天文大全》第一版时，哥白尼来到波托尼亚学习教堂法。在一度回家短期休息之后，他又来到帕多瓦学习，并于1503年在费拉拉取得教堂法规博士学位。在波托尼亚以及帕多瓦时，他都同知名的天文学者有联系。1506年，他回到家乡永久定居，在这里参与了艾姆兰邦的治理和经济、医药方面的决策。但他的兴趣在天文学方面，把在意大利的学生时代所做的一小部分观察结果发表在《天体运行论》中。但大约到1512年，在其手稿中，宇宙日心说的概念就已经完全构成了。在手稿中，他勾画了这个理论，并且概述了它的一些结果——他提醒读者，他正在从事一项重大的研究。

地动的概念似乎同常识相矛盾，它给古代学者带来了无数的难题。托勒密就论述过，如果地球是运动的，所有没有固定的地球表面的物体都会掉落。为什么哥白尼终究还是转向了日

静说（哥白尼并没有把太阳放到正中间，故最好叫日静说）？在《天体运行论》中，哥白尼声称他的工作仅仅是恢复了古代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但是在涉及到行星次序时，他说："在所有这一切的中心是太阳。的确，在这最神圣的庙宇里，它可以一下子普照宇宙万物。谁还能把它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呢？因此，一些人把它叫做世界之灯并不是不恰当的，另一些人则把它视为世界的头脑，还有一些人则把它当做世界的统治者。（埃及的）赫尔墨斯称它为可见的上帝，索菲克利斯的伊列克特拉即无所不见之神。因而，可以确信，是太阳居于宝座上统治着它周围的星体家族。"

哥白尼在 40 岁以前就已建立了他的宇宙体系，但过了 30 年才发表。在《天体运行论》中写给教会的献辞里，他指出，他不情愿发表是因为害怕外行人的反对，因为天文学是一种数学家的专业，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尽管他小心地保护自己，但还是遭到了天主教会的迫害，罗马教皇斥责哥白尼学说是"错误的和完全不合乎圣经的异端邪说"，并且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甚至有人还写出剧本来咒骂和丑化哥白尼。

然而哥白尼给予反驳道：

“假使有一知半解的人，并无数学知识，而根据圣经这一段或那一段妄肆批判或者驳斥我的著作，我不但不预备答复他们，而且还要轻视这样的无知的见解。”

哥白尼的理论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体系的一些成份。他从未怀疑亚里士多德关于行星作完整的圆周运动的基本观点，也就是承认恒星在其中运行的那些水晶球体的存在，他还保留了许多托勒密的本轮。但是，哥白尼提出了一个日静说的宇宙模式，其计算形式较之托勒密的地心说的宇宙更为简单。他减少了托勒密本轮的数量，并澄清了以地心说观点为根据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感到困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哥白尼的伟大天赋表现在他探求宇宙日静说的能力上，表现在他把毕生精力和全部数学才华贡献在这种孜孜不倦之求索中。哥白尼使地球离开了它原先的中心位置，使它运动，也就是使地球成为又一颗行星，从而瓦解了中世纪宇宙论的体系，使近代天文学的诞生成为可能。

虽然对逆行的解释是哥白尼体系的一个胜

利，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天文学家，即：如果地球确实是在围绕太阳公转，那么在任何一个星体上的观察都会体验到这种可测量的漂移，或者至少如同古人所设想的那样，宇宙是按大小等级排列的。但是在6个月的时间内却观测不到这种角度的变化，结果许多人还是认为地球是静止的。哥白尼只好争辩说宇宙比天文学家早先设想的还要大得多。因此要接受哥白尼的理论就牵涉到宇宙的大小问题。

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接受了哥白尼的宇宙日静说，同时提出了一个同样的宇宙体系——一个无限的、无中心的宇宙，以此来“赞美上帝的卓越以及他所显现的王国的伟大。上帝的荣耀不仅在于一个，而在于无数个太阳；不仅在于一个，而在于成千个地球；我要说，在于无限个世界。”布鲁诺认为他这样就把地球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即恒星的层次。同时，他又补充说，我们的地球的确是围绕太阳旋转的，这就同无数个太阳系中的无数个地球一样。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由无数个世界组成的。他还推测，在其它星球上可能有生命存在。

由于他宣传和坚持哥白尼的宇宙观，同经

院哲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使他受到法国天主教和加尔文教的围攻。但他没有动摇，到处宣传哥白尼的学说，由哥白尼的宇宙观进一步提出了宇宙无限性和统一性的新理论。空间是无限大，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中心，也没有界限。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是宇宙中的一分子。宇宙不会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因而世界是永恒的，宇宙是一个统一的物质世界。把这一观点引进社会史观就是进化论，他认为，"如果没有变化，没有变易，没有盛衰兴替，就不会有适宜的东西，良好的东西，愉快的东西。"他把理性和智慧看成是改造社会，战胜一切的决定力量。这些观点与天主教会支持下的经院哲学观是完全对立的。

布鲁诺的观点引起了罗马教皇的恐惧和仇视，他设下圈套，以邀其讲学为名把布鲁诺骗回国内。1592 年 5 月布鲁诺被捕入狱。9 月罗马教廷正式要求审理布鲁诺案件。1593 年布鲁诺由威尼斯政府的监狱转到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监狱。3 年之后，布鲁诺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拒不认罪。宗教裁判所决定对他进一步"有效地"审讯，动用了重刑，迫使他认罪。布鲁诺从

容回答：

“我不应当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张。没有什么可放弃的，没有根据要放弃什么，也不知道需要放弃什么。”

“一个人的事业使他自己变得伟大时，他就能临死不惧。”

他拒不承认自己有“错误”。他说：

“高加索的冰川，也不会冷却我心头的火焰，即使像赛尔维特那样被烧死也不反悔。”

1600 年宗教裁判所最高审判官宣布布鲁诺是一个不思悔改的顽固不化的异端分子，被处以火刑。行刑那天，布鲁诺在临终前坚定地说：

“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来临，真理终将战胜邪恶！”

“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的，会知道我的价值。”

52 岁的布鲁诺在烈火中就义。过了 289 年之后，罗马宗教裁判所又亲自出马为布鲁诺平反，这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

第谷是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天文学观测家。这不仅因为他对星体的定期观测，以便绘制空前准确的天文表，还因为他设计了一个前所

未见的巨型观测装置。它安置在由丹麦国王修筑在赫文岛上的观测台上。在这里，他的一些助手在夜晚观测星空，其他一些助手则在下面一层的宽大的化学实验室里研究“尘世天文学”——化学。

一位德国青年，由于意识到第谷在天文学领域的卓越地位，在1569年把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送给了第谷。他就是后来成为第谷的继承人和最伟大弟子的开普勒。开普勒早先是一个哥白尼的信徒。当他被送到图林根学习时，听过迈克尔·马斯特林的天文学演讲。虽然这些演讲是基于托勒密理论的，但据后来开普勒的回忆，马斯特林还讨论过哥白尼的工作。这种新的宇宙学引起了这个学生的共鸣，当他去到格拉茨接任一个数学教席时，他已经在进行关于哥白尼天文学的研究。开普勒的第一个著作同时送给了第谷和声誉卓著的意大利数学教授伽利略。

这本著作显示了开普勒伟大的数学天才以及他对神秘关系的极大兴趣。他以《宇宙的神秘》为题，对宇宙的数学秩序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设想。他确信在行星轨道之间存在某种交错关

系，他计算和重新计算了这些行星跟太阳的距离，并得出结论：这些行星都同5个正多面体有特定的关系。因而，他认为宇宙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太阳在其中心，其周围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土星和木星，它们彼此依次被5个正多面体分隔开，第一个是正8面体，其次是一个正20面体，然后是正12面体，正4面体和立方体。这个结论明显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新毕达哥拉斯数学神秘主义的兴趣。开普勒的这个发现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显示了宇宙的神秘数学秩序。

第谷对于开普勒及其著作颇为欣赏，他邀请开普勒到赫文岛来供职。开普勒谢绝了第谷之邀而宁愿呆在格拉茨。但是，在随后的年月里，整个宗教气氛不利于新教徒，致使开普勒在1600年只好决定离开格拉茨。这时第谷已从丹麦移到鲁道夫二世在布拉格的宫廷中。鲁道夫自从即位以来对于所有的科学扶掖有加，约翰·迪早已久居宫中，在随时听候召唤，还有许多炼金术和占星术士也在宫中。虽然第谷被任命为皇家历算官，但是看起来，他作为一个化学家也像作为天文学家一样倍受欢迎。他的职位许

可他录用助手。正在这时，开普勒写信来询问是否还可以为他效劳。

得知第谷早先前的许诺仍然有效，开普勒便动身前往鲁道夫的宫廷。

在布拉格，开普勒有机会接触到第谷对行星的广泛观测。第谷还在世时，开普勒就着手研究火星的轨道资料，希望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某种数学规律。一开始他试图采用托勒密通常所用的方法，如本轮和偏心圆。然而，其结果并不像他预期的、从第谷的精确数据中所能得到的那样理想。

于是，开普勒便弃此而他顾，转而探讨行星运动的原因。由于新近对慧星的研究，使人们必须放弃透明球体以寻找求别的解释。受到吉尔伯特的磁力说的影响，开普勒设想出某种类似于吉尔伯特磁力的太阳的活力，这种驱动的神力从太阳那里放射出来，从而推动行星绕轴转动。他相信，这种力遵循相对于距离的某种平方反比律——但仅仅是在黄道面上。现在通常可以在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二定律中找到这些思考的结果，这个定律说明：太阳—行星的矢径在相同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开普勒接着对

这种活力进行数学研究，他推断火星轨道并不是圆形，这就破坏了传统天文学的根基，因为天界完满的概念是用圆周运动来表现的。对其他可能的曲线的广泛研究，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轨迹所描出的是椭圆第一定律。这两个结论第一次在《新天文学》中宣布，它们所依据的物理前提是一个物活论的宇宙。然而，这些结果显示为真，因而开普勒继续把它们应用于除火星以外的其他行星。

开普勒的第三定律出现在《宇宙的和谐》一书中，这也是他对宇宙之自然和谐不懈探讨的结果。用现代的术语可以把这条定律表述为：任何两个围绕太阳的行星，它们运行的时间之平方，同它们跟太阳的平均距离之立方成正比。照我们的观点，这是一个辉煌的发现，这里所揭示的关系对开普勒有深刻的意义。为了真正寻求到对世界的和谐的数学表述式，他从研究5个正多面体以及它们和谐比率入手，进而继续研究音乐的和谐以及其同宇宙的关系，《宇宙的和谐》的第八卷专门研究了行星所发生的4种声音（即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行星运行第三定律构成了另一卷的一部分，这一

卷用来表述音阶的谱号以及大和弦及小和弦的种类。

总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是出自数学大师之手，如果我们想要从其真实的背景中评价它们，就必须把它们同开普勒的整个世界观联系在一起来加以考察。

两年之后，开普勒准备编一本哥白尼天文学《大全》，现在他有机会重新证实他在先前的《神秘的宇宙》中得出的结论。他生前的最后那段岁月，主要是用来完成第谷的行星表，这些天文表终于在1627年问世。3年之后，开普勒本人便走向历史了。

开普勒最有意义的大部分工作都被掩没在他的哲学思辨中，因此直到17世纪中叶，才有许多学者引用他第二定律作为行星理论的基础。在这一期间，一系列新发展——首先是同伽利略的工作相关联的新发展，也有助于人们接受哥白尼理论。

伽利略出生在比萨，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他很快对数学和天文学发生了兴趣。这位青年学者受到阿基米德著作的强烈影响，他认为阿基米德对物理现象的数学表述似乎同亚里士多德

的著作大相径庭。他抨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缺乏数学性，并且歪曲了感觉经验。至少，当伽利略还是一个青年学者的时候，他就随意地把大宇宙和小宇宙的类比当作为对世界的真实表达：太阳是其行星臣属之王和中心。伽利略也像开普勒一样，寻求把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界和超自然界数学化。

1592年，伽利略成为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但当开普勒送来《神秘的宇宙》一书时，人们还不知道伽利略是一个天文学家。与别人不同的是，第谷详细地阅读了这本书，并为开普勒在赫文岛提供了一个职位。而伽利略只承认他收到了那本书，仅此而已。当然，他也相信哥白尼对世界的解释。没有资料可以表明伽利略受到了开普勒的影响——不管以何种方式。尽管他对轨迹运动做出了数学解释，但他还是执拗地用圆圈来描绘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

尽管伽利略早年写过许多短论，包括他在1604年关于慧星的演讲，但在1610年以前他一直没有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1610年，他发表了《星球信使》，这本只有28页的小册子振撼了欧洲的知识共同体。该书系用拉丁文写成，首次

公开报告了用望远镜对天体的观测。这本书给了那些倾向于哥白尼体系的人们以有力的支持。

虽然有证据表明，在《星球信使》发表以前的一代人当中，望远镜已经广为人知。甚至已经有过用望远镜进行的天文观测，然而毫无疑问，伽利略是第一个在出版物中描述其发现的人。伽利略在书中讨论了月亮表面的景色。虽然按我们的标准伽利略的望远镜显得相当简陋，但它对伽利略来说已足够准确了——它被用来考察月亮的大小、测量月表山投下的阴影并计算它们的高度。他还告诉人们，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许许多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星体。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发现了木星的卫星，他把这些卫星命名为“美第奇”，以此来赞颂佛罗伦萨的统治家族。这些卫星围绕木星旋转像是一个缩小的太阳系。

接下来几年的观测中，伽利略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金星也像月亮一样有盈有亏——只有行星围绕太阳旋转时才会发生这种现象。他还发现了太阳表面有黑子，且做旋转运动，由此表明了太阳的自转——这就进一步动

摇了天界不变的教义。

《星球信使》一书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他赞颂了美第奇家族——用他们名字来命名木星的卫星，他被任命为大公的宫廷哲学家，从而使他有可能重返佛罗伦萨。伽利略一夜之间声名大振，人们把他同哥伦布和维斯浦奇相提并论，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对于他的新发现，开普勒写诗赞曰："啊，望远镜，知识之利器，胜过任何王权。执此利器者，岂不应成为上帝杰作之主宰！"

伽利略的种种发现，对神学借以论证的上帝创造世界的基本教义，都是无情的揭露。这就触犯了神学，使他变成天主教的敌对分子，立即遭到了天主教的攻击和诽谤，说他发明用望远镜观测天体，是"魔鬼的发明"。天主教会引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的一段话："魔鬼带他上了一座高山，将世上的万国都指给他看。"说伽利略的行为是"魔鬼的行为"，"天主早已有预言"。1611年，罗马教廷宣布：不许他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不许宣讲他所发现的一切，不许他自由活动……

伽利略对天主教的威胁置之不理。这时教

廷宣判伽利略的发现为"异端邪说"，红衣主教警告他：必须放弃他的种种"邪说"，否则要受到严厉制裁。为了保全全部手稿，他被迫签了字，表示放弃哥白尼的学说。

伽利略用对话的形式，写了一本题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得到了新教皇的批准，1632年这部宣传哥白尼学说的光辉著作在佛罗伦萨出版了。这件事立即引起了天主教会的恐慌，立即被列为禁书。

此事惹怒了教皇乌尔班八世，他宣布伽利略的学说为"异端"。1633年开始审判，伽利略不认罪，坚持自己的观点。教皇下令对伽利略采取"维里亚"式的刑讯（所谓"维里亚"式就是车轮式审讯方法，不许睡觉），法官4小时一换，使伽利略疲惫不堪。此时的伽利略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重病在身。从2月到6月21日，伽利略一直被审讯。

他的好友布鲁诺于1600年2月16日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曾给伽利略心中留下了阴影。伽利略忍受不了狱中的折磨，最后被迫在认罪书上签字。

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当时在朋友规劝下，

在唯一的女儿恳求下，接受宗教裁判所的“判决”，以保全生命。他被押到迷内勒瓦山上的圣玛利亚教堂，被迫跪下表示忏悔，当这位老人站起来时仍然喃喃地念：“地球还在转动！”没有放弃他的信念，真理是永存的。

在病弱的晚年，他还坚持写作《关于力学和局部运动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和数学证据》一书，总结他一生对力学的研究成果。

当时罗马教皇不许这本书发表，他只好采取秘传手段，传到国外，1638 年在阿姆斯特丹麦出版。

1642 年，他因失去爱女悲恸不已，忧伤而死。伽利略关于运动定律的数学表述对现代数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它后来也成为牛顿工作的基础。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古代权威深受敬重，而且正是这种敬重刺激了当时的名流、学者们的灵感。对这些科学革命的巨匠来说，对古人的尊敬和崇拜并不妨碍他们自己去对古人的东西加以修正。人文主义的这一特征结造成了日益增多的增补、修订资料的问世，到头来反而淹没和压倒了那些权

威们，虽然这种新工作原先的本意是在于维护这些权威。这时期的思想可以从培根身上反映出来。

培根的工作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们的兴趣。他曾任英国的大法官，在1623年发现有受贿行为之前，是詹姆士一世在议会提案方面的主要政策设计者。他因为其《散文集》和史剧而得到文学批评家的高度尊重，但他的主要精力却直接用于改造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他未完成的《伟大的复兴》在16世纪的下半叶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渐脱雏羽的各种科学学会和科学院里所进行的大部分工作，在精神特征上是“培根式”的。

虽然培根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科学中的归纳方法的标准鼓吹者，但近来的研究已表明他还深深地受益于一些人们未曾料想到的源泉。培根熟谙自然巫术和炼金术的文献，探索了这些科目的传统奥秘，并认为真正的巫术家应该把他的发现公之于众。而且他还补充说，巫术并非全然无用。的确，“正是那种把关于隐匿形式的知识应用于奇迹操作的产物，并把动因同动作承受者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才会揭示出自

然界那奇迹般的杰作。”这种说法同约翰·狄或帕拉塞尔苏斯是惊人的相近。而且，培根同当时的许多炼金术和赫尔墨斯派学者在关于探索和可能发现为亚当所知的原初知识方面，意见是一致的。因此，培根详细地研究了古代神话，并认为它们同原初的人类传统有联系，他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去解释传说中的农神的故事，并把俄耳甫斯命中注定的对尤里蒂丝的追求作为象征，用来形容那些性急的人们——他们放弃了实验而还想着追求知识。在他手中，关于丘比特的神话，成了对前苏格拉底的元素体系的分析。

培根相信亚当式的智慧，这一点也与同样明显可见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倾向不谋而合，那就是公然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他深信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经来临，他抨击了经院研究的贫乏，抨击它们只重视维护固有的经费，而不关心那些对于在机械技艺看来如此值得赞赏的进步所急需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受到指责，说他攻击和摒弃早期哲学家的工作，从而中断了同对于人类如此必要的原初知识的最终联系环节。再者，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归之为逻辑，他引进实

验仅仅是为了支持其预先设定的结论。最后，他的哲学已经被结合到宗教之中，被用来支持罗马教廷。难以相信，这个人的工作现在还是那么有价值；也很难相信自他的时代以来会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步是对积累起来的所有希腊文献连同新近做出的各种注释弃之不理，或至少要对这些著作进行考察，而且不能带有在那些经院中司空见惯的盲目崇拜。然后，学者们必须开始建立关于事实、观察和实验的新范畴。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进行这项工作，因为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才能够比较容易地把真正的理论同自然规律区分开来。

但是，进行这种事业需要遵循一个确定的计划。在培根看来，纯粹的经验主义者可以比做蚂蚁，他们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大量的事实。哲学家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可以比做蜘蛛，只会靠其逻辑用自己体内吐出的丝编织成复杂的网。培根认为，真正的科学家可以被恰当地比做蜜蜂，他们吸取花粉然后把它酿成对大家都有用的蜂蜜。培根哲学是一种实验哲学，但他所说的实验是经过小心选择并总

是详细记录下来的实验。他开列了130多个题目和程序以供检验，并且强调了对大量的资料进行仔细分类的必要性。每一类都会拥有一批肯定的事例和一批否定的事例，还有一系列的比较程度。

培根认为，从这类初始的分析表列出发，通过排除那些不可能的假说并进而测试其它假说，就可以获得知识。

培根的科学方法观本质上是实验的，定性的和归纳的方法观。他也像帕拉塞尔苏斯一样不信任数学。如果说他曾声称，把数学应用于物理是进行自然探索的最佳途径，那么他也抱怨这种做法也许受到了滥用，而且他确实感到数学家们正在开始不恰当地支配这方面的研究。

他在其《学术的进展》一书中提到他所构想的工作，这本书将作为他的《学术大复兴》的总结导言；《复兴》还要包括对科学方法的详细分析，包括技艺和实验资料方面的百科知识，他估计这些资料在数量上为普林尼的《自然史》的六倍。《复兴》最后的若干部分将包括对古今科学理论的讨论，再加上从这些积累的材料中涌现出来的新自然哲学。不用说，这项计划过于庞大

了，不论是培根还是任何别的人，哪怕只是接近于完成它也是不可能的。尽管他已写出《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但《复兴》的许多别的部分却从未付诸实施，或者顶多也只是存在于一些前言或短小的章节里。然而，向往一门从大量的资料中产生出来的科学，这种梦想却鼓舞了17世纪的许多学者，他们都把培根看成是自己的向导。对许多这类“培根主义者”来说，培根的遗著《杂记》就是一笔最大的遗产。人们可以在该书中找到按“世纪”排列的一大堆事实，个人的观察同根据其他各种来源的注释混杂其间。其结果令人奇怪地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出自自然巫术传统的各种“秘典”。没有别的书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培根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尽管这本书在17世纪至少用英文印刷了15版，并且不止有一个像罗伯特·波义耳这样的作者试图续写。

可以说培根关于新科学的观念太不重视数学而过分强调实验。他自己似乎还不能正确地估价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尽管他经常引用伽利略《星球使信》中的发现，他还是对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价值提出质疑。他批评威廉·吉尔伯特

试图基于个别现象来构造整个哲学，他不能接受哥白尼体系，因为他没有找到地球周日旋转的真实证据。虽然他时常抨击帕拉塞尔苏斯的工作，但他在力图建构自己的宇宙学时却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化学理论。比如，他用硫—汞理论来解释天体，并把恒星运动同天火的属性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从培根所处时代的整个知识范围去考察他的科学方法，就会看到，他不仅为当时对科学中的经院哲学方法的普遍不满情所左右，而且显然也受到自然巫术、炼金术和帕拉塞尔苏斯的化学哲学的影响。

尽管培根未说明作为理论研究者的科学家应如何从事实际工作，但他却清楚地知道，强加于自然界的先验思想很难产生积极作用。培根是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者。因此，他认为大学教育应抛弃古典教材，注重新知识。

作为有权势的政府官员，培根毫无畏惧地抨击那些旧传统的卫道士。

他关于科学进展应导致人类生存状况改善的理论在17世纪，特别是在英国激发了大量的科学活动。

培根死后，17世纪著名诗人阿布拉罕·考莱为他写出了这样的赞美诗：

从我们流浪的先行者走过的
那些漫长的错误的道路，
象古希伯来人那样，
在小小的沙漠里多年迷途，
培根，有如摩西，终于把我们领出。

培根死后，在他的墓志铭上写着：他，当他谙熟了自然哲学和人类历史的一切神秘之后，他本人完成了大自然的旨意。

我们再次遇到这样的人物：他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普遍的哲学并想用它来取代古人的哲学。“他发现自己为大量的怀疑和错误所困扰，以至于觉得自己的努力求学并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使自己愈来愈愚昧。”“对于迄今为止我所接触到的所有见解，我认为我所能做的最好的工作莫过于将它们统统清扫一旁，以待后来被取而代之……”

这个人就是笛卡儿。

笛卡儿的影响并不亚于培根。他曾在一所新建立的耶稣会的学院中受过教育。1618年他

离开了法国，到拿骚的皇家莫里斯军事学院入伍当军官。到达德国的第二年，在一次沉思中，他梦见一种普遍的自然科学，数学和数学方法是它的关键。

这个故事使人想起当时的炼金术文献中，梦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事实上，笛卡儿已经知晓那些以“玫瑰十字会员”为笔名写作的新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所提出的教育和科学改革，而且，他于1623年回到巴黎时，他发现朋友们担心他已成了一个玫瑰十字会员（玫瑰十字会系17世纪与18世纪流行的一个秘密结社，此秘密团体有各种秘传之知识与力量，并宣扬宗教神秘主义）。他认为必须驳斥这种看法。

1628年，笛卡儿定居于荷兰，在那里他专心致力于研究。他同各地的学者，特别是同巴黎的马丁·默森神父保持着稳定的联系。默森神父的修道院是这一时期欧洲科学家的学术中心。到1633年，笛卡儿正准备出版他的著作《宇宙》时，由于听到伽利略被判有罪的消息，考虑到这本书的哥白尼主义性质，而中止发表。笛卡尔的主要著作稍后些时候才陆续问世。1637年他发表了《方法谈》。这本书可以说是他后来

一些较大篇幅的著作，如《折光学》、《气象学》以及几何学等的引论。随后又发表了《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

1647年，笛卡尔返回祖国，在巴黎只呆了两年，便又应瑞典女王克丽斯蒂娜之邀迁居瑞典。1650年，在瑞典逝世。

笛卡尔和培根一样，希望建立一种不受旧观念束缚的新哲学。但是，在轻蔑传统方面，笛卡尔比培根走得更远。在笛卡尔看来，完全放弃过去的所有知识而重新建立新知识，只把上帝和一个人自身的存在这种实在（我思故我在）视为公理，舍此任何别的做法都不足取。他认为通过思维可以认识上帝——而且坚信用这种方式获知的上帝的真理比眼睛看到的任何东西更加可靠。笛卡尔准备在这个基础上推演出整个宇宙及其规律。他相信，在这种受到数学启发的方法中，每一步骤都将和欧几里德几何中证明的那样确凿无疑。因此，无怪乎他在光学、虹和解析几何研究中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们具有数学的性质，而且最适合于用数学方法去研究。

笛卡尔的宇宙学从上帝入手推及物质和运动。他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如此地胸有成竹，以

至于坚信，不管已经创造出来的宇宙的数目有多少，它们的发展必定同我们现在的宇宙一样。他满意地认为他那本质上属于演泽的体系使他完全有把握肯定物质的元素，但当结果导致出多种可能性时，就需要设计出实验来作实际的选择。

笛卡尔的宇宙是“机械式”的，他拒绝当时非常流行的物活论。他做出假设，说宇宙中存在着恒量，这是那三种大小不同的粒子内在固有的属性。第一种即最大的一种粒子规定了物质的化学和物理性。第二种粒子体积小很多，但运动却快得多，它们存在于土原子之间。第三种是火粒子，它运动急剧，凡有空间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这样，所有的空间却被占满。其结果是，笛卡尔抛弃了虚空的存在和超距作用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尝试，它力图用物质的旋涡和旋流来解释所有事物。局部的聚合形成了行星和太阳，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遥远的恒星的周围。其最终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旋涡体系，它是宇宙中的所有动态的原因。

当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被应用于人和生物学时，就把以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生命”

力驱逐一旁。笛卡尔本人的工作后来在17世纪晚期的医学物理学学派的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他认为人是一个灵魂和一具像机器一样的动物肉体的结合体，他发现可以把人体的工作十分贴切地同水力工程的工作相比较，17世纪初经常可以在富人的庄园中见到这种工程。他说：

“我们可以把我所描述的人体的神经比做那些人造喷泉的机器中的水管子；把肌肉和筋腱比做其他不同的动力机以及使它们运转的发条；而把人的精神，它产生于心而贮存于脑，比做推动这些动力机的水。再者，呼吸与这种动物机器的其他类似的普通的和天然的功能，它们依靠于精神之流，就像一座钟或磨的转动，普通的水流即可使它们转个不停。”

就这样，外界客体激发了大脑的反应，其方式类似于一个人走进一个木偶暗室，踩到地上的踏板而使木偶活动起来。于是，身体被看做是一架机器，它的反应受到一个庞杂的管道网络的控制，在这个网络中有各种开开关关的阀门，使各种液体按不同的用途向不同的方向流动。

笛卡尔对欧洲大陆科学的影响直到18世

纪中叶以前一直盛行不衰。如果说培根新科学的缺陷是因为他过分强调实验，那么笛卡尔的缺陷则是由于他过分强调演绎的结果。他的结论只有在应用于那些适合数学处理的课题时才是真正有效的。事实证明，笛卡尔在宇宙学和生物学的方面的种种思辨，极少对于后来的科学发展具有持久的价值。

然而，笛卡尔的物质观含有许有价值的思想。他根据机械力学原理把多样的物质归纳为一种本性——广袤性，即把物质仅仅看做具有长、宽、高三量向的实体，由此而导出没有绝对空间的观点。这一观点比古代原子论前进了一大步。笛卡尔不但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而且承认物质运动是绝对的观点。他大声疾呼：

“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给你们构造出世界来。”

笛卡尔这种豪迈的气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

第五章　赤裸的灵魂

创造了辉煌业绩的巨人们，他们的精神气质的再现已不是对上帝的崇拜，而是对知识的敬仰；对灵魂不死的信仰变为对声名不朽的追求；支配他们言行的准则已不是传统的宗教与道德，而是人文主义精神。

唯“人”是尊的人文主义之魂

文艺复兴最具特征的思想运动就是人文主义运动。它是一个以对古希腊、古罗马文献进行研究为基础的教育和文化运动。人文主义对待古代遗产的态度和中世纪的学者截然不同。中世纪学者竭力使古典知识适应基督教的世界观，而人文主义者则从古典文学作品本身——它那明快高雅的风格，对人生本质的透视出发对其进行评价。它在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产生，是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

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反对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统治和禁欲主义世界的理论工具。他们不再把世界看成“烦恼和苦难的场所”，“人是神的奴仆”，而是用世俗的、有生气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世界观来看待它。

人文主义也就是世俗主义。世俗主义者在古典文化里发现一种同他们的利益相符合并且作为依据的人生概念。他们从古典文献中获取中世纪作家无法提供的许多知识，像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美好地生活，如何履行公民义务，主要是“人的尊严”这种古典模式。人文主义者认为古典文化是将人们引向幸福，引向积极生活的指南。为了能写出漂亮文章，具有雄辩动人的口才，为了自我品德修养，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人们必须学习古典文化。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把希腊哲学用于证明基督教义的正确与否。与他们相反，人文主义者则运用古典知识去培养他们在尘世里的新情趣。

中世纪学者只熟悉一部分古代拉丁语作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则使他们所能找到的每件古罗马作品重新流行起来。中世纪时期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对古希腊的知识

少得可怜，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则逐渐孜孜不倦地研习古希腊语，以便能阅读荷马、德摩斯梯尼、柏拉图，及其他古代学者的原文作品。

尽管世俗运动是主流，人文主义者并不是非基督徒，的确，人文主义者经常用纯粹世俗公式来处理道德问题，当他们面临宗教和神学问题时，向基督教提出了挑战。他们对圣经的真实性也不是没有疑问，但这些并不是明确地表现出来。他们强调在直接阅读和研究圣经及早期基督教传播者著作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更为纯洁的基督教形式。

一些人文主义者办起了学校，学习法学、医学；一些人文主义者被富豪家庭聘请到家中办起了私塾，通过教学方式去表达时代的精神。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是高雅博学的艺术家，有具有雄辩能力的演说家，有表达优美而富有想象力的诗人，有有卓越创造力的戏剧家，有写作出优美而动人的书信、对话、谈话的文豪。他们都能用古希腊文、古拉丁文写作现实主义的作品。人文主义者在学校传授宗教法、医学、修辞学、哲学和天算学。这些学科讲的都是希腊、罗马古典

学问。丰富的古典学问都是非基督教的，被看做是“人文学科”。它在课堂上代替了以前的神学，并且排斥了难懂的拉丁古文，采用民族语言，使人的才能智力向文言文学的方向发展。

人文主义者之父彼特拉克把自己的书信、谈话、对话搜集编排，成为文学作品。他和他的追随者通过系统的努力去挖掘中世纪意大利修辞中的古典文化根源，从而将古典文化的恢复向前推进了一步。尽管他在学习希腊语上收效甚微，但通过鞭策自己的学生去掌握这门古典语言，他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他特别敬仰古罗马的雄辩家西塞罗，追随着他的足迹，彼特拉克坚持认为人不仅要学习，掌握知识，而且还应懂得为了公众利益如何去传播和运用这些知识。教育应当强调将修辞学、道德哲学、智慧和雄辩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美德的关键。对于有美德的统治者、公民和有关美德的共和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彼特拉克努力促使西塞罗的观念成为人文主义者价值观念的主流。他的学生还开办学校，以耐心教授西塞罗这种新的教育目标。

人文主义的一个主要根源是13、14世纪在波洛尼亚、帕都亚及拉韦纳兴盛起来的法律研

究热潮。学生们不仅学习修辞，还学习如何辩论及发表演说。在这些与法律研究相关联的活动中存在着人文主义思想的源泉，老师和学生们在辩论中运用古罗马的范例。这么一来，他们便超出了课本而对当代政治问题发表评论。这就是最早的利用古典知识来做判断或指责当代的道德问题的惯常做法。在法学家和修辞学家手中掌握的古典文献成为他们捍卫自由和独立的根据，成为最初反对皇帝、教皇，以后又反对本国专制君主威胁的根据。这个古典传统被发扬得如此之好，以致于超越了法律研究的范围，而这种传统先是吸取营养，进而发展为一项独立的事业，文人们撰写城的历史，颂扬历史上反对暴君的斗争。

此方面发展最早的实例之一是达·赛纳的叙事作品《安科纳之围》，其写作时间很可能是在 1201～1202 年之间。作品令人难忘的主要情节是一次赞美自由的讲演。一位年长的爱国者在安科纳遭劫的危难关头对该城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发表演说。粮食已快吃光，市民们开始感到绝望，那位老人劝说人们为捍卫自由绝不要放弃战斗。

在封建的中世纪社会里，西欧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一切文化思想意识都成了神学奴婢，人一生下来就有罪，人生的目的是死后进入天堂永生。任何一种公理，凡是同基督教会的信条尤其是“尼西亚会议”的决议相违背，就被教会判定为理性的迷误。社会上的学者要是敢出来证明1乘1等于1，就会被教会定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因为1乘1等于3才符合神学所启示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这种神学的严格控制下，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的教育。

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世俗教育的口号，其作用不仅在于教育方法，而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与神学相对抗，不仅要争取摆脱神学的桎梏走上独立的道路，而且要争得一切意识形态上的独立。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世俗教育是以古希腊、罗马的学术文化为内容，要以对人的肯定来反对对神的屈从，要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人的统治以代替神的统治。

在古希腊、古罗马驳杂繁多的著作中，认为人的作用明显占有突出的地位。后世的人们常引用希腊学者普鲁泰古拉这样的名言，“人是万

物的尺度”。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尼》一剧中用这样美丽的诗句赞颂人的伟大：“世界的奇珍异宝可真不少，像人这样微妙的却很难找。”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也引用过去古罗马著名的政论家、雄辩家西塞罗对人的颂词：“在人看来，人是最美的。”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在致赫罗多德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本性也只是接受环境的教训，被迫去做许多各式各样的事情。”芝诺在他的《论人的本性》里第一个主张主要的善就是认定去按自然而生活，就是按德性而生活，“因为自然引着我们到这上面。”这些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作家在他们的论著中，都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这绝非中世纪神学用神的意志代替人的自然本性的论调。

古希腊、罗马的现实主义思想自然成为一切人文主义者反对教会神学的武器。

人文主义者大声疾呼在世俗世界里首要的是人而不是神，主宰世界的是人生，而不是虚幻的神灵。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毫不含糊地将基督教思想关于男人与女人的观念做了彻底的改变。根据中世纪的观点，男人和女人不但无法凭

借自身的努力去取得个人完善，甚至进行这种尝试都是错误的和有罪的。人类必须服从神的意志。与之相反的是，在复兴古希腊的“完美”观念时，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让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来达到个人的自我完善，个人也能达到上述目标。作为人生的目的，去争取这种至善至美，恰恰是人的责任，而进行这种追求需要巨大的精力和非凡的技能。人有能力在多方面都达到完善，并为此而努力是人生的责任。强调人生创造能力是文艺复兴运动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的信条。个人有自由去塑造自己的人生。上帝教导我们：“我将你们造就成为有灵性的生物，”那么，“作为一个自由和自豪的塑造者，就按你们自己所喜欢的形式去塑造你们自己吧！”经过努力能逐步地认识和掌握自然，人有责任去实现自己的潜力。

方士这些早期的星相家们已作为一类新的强有力的人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控制自然的幻想一直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们，从实验主义哲学家培根，到自然哲学家罗伯特·波义耳，直到18世纪早期的伊萨克、牛顿。这种幻想作为科学革命的巨大心理动力，在很大

程度上起源于人文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中。

人文主义者教育思想还含蓄地对中世纪经院哲学进行了抨击。按照人文主义者的观点，经院哲学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其术语和拉丁文词句过于粗俗，而且还因为它未能提供有用的知识。这种对知识应用性的强调同样刺激了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由于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和中世纪的一切都持对立态度，结果他们把当时流行的历史观颠倒过来。基督徒们认为历史不过是上帝意志和上帝保佑的表现。人文主义者则强调，作为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人的行为、人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文主义者抛弃了宿命论的历史观，并用从古代，特别是从亚里士多德、波利比奥斯、西塞罗那里继承来的循环论思想代替了它。历史在光明与黑暗、愚昧与文明、消亡与再生之间循环往复。这种循环史观使人文主义者将他们以前的历史阶段视为继承古典文化高峰之后的一个低谷。同样，循环史观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时代视为再生阶段，视为古典智慧和思想复苏的阶段。基于上述观念，人文主义者提出了如下见解，中世纪是将古代和文艺

复兴时代断裂开来的一个黑暗深渊。西方现在把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阶段，正是采用人文主义的观点，那时的人文主义者已产生了现代历史进步的新观念，他们敢于把自己看做是现代人，他们认为自己甚至可能超越光荣的古希腊、古罗马人。

人文主义者对历史学科的重视产生了一种批判性的研究方法。这种尊重科学的新方法，大大削弱了以往那种旧制度、旧传统竭力维护的旧观念。洛伦佐·瓦拉为这一新思潮提供了最明确的榜样。接受了古典文化教育的瓦拉在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君士坦丁赠礼真伪辨》中，把他训练有素的学术批判火力对准了教会。过去教皇声称他所拥有的统治世俗的权威来自一个确凿有据的文件。该文件足以证实权力系“君士坦丁赐与的真实性。”即是说，当君士坦丁大帝于 4 世纪迁都于君士坦丁堡时，他曾授予教皇有统治整个西部帝国的权力。但是瓦拉证明了该文件是在 8 世纪伪造的。因为其中的一些语言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还无人知晓，也未见应用，这些语言的应用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了。

对这项工作道德意义方面重新予以重视也

包含在人文主义者对个人潜力的重新评价之中。人文主义者认为城市或保护人因人功绩所授予的荣誉、名望甚至赞美都是对这个人努力的最高报偿。人文主义者对于赞美和名誉的追求在文艺复兴中形成了某种狂热。

在14和15世纪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美第奇家族控制局势下，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还不属于宫廷贵族的范围。那时人文主义只是公民思想——对城市居民进行生活的教育以使他们能够竭尽全力为公众利益做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主义是包含着共和价值和共和事业的新观念。近代的历史学家把这种混合物称为“公民人文主义”，这种公民人文主义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到15世纪后半期，当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日益巩固后，这种公民人文主义被另一种更适应时代的君主诸侯人文主义所取代。这种君主诸侯的理想吸取了市民人文主义的许多思想。尽管这种人文主义的矛头是对准王侯朝臣，而不是对准民众的，但人们仍重视对美德和荣誉的追求。君主诸侯人文主义仍被用来对君主和绅士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以便使他们在美德与金钱的较量中让美德取胜。

但是公民信仰和君主信仰之间的共同之处却没有它们的差异那样重要。君主统治的目标不再是自由，而是平静与安全。要达到平静与安全，最好的手段不再是共和制，而是世袭君主制。这种新的君主理想在大量的谋略书籍中得到反映。这些书籍提倡的理想统治者应该多才多艺，无论在宫廷、政府，或在战场，都能治理有方．指挥若定，处处体现美德。这些谋略书籍不但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而且在全欧洲都是朝臣和欲做绅士的人士手头必备的书。这种君主人文主义理想对人们所起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一直延续到17世纪，直至一种新的道德观和艺术爱好出现后方才逐渐隐退。

中古时期，封建贵族的特权是独一无二的，门第思想占支配地位。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已失去衡量人的尺度的作用，人的尊严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在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里和一些公、伯国里，出身门第被人的才华、手段和金钱所代替。美第奇出身于商人，米兰大公斯福查出身于农家。封建贵族丧失了特权，在社会上也不再是受尊重的阶级。幸福和光荣归于学者、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才是受尊敬的人。

文艺复兴时代自由的概念已不同于古代，已具有明确的资产阶级的内容。每个市民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政府管理和批评自己，这是真正的自由。全体市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青春美丽的人间少妇，享受着世俗的生活，同空虚无边的圣母画像相比较，她完全表现出现实生活的美好。艺术家绘出数百体形魁梧的人物，把罗马天主教判处于“永劫惩罚”中的人，大力歌颂那些强壮有力，负有反抗精神的巨人，充分反映出人的伟大、人的生机勃勃和人追求现实生活的殷切欲望。

人文主义者宣扬世俗，放弃天堂，仇视禁欲主义，攻击来世观念，相信现实，放眼欧洲。针对中古时代天主教以神为中心，以天堂和来世为精神寄托，以禁欲主义为戒规的观点，他们主张人的自由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发挥人的智慧才能，追求人的理想，把人的尘世生活要求摆在首要地位。他们号召人们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才智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在社会上广为宣传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性反对神性的思想。这些对解放人们的思想，解放当时的生产力，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人文主义者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鄙视贵族的豪门世家，抨击封建等级制度，嘲笑僧侣散布愚昧无知，排斥经院哲学，提倡实验科学，探索自然界奥秘，追求科学真理，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种种理论工具。

社会对思想灵魂的再现

整个一个时代为人文主义者所淹没。他们是一群最复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今天具有这样一副面貌，明天又换了另外一幅面貌。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因素。在中世纪的另一面出现了一种建立起它自己的基础的新文明，它成为属于神职人员和教会所哺育的中世纪的整个文化的竞争者。它的积极代表者成了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们知道古人所知道的。他们用古人曾经写作过的那样来写作，他们像古人曾经思索过或感受过那样地开始思索并欣然感受。他们所崇奉的那个传统在各方面都进入了真正的再生。

当时在佛罗伦萨没有不能读书的人，就连驴夫也能吟诵但丁的诗句；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意大利手抄本出自于工匠之手。就连生气勃

勃的14世纪的文明也是必然地为人文主义的完全胜利铺平道路，而在15世纪里敞开无限崇奉古代文化的门户的恰恰是那些意大利民族精神最伟大的代表者本人。

如果说有很多同样天才的人曾经支配了意大利文化，无论他们的性格中从古代吸收到什么样的成分，他们也仍然会保有一种富有特征的和鲜明的民族烙印。尽管意大利或西欧都没有产生另外一个但丁，他仍然是首先把古代文化推向民族文化的最前列的人。在《神曲》里，他并不是真把古代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看做具有同等权威的。如果没有一个像但丁这样的人来保持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则基督教所记载的始末在争取公众的赞赏方面必然占上风。

彼特拉克现在主要是作为一个伟人而活在大多数人们的记忆中，然而他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所获得的荣名其实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是古代文化的活代表，他模仿各种体裁的拉丁诗歌，力求用他卷帙浩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来介绍古人的作品，而不是去代替他们。对于薄伽丘来说也是一样的。有两个世纪，当《十日谈》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还很少为人所知的

时候，他只是由于编辑了拉丁文的神话、地理书和传记而在全欧洲出了名。他所对之进行猛烈战斗的“诗”的敌人是那些除了淫乱对于任何都打不起精神来的轻浮的无知者，那些认为赫利康、卡斯达里安喷泉和阿波罗的坟墓都是存在的愚蠢的诡辩神学家，那些因为诗歌不能给他们带来钱财而认为它是一种多余的东西的贪婪的法律家。

世界上有了一个新的事业和一群新的人物来支持人文主义。要问这个事业是不是应该在它成功的道路上适可而止，是不是应该有意地限制自己，并把首要地位让给纯民族的文化成分都是无用的。在人民的思想中，没有一种信念比这个再根深蒂固了，即相信古典文化是意大利所拥有的能使它获得光荣的一项最高贵的事业。

有一种为这一代诗人学者所熟悉的象征性的典礼——对诗人的桂冠加冕式，虽然它逐渐失去了当初鼓舞过人的那种崇高的感情，却历15、16世纪而未衰。这种制度在中世纪里的起源不明，而仪节也从来没有固定过。那是一种公开的表示，一种文学热情的外部有形的流露，而

它的形式不消说也是变化不定的。但丁似乎曾经从半宗教的神圣仪式的意义上理解它，他希望在圣乔万尼教堂的洗礼堂接受花冠。像千万个其他佛罗伦萨儿童一样，他曾经在那里受过洗。他本来可以凭他的荣名在任何地方得到荣冠，但他不想在他的故乡以外任何地方得到它，所以未被加冕就死去了。

问题发生了。这个加冕的权限究竟属于什么人？当时由一个佛罗伦萨人任校长的巴黎大学和罗马市政府当局竞相争夺为彼特拉克加冕的光荣。以他的审查人自居的安茹朝国王罗伯特满心要在那不勒斯举行这个仪式。但彼特拉克却宁愿在加比托尔山由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加冕。这种光荣很久以来就是人们求名的最高目标。

接着有查理四世的意大利之行。查理乐于迎合那些沽名钓誉者的虚荣心理和用豪华的仪式来打动无动于衷、无知的群众。他想给诗人加冕是古代罗马皇帝的特权。因而认为这也同样是他自己的特权，从这一假想出发，他在比萨给佛罗伦萨学者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加了冕。这件事引起了彼特拉克的不满、不快，他悻悻不平

地说：

“野人的桂冠竟敢用来装饰奥森尼亚的缪斯所喜爱的人。”

这也引起了薄伽丘的极大厌恶，他拒绝承认这顶“比萨桂冠”是合法的。

人文主义精神使他们把自己的时代和一个可尊敬的古代调和起来。

尼科洛，是一个不能容忍他周围有任何东西与他自己的古典精神不谐调的人。他的修长玉立的秀美风姿，亲切的谈话，他的用古代最高贵的遗物点缀着的房子，都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他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注意清洁，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桌上铺着纯白的亚麻布，摆着古代的花瓶和水晶的酒杯。他使一个追求享乐的年轻佛罗伦萨人对学问发生兴趣的方法是如此地吸引人。德帕齐是一个著名商人的儿子，他自己也将注定从事于这个行业。他生得漂亮，浑浑迷恋世俗享乐，什么都想就是不愿想到文学。有一天，当他经过市政大厦时，尼科洛将他叫到面前，说：

“你生得如此漂亮，而对拉丁语言竟毫无所知，实在是一种羞耻；如果你学会了它，它将为

你大大增光。如果你不学它，你将一事无成，而青春的年华一经消逝，你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高声地宣布了古代文化的价值。但对古代文化如此热诚崇奉，承认它是一切需要中的第一个和最大的需要，则除了 15、16 世纪的时代，在任何其它时期都找不到的。除佛罗伦萨外，有很多意大利城市，不论个人和社会团体都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文主义，并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学者。

不管怎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论对于共和国或是对于君主或教皇，其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是因为只有人文主义才被认为具有秘书官职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和能力。因此，5 世纪时，知识界的最伟大人物大多数都把他们一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以这种身分为国家服务上。人们通常也在公开的庆典上用讲演来欢迎君主们，这些讲演有时长达数小时。自然，这只能在这个君主被认为是或者希望被认为是一个辩才的爱好者，而且有一个有辩才的演说家在场的时候才能举行，不管这个演说家是一个大学教授、官员，还是教士、医生或宫廷学者。学

院里，无论是一个新教师的就职演说或者是一门新课的开课演说，都由教授本人来进行，并且被看做是表现伟大辩才的机会。

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是高雅博学的艺术家，具有雄辩和修辞能力的演说家，表达优美而富有想象力的诗人，有写作出优美而动人的书信、对话、谈话的文章的作家。他们赞美人，大声疾呼主宰世界的是人生，而不是虚幻的神灵。“人具有高贵的理性，人具有伟大的力量，人的行为像天使，人的智慧像天神。”但丁曾明确说：

“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

这些人文主义者，他们不想变为上帝，居住在永恒之中，把天地抱在怀里，他们所祈求的一切是去做一个凡人，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于我就够了。”他们到处发出这样的呐喊：人的高贵不在于出身，而在于他的功绩。这是对中古时代盛行的僧俗等级制度和神高于一切等级的直接挑战。“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人是宇宙的精

华，万物的灵长！”

这件了不起的武器在人文主义艺术家的手里消除了凌驾于他们头上的神灵，神失去了它的光泽和地位。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是世俗生活的理想境界——人的价值和人生的美好，人体的美妙和人性的觉醒。人生在世不仅是为观赏神的伟大，它更是神骄傲的自我体现，是神在地上的天然继承者。这些是人们用来瓦解政治、宗教和教育的工具，热爱古典文化和热爱自然是他们的罪过。即便是彼特拉克，也发现很难把自己对美、对植物和花朵的爱与深信不移的基督教信仰调和起来。

这种对人的发现、对人的肯定，即是对中世纪神学家侈谈神明而忽视人生的轻蔑。人的灵魂离开了对天上事物的热爱，对被造之物的爱超过了对造物主的爱。当彼特拉克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时，他也就明白了，人如果不认识自己，就不能认识上帝。其实，上帝也是这样对亚当说的：我既不曾给你固定的住所，亦不曾给你独有的形式或特有的功能，为的是让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取得你所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其他一切生

灵的本性，都被限制和约束在我规定的法则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交给你的是一个自由意志，你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你本性的界限。

可见，上帝赋予人的是以自由的意志和实现自由意志的无限能力，人可以为人所欲成就的一切，实现人想要达到的一切目的。人被抬上了崇高的地位。

我们再看那些不朽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在那里，神的形象实际上是人的情貌风范的再现。维纳斯集女性人体之美于一身，与其说是宗教的神，不如说是使人牵心动魄的美人；圣母玛利亚也在拉斐尔的笔下成为凡间的美丽女人，圣母与圣子体现着儿童的天真可爱和母子之间的人性之爱。耶稣与其12门徒在进《最后的晚餐》这场戏剧性情节前的各种表情，实际成为世俗生活的缩影，是世俗人性的再现。具有细腻的纹理、完美而又健壮的体态、高雅果敢的面貌的《大卫王》，虽是圣经故事中的英雄，但米开朗基罗却把他人性化了。他面对可怕的巨人歌利亚，准备战斗，鼻孔略张，眉毛紧张，高度兴奋，似有缺乏自信的紧张。昔日被异化而去的人性重

新复归到人的自身，作为美的化身得到体现。正因如此，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王》一直被认为是雕塑史上的顶峰。

使徒的圣迹在人们心中日益淡化，成了模糊不清的记忆，它在道德上的约制力不可避免地松弛了。历任教皇和各级主教可以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感官情欲，道德上的堕落和变质与他们信誓旦旦恪遵奉行的神圣信条形成尖锐的对比。在文学家看来文雅高尚的妓女较之尼姑对人类有更多的价值。看看所谓圣徒们的丑态淫相。庇护二世纵情声色，私生子不只一个，致使自己于 1463 年下诏自责，请求上帝和教会宽恕他的罪过，免进地狱。保罗二世，是个爱财如命、贪得无厌、爱慕虚荣、穷奢极侈的怪物。他的一顶皇冠上镶满珠宝，价值连城，超过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

亚历山大十六世是一个姘居情妇、有儿有女的淫荡之徒，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他与其儿子争夺其女儿的爱情的流言。“这个恶人以无节制的野心，可恨的奸诈，极多可怖的残酷行为，怪异的贪欲，对不论是神圣的，或是邪恶的，都一视同仁地出卖，已麻醉了整个世界。”无怪乎

“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对其丑行嘻笑怒骂，淋漓尽致：

“这不虔诚的巴比伦，是地球上的地狱，罪恶的渊薮，世界的阴沟。在此既无信仰，也无仁爱宗教和对上帝之敬畏……世上所有丑行和邪恶，荟萃于此，……老年人热烈而轻率地沉溺于维纳斯的手臂中，忘其年龄、尊严和权力。他们对羞愧之事，趋之若鹜，好象他们的荣耀不在耶稣的十字架，而在宴乐、酗酒、不贞……教皇游戏之猥亵和逸乐，乃是私奸、血族相奸、强奸和通奸。”

薄伽丘的《十日谈》更是以文学形式集中暴露教会的黑暗与腐败，信徒的堕落与无耻。教廷中，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违反人道，耽溺男风，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不存在了。竟至于妓女和娈童当道，朝臣有什么事向廷上请求，反而要走他们的门路。教士们全是些酒囊饭袋之徒，个个爱钱如命，贪得无厌。非但是人可以当牲口买卖，甚至是基督的血肉、各种神圣的东西，不论是教堂里的职位，祭坛上的神器，都可以任意做买卖。贸易之大，手下经纪人之多，远非巴黎商人所能望

其背脊。罗马不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假如有地狱的话，那么罗马便是建立在地狱之上的。无论你转向哪一边，转向教士、主教这一类入世教士也好，转向各种修会教士团体也好，转向阶级较高的教士也好，所看到的只是一片罪恶；这些人所犯的恶行，令人为之掩鼻。他们心胸狭窄、贪婪、爱财……不关切灵魂是否得救……只重口欲的享受，耽于宴饮，从事秽行，贪好女色。……逃避参加崇拜仪式就如同逃避毒药一样。剥开教皇、主教们披在自身上那件伪君子的画皮，宗教、教会组织就会丧失其神圣性，传统宗教加于人们心灵上的精神绳索就越来越松动了。

古典文化的再生，唤起了人的觉醒。人们追求人性的实现，藐视基督徒的谦卑、温顺和怯懦。以审美的观念代替道德的观念，去鉴赏和追求自然美、人性美和女性美。

这是一个创造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今人向往的时代。

海伦，我视你的美貌
如昔日尼西的小船，

于芬芳的海上轻轻飘泛，
疲乏劳累的游子
转舵驶向故乡的岸。
久经海上风浪惯于浪迹天涯，
海伦，你的艳丽的面容，
你那紫蓝的秀发，
你那仙女般的风采令我深信
光荣属于希腊，
伟大属于罗马。

余　响

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一词逐渐为“人道主义”所取代，并广为流传。18 世纪以后，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针对“王权神授”说，提出了“天赋人权”的观念，申明了自由、平等的思想。从欧洲到北美，到处开花结果，出现了震动世界的美国《独立宣言》，产生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属于意识形态的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更替而中断。

明清之际，西方文艺复兴的新文化传到中国。但它仅仅“昙花一现”，并没有根深叶茂，繁荣昌盛。在中国传播和研究文艺复兴成果的中外学者，也逐渐“销声匿迹”，泯灭无闻。这颗鲜花，移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来，尽管先辈们用辛勤的汗水耕耘、浇灌，也不可避免地枯萎、凋谢。

20世纪初，根植于中国土壤的“东方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也有西方文艺复兴影响的痕迹。“五·四”运动针对中国的“儒教”的专权，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同西方文艺复兴针对神权统治，而高举“世俗文学”和“现实主义艺术”的大旗，两相媲美。西方文艺复兴摧毁了教会的“精神独裁”，东方的“五·四”运动也打倒了“孔家店”。西方的文艺复兴摧毁了1000多年教会的桎梏，而东方的“五·四”运动打碎了2000多年来儒教的锁链，打破了中国旧的宗法观念和

道德传统，废科举，兴学校，改文言，变白话．出现了新型文学艺术，产生了新的科学文化。中国人已经觉悟到自己应该作为一个“自由人”而存在。他们真正发现了“人的世界”，看到了光明，憧憬着美好的未来。